

HUNAN WENSHI

湖南文史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湖南省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45

1992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第
45
輯

湖南文史

周谷城題

湖南文史雜誌社

- 顾 问 吴立民 林增平
刘晴波 李 鳌
- 主 编 田伏隆
- 副 主 编 高 原
- 责任编辑 彭德才

湖南文史 HUNAN WENSHI 第45辑

编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主 编/田伏隆

副主编/高原

责任编辑/彭德才

出版/湖南文史杂志社(湖南省长沙市湘南路15号)

发行/湖南文史杂志社发行部

印刷/湖南省政协机关印刷厂

广告经营许可证湘广准字第0162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7.6 字数180,000 印数14000

版次/1992年2月第1版

1992年2月长沙第1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43-1175

定价/3.00元

湖 南 文 史

19**1**92

目 录

(总第45辑)

名 人 踪 影

民主与文艺……………茅 盾 (1)

茅盾在粤港“第二条战线上”

——茅盾佚文《民主与文艺》所引起的回忆……………李莎青 (10)

往 事 勾 沉

黄爱、庞人铨被害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湛小岑 (30)

与周恩来、邓颖超、黄爱同学——湖南劳工会——反对赵恒惕——黄、庞被害——毛泽东叫人告状——周恩来从柏林寄来《生别死离》诗

2A58/109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始末…………… 彭铭鼎 (35) >

张治中为首的西北行营——陶峙岳庶理西北行辕——马步芳
接任西北公署——陶、彭率部起义

我和程潜的交往…………… 肖作霖 (48) >

和程潜的最初交往——程潜的特殊性格——光复前后几经变
迁——协助程潜竞选始末——浩浩荡荡回湖南——调陈明仁
回湘——开始寻求和平出路——促进和平步步艰难——程潜
派我去香港找党——湖南和平起义前后

白崇禧30万大军是怎样溃败的…………… 向 隅 (88) >

黄旭初慨谈李、白、黄分道扬镳——蒋、李有歧见，白氏协
调无功——李品仙献议，惜未断然采行——衡阳军事会议，
白氏彷徨无主——大将用兵，一着之差——交岔路口，生死
决定——无可奈何，挥泪出关——兴亡成败，尽付东风

△ 往事还如一梦中

——宁乡云山纪访…………… 周润芝 (124) >

人 物 春 秋

先父杨末菴先生事略…………… 杨慎之 (131) >

东渡日本——著述、翻译、编辑生涯——出色的教育家——从
事爱国民主运动——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模范执行统战政

策的活动家——“见多识广，胆小如鼠”——“香花毒草各有
趣，悟到真谛喜欲狂”

肖敏颂与湖南民盟..... 李 莹(157)

“一二·九”运动的领导骨干——主编《前进》半月刊——
在民盟东南总支部——回湘组建民盟组织——迎接湖南解放
——毛泽东讲《古城会》——在苏联大使馆——“安贫若素，
廉洁自律”——“应慰英魂在九泉”

记“南医专家”周庆年..... 黎树杞(169)

社 会 黑 幕

南京监狱见闻录..... 徐君虎(175)

1927年入狱——江宁县看守所——狱卒的生财之道——
老虎桥模范监狱——秘密送信——谭延闿表态——江宁地方
法院看守所——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要钱不择手段的顾
胖子——冒充县长的人——在牢里抽大烟、睡姨太的陆域人

民 俗 风 情

侗族的传统道德..... 杨昌明(182)

恋爱婚姻道德——劳动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宗教道德——政治道德

江华瑶族婚俗……………任 涛 查良国(192)

男到女家上门——男女答歌——竹叶包的鸡蛋——“龙凤帖”与“送日子”——“坐姑娘”——“哭嫁”

三 湘 杂 忆

湖南人在西双版纳……………肖功富(196)

驱车西去——艰苦生活——支前修路——艰苦创业——胶园巨变

“世界最大标语”的诞生……………易新良(207)

“文革”浩劫中的南岳文物……………旷光辉(211)

张家界开放前后……………陈自胜(216)

深闺佳丽——张家界的歷史风貌——白手起家——张家界国营林场的建立和发展——慧眼识珠——张家界的价值被重新认识——历史性的转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面貌巨变——开发建设取得巨大成绩

民主与文艺

茅 盾

按：茅盾1946年3月29日在中山大学的讲话《民主与文艺》的完整记录稿，一直鲜为人知，《茅盾著译年表》、《茅盾著译系年目录》、《茅盾著译作品及其研究》等书均无记载。李莎青同志当时在中山大学就读，记录了茅盾的讲话。建国后，他曾在全国不少图书馆寻找，直到1988年4月11日，才在湖南图书馆散乱的旧书报堆中弄清这篇文稿曾在湖南长沙《中兴日报》1946年6月17日、18日、19日连续刊出。1991年3月27日是茅盾逝世10周年，我们特请李莎青同志根据1946年4月广州《文艺新闻》朱殷的报导及1946年4月20日上海《人民世纪》路丁的简要笔记等有关文稿再次对照校勘原文，将这个讲话并将其有关回忆录，一并整理出来，在本刊发表，以饯读者。

在上星期五，兄弟蒙朱谦之、梅龚彬两院长之请，约定在贵校讲《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后来，因兄弟感受风寒，不能如期履约，心里觉得万分难过。今天又因交通问题迟到了，并且劳各位从文学院大教室迁到这里来（法学院礼堂），而兄弟又没有什么宝贵意见贡献给各位，这只有使我感到惭愧和不安。

上星期约定的讲题——《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因为在广州三个文艺团体的集会中讲过了，所以，今天

当朱院长问我更不更换题目时，我说还是更换为好。这更换的题，就是《民主与文艺》，也就是今天我要和大家讲的。

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也就是人民争取民主的时代。大家都知道，“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精神的财富的总合。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则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所以，当前的文化工作，应该紧密配合当前政治的迫切要求——民主——去努力。文艺，是文化的一部份。因此，当代文艺也应该以民主为主题，促使民主的早日实现。这便是现时代所要求的民主文艺。

本来，文艺在最初出现时，就是人民的充分民主的东西。为什么呢？现在，我简要地和大家谈谈：

当人类在原始公社的时候，因工具的简陋和其它的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的限制，只有共同劳动——即集体劳动。在这种集体劳动下，生产的土地是共同的，生产的工具是共同的；所以，生产的结果，也是共同的。在这种共同劳动所限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下，他们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意欲所赖以表达的，当然仅有粗犷而淳朴的简短的热烈的歌唱、舞蹈和图画。后来，因生活的需要，由结绳记事逐步发展到有简单的原始文字产生。于是，他们情意的结晶的歌唱、图画等艺术作品，使用这符号文字篆刻在石壁上，这就是原始的诗歌、原始的艺术，也是最原始的文艺作品。而这原始的文艺，是有下列诸特性的：

一、文艺作品是人民群众共同创作产生的，而不是个人创造出来的。人民本身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和人民是两位一体不可分离的；并且，当时的情况，个人也没有创造文艺的需要和力量。这种文艺作品的共同创作又和现在的集体创作不同。原始文艺的产生，乃系极自然的生活要求，如诗歌，是因为劳动

后的欢乐情绪及战胜后的宴会底愉悦而促使大家共同创造出来的。所以说，原始公社的文艺，是真正的人民文艺。

二、那时的文艺作品是百分之百服务于人民的。因为文艺本身的产生是整个人民所创造的，所以，凡是离去人民要求的作品，便根本不会产生。文艺的真正服务人民，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只有那个时候才算完全做到了。

三、原始公社的文艺作品的欣赏，是不需要任何代价的，流传是极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文艺作品，是象其他的货物一样地必需经过商品的形式才能流传。也就是说，现在的文艺作品的欣赏，是需要代价的。因此，流传的范围也限制了。而原始公社时的文艺却完全不同，欣赏既不需任何的代价，流传也是那样的无止境。

总而言之，原始公社的生产、生活都是极简陋的，在物质条件、精神条件的限制下，他们的一切都是落后的，并且文艺创作也没有完备的文字来作表述的工具。但那时文艺作品的流传与它的任务的正确，都比现在高明得多了：那时用最简单的符号镌刻文艺作品于石壁上，虽然是极笨拙的落后的一种流传方法，但它的内容的真实、丰富，却也非现在的文艺所能比拟——既不是单纯个人情感的表现，更没有违反人民意愿的作品，而是大家劳动的欢欣和战胜自然的愉快中共同创造出来的。因它是劳动及对自然战斗的需要过程中产生的，故它富有奋进的战斗精神。也就是说，这样的作品，是积极的健康的，既没有桃色的风采，更没有现在所谓服役于党派的任务，所以，那时的文艺作品，是极其真实的、极其伟大的。

说到这里，我们一定会问：为什么那时会有那样高超的文艺作品而现在没有了呢？

大家都知道，原始公社时代，一人劳动的所得，仅够供给个人的消费，其生活虽极艰苦，但绝没有特殊的有闲阶级。并

且因为生产工具的粗劣，其势不得不集体劳动。譬如说，前面山中有条巨大的野兽，一个人的能力及他所持有的木棍石片是绝对不能把它猎获的，是必须集合大家的力量和木棍等工具才能把这个野兽打死。这就是集体的劳动。而这种劳动的所得，便不得不共同享受了。

而且，那时的生产工具，仅仅限于自然的工具，如木棍石片等，是不论任何人在任何时候均可以随时取得的，故那时的劳动，是很平等的劳动，即劳动者便是生产工具所有者，生产工具所有者便是劳动生产者；不象现在生产的人却不是工具的所有者，工具的所有者而不是劳动生产的人。因此，那时并没有地主奴隶之不同，更没有劳资的相互对立。并且，因为生产产品——如猎获的牛羊不便蓄藏，而私有财产就无由产生，此乃集体劳动的游牧生活方式所限制的原因。原始公社的社会基础既是这样，而所产生的文艺，也是无阶级的、共同创作的人民文艺。

但这样的原始公社社会，终因生产工具、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生活方式的变迁而崩溃了。起而代之的便是游牧农业社会，于是私有财产制度产生了。以往单纯的一切公有的集团生活便无法继续了。由于私有财产制度的产生，不同的贫富阶级出现了。同时又因为农业的发展，必须知道星辰气候的变化——何时适宜下种，何时适宜中耕，何时适宜收藏……这些都是从事农业应该知道的。于是有一部分人凭其经验用思维去归纳这些自然的法则，因此，便有劳心、劳力的不同分工了。

可是，单凭经验是难于解释宇宙自然的一切现象的。如忽然下降的雹雨、雷电，在知识简陋的农业社会，是只有恐惧和畏敬，于是便有宗教的产生。后来专司这种事情的人，渐渐变为特殊阶层。这也是使当时社会组织日趋复杂的重要原因。

原始公社既已演变为农业社会，文艺当然亦随之变更它的

本质了。假如说，文艺是生活的“花”，那么社会便是这花赖以生存的泥土。泥土的不同，可以影响花的互异。也就是说，原始社会的文艺，是真正人民的文艺。但因为原始公社的进入农业社会，所以文艺也就变质了。

农业社会最显著的特点，便是奴隶和地主的分别：地主是纯粹享受的特殊阶级；至于奴隶，则为一切的劳动者。甚至知识的传授，地主也不屑为，视为奴隶的事情。

地主因为地位、权力的特殊，从来不参加劳动，所以无法体验劳动的快乐与创造的愉悦。他们过剩的精力，只有用来加紧地压迫奴隶。这样，他们也感到压迫奴隶的快乐。而他们的打猎，也不过伸展其“杀”的意欲罢了；其所以藉野兽来发泄这欲望，是因为不能多杀他的奴隶，杀完了，便没有人替他劳动了啦。这种打猎对地主的另一作用，便是练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也是锻炼如何压制奴隶的力量。地主们除了打猎等游玩外，便是沉浸在女色和酒宴中。在这些娱乐中仍感不足时，也谈谈文艺，作为另外一种消遣来享受。但地主们认为文艺的创作也是“劳苦”的事情，因此，他们便在奴隶中特别选些聪明而听话的奴隶专门从事这文艺创作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文艺，因为它的内容仅以特殊的少数的地主阶级为服务对象，所以它的根本任务，也仅仅是为了巩固地主们的优越地位。因此，那些聪明而听话的奴隶，便忠诚地竭尽其能力在文艺中表扬地主们是如何地与众不同，如何地应永为人民的统治者……，譬如夸耀地主们的祖宗，是如何地从往古一个极淑贤的女人感应神天之灵而特别不同地怀胎降世的，并且又是如何地承奉天命而为万民之“君”、人间的“天子”。这种特殊的“天赋”，是平常从污秽的底层中凡庸地出生的奴隶，万万得不到的。所以他们的结论，地主的永为统治者，是上天注定的，人们绝对不能违反这上天的“谕旨”；奴隶更不能有毫末

的非分之想，如果心中稍有不“正”，便是“背天逆命”的罪人。所以，这样的文艺，不但不是人民的文艺，而是反人民的文艺。因此，这种聪明而听话的奴隶文人，我们无以名之，名之曰“奴才（才）”，我看也是一点不过分的；而由他们创作出来的文艺，我们也只能说他是“奴才（才）文艺”。我国最古老的北方文学的结晶《诗经》，老实不客气地说，其中有不少是这样的作品。

因为历史的进步，农业奴隶社会以自身条件的落后，渐渐出现动摇趋势了；并且，奴隶也因为地主的过分压迫，渐渐有反抗的呼声了。奴隶中自觉的特出分子，便也有“不平之鸣”了。故到这时的文艺，开始表现奴隶生活的痛苦和贪官污吏的苛政了。当时，那些聪明而听话的奴才文人，眼看着这样的演进下去是可怕的。为了延续“主子”的特殊地位，希望“政治”也比较地开明一点，藉以消灭奴隶的苦痛而消沉“反抗”的情绪。于是，他们所写的文艺作品，也有一些猫哭老鼠的呻吟，有的也略略地批评地主的缺点以及政治的失策，像韩文公老人的所为那样。但他们这样地批评，绝对不是“反抗”或恶意的。相反的，是希望地主不要太失“民心”，而永远维持其特殊的地位。

《红楼梦》大家都读过的。其中的焦大，为了永恒维持贾府的荣华富贵，便也常常骂贾府中的一些少爷太不长进和行为太放肆。可是，那些少爷们是不知道他的“苦心”和好意的，倒倒地把他殴打一番，结果满嘴灌满了大粪他还在忠诚地教训那些愚蠢的少爷们。所以我们说，农业奴隶社会在动摇的趋势时期中，所有服役地主的文艺，虽然不象农业奴隶社会开始时那样纯粹地颂扬地主和抑压奴隶了，而其实质，仍旧不过是“焦大式”的文艺罢了。这些“焦大式”的文艺家，也常常因为主子的不够“聪明”而受到“冤屈”的处分，甚至“充军”

了、“贬谪”了。因此，在这时期的文艺，纵使和“奴才文艺”不同了，但仍然不是服役于人民的“奴隶文艺”。

总而言之，从农业奴隶社会一开始，文艺便离开人民了。也就是说，自从原始公社崩溃到今世民主政治未争得到，基本上都是“奴才文艺”和“奴隶文艺”。

历史是向前推进的，它不象一些人所希冀地停滞下来。当它发展到欧洲文艺复兴时，因为生产力的进步，在地主和奴隶阶级的中间，产生了市民阶级。这市民阶级之所以能抬头，大概是因为当时希腊城邦制度的发达和商业的繁盛。当这些市民阶级在社会组织中有其相当重要的地位、而又没有力量推翻贵族时，便开始产生了代表其阶级利益的市民文艺。当然，这文艺在那时是极具革命性的，而与“奴隶文艺”大大不同了。易言之，这市民文艺，不再服役少数的地主了。相反地，它代表了当时社会上占相当多数的市民阶级的意志、情感、欲求以及市民阶级的宇宙观。可是，它却不能代表整个人民。因为当时这些中间性的市民，虽然一方面是欲求推翻贵族阶级，可是，他们最大的希望，却想代替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没有真正解放奴隶阶级的意欲。也就是说，他们只想把奴隶阶级从贵族的统治下夺取过来，作为受他们剥削的工资劳动者罢了。故表现这市民阶级意欲的文艺，虽然对贵族阶级来说，它是急进的革命文艺；而在另一方面即对奴隶阶级来说，它并不反映其彻底解放的要求，而仅仅是代表一个市民阶级的利益的文艺。所以，我们只能说，市民文艺的确确不同于奴隶文艺而进步得多了，并代表了当时大部分的市民阶级，可是却不能称为百分之百的人民文艺。

以我们中国来说，从原始公社的崩溃一直到满清末叶的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主要是“奴才文艺”和“奴隶文艺”、或“焦大”式的文艺占领着文坛。这是中国数千年来封

建制度的结果。可是，我国的文艺虽然在历史上是那样的无光采，但，自从民国革命后尤其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艺一跃而比市民文艺更进步了。也就是说，中国的文艺，是没有经过市民文艺的阶段而直接地向人民的或民主的文艺的方向发展着。

上面曾经说过，市民的文艺是在市民阶级发达后才产生的。离去了市民阶级，是决不会有市民文艺的。故民主的文艺，也必须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中、也必须紧密地联系民主运动才能有其真实的内容。换言之，必须要有民主的政治、民主的社会、民主的国家才能有代表全人民的民主文艺。否则，没有民主的政治为基础，民主文艺是决不会从天上掉下的。而且，仅有强奸民意或名不符实的民主政治，也决不会产生真正的人民文艺——即民主的文艺。因为真正的民主文艺，他是具有其独有的特点的：

第一，民主的文艺，是代表全部或最大多数的人民的意志、情绪……和生活的各方面。它的内容，它的形式不能离人民大众；它的作用，它的任务更不能有丝毫的背叛人民的意欲。也就是说，民主的文艺，来自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

第二，民主的文艺，必须是能激发人民创造性和积极性的文艺，它必须能引导人民大众朝向奋发的乐观的正确道路走去。易言之，民主的文艺，必须在精神上能激动读者朝着理想的人生、崇高的目标英勇迈进。

第三，民主的文艺，必须是多数人所能懂解的，否则，便又非民主的文艺了。自从新文学运动以来，因为欧洲文学的传入，我国文艺便有了欧化的趋势。当然，这不能说是不好的现象。然而，在有其数千年独特文化的我国，好象有“格格不入”之弊。所以，这种完全“欧化”，在可能范围内，还是以避免

为妥当。也就是说，我们所要求的民主文艺，是溶合我国传统文学与西欧文学的优点而又具有民族形式的新文艺。

最后，我还得着重地说说，就是今后的民主文艺，应该是极忠诚的：歌颂的固然要歌颂，而应该暴露的也应该要暴露。也就是说，文艺要扬善，也要不隐恶。隐恶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有光明的歌颂，也应该有黑暗的暴露：这就是人民的文艺不同于奴才（才）文艺、焦大式文艺的地方。在抗战的时期，我们在“军事第一”下，文艺仅有歌颂的“义务”，而无暴露的“权利”。老实说，这对文艺本身是蒙受到极大的损失的。今后，我们要求的民主文艺，是忠实地歌颂、忠实地暴露的文艺。现在，在全国四万万人民的争取民主的澎湃巨潮中，文艺是开始走进了它的新阶段，即真正的民主文艺阶段。但这新阶段仅仅是开端。我们必须有新的努力、新的创造，去争取一个崭新的环境到来，使暴露和歌颂不再受限制，使人民文艺有一个新的发展，使短期内超过以往几十年的路。我相信：这样的新环境、这样的新文艺——民主的文艺、人民的文艺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把文艺运动和民主运动紧密地结合起来：以争取民主政治来促进文艺的繁荣，以文艺运动的力量来推动民主政治的彻底实现！

今天，蒙各位这样热诚地来听兄弟这么平凡的讲演，使我感到万分的对各位不住。最后，谨祝各位健康快乐！

（李莎青于1946年3月29日纪录整理）

茅盾在粤港“第二条战线上”

——茅盾佚文《民主与文艺》所引起的回忆

李莎青●

1946年3月29日，茅盾（沈雁冰）在广州、在中山大学的青年人中间，没有直接谈八年抗战胜利后继续战乱的民族灾难。在水深火热的日子里，他抑制了文艺家的慷慨陈词，只以学者的真知灼见，阐述了当时最现实、最敏感的民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

这篇讲话，不但为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文艺工作提出了迫切任务，而且为当时大后方处子苦痛求索的爱国青年，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整个讲话内容，谈的是文艺，实质上是从理论上、思想上为当时广州、华南及白区的爱国民主运动呐喊、鼓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在，根据和当时一些老同学、老教授的叙旧，并参照陈残云等的文章及当时广州、香港、延安、上海、重庆一些报刊的报导，经过再回忆，特写出《茅盾在粤港“第二条战线上”》，聊表对茅公的深切怀念！

一

茅盾为什么要讲“民主与文艺”这个题目？为什么当时他在广州等地每次讲演中，几乎都那样突出民主问题？现在回想起来，很明显，这完全是时代的要求、革命的需要。

●李莎青，湖南省委党校原副校长，已离休。

中国人民从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列强欺压、凌辱，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1945年8月14日日本帝国主义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应该是血染的中华屹立起来重建金瓯的大好时光。可是，蒋介石不顾广大人民的强烈愿望，发动内战，独吞胜利果实，把敌伪封建法西斯的军事、政治、经济机构及其建立的秩序，原封不动地接受下来，移植为国民党反动派封建法西斯统治的机构和秩序。这种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1945年11月间，重庆成立了反内战联合会。同年12月，昆明学生首先举行了反内战大示威。茅盾与郭沫若等26人发表了《重庆文艺界慰唁昆明教授学生电》，茅盾还写了《为一二·一惨案作》一文，并于1946年1月1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要真民主才能解决问题》。

1946年1月，广州等地都举行了反内战、争民主的大游行。茅公则在《真话》第一期刊出了《和平、民主、建国》等文章，支援学生运动。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强大的压力下，又发现自己对发动全面内战还没完全部署好，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要求，在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停战协定，并在重庆召开了包括各党派的政治协商会议。会前茅公发表了《写在政治协商会议前夕》的短论，呼吁真正实施民主政治。政协会议经过激烈的斗争，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及有关宪草问题、军事问题等四项协议。这几项协议，实质上否定了国民党的独裁政治及内战政策，否定了封建买办法西斯主义训政的法统。在当时的条件下，基本上是符合全国人民的和平民主愿望的。

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出尔反尔，居然在政协会议期间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和搜查政协成员住宅的非法暴行。

在1946年1月30日，即全国政协闭幕前夕，孙科从重庆飞到广州，广州学生在示威游行中，包围了刚下飞机的孙科，高

呼“只许政协成功，不许失败”，要求国民党政府“实现四项诺言”、“实行民主政治，取消特务组织”等等，孙科支支吾吾，答非所问。同日，李济深、蔡延楷很多爱国人士都从香港赶回广州参加了在中山大学旧址平山堂（即国民党第一次全代会召开的地址）举行的示威集会。2月26日，广州国民党特务在反苏、反共、反民主游行中，把拒绝参加这种游行的中大学生江仲怡殴打成重伤，成为轰动广州的“江仲怡血案”。2月27日，中山大学成立了人权保障委员会，积极开展争取民主的运动。3月，国民党中央召开二中全会，公然否定了宪法草案的民主原则。这个民主原则，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反动派斗争的焦点。如果这个原则被推翻，政协的其它决议，政府的改组，国民大会的召集及停战整军等协定，在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下，都会撕得粉碎。

就在这个关系国家民族前途的民主和反民主激烈斗争的关键时刻，茅盾偕夫人德沚到了广州。茅盾这次离开重庆，本来是因为国统区文艺运动的中心已由重庆转移到上海、决定到那里去“定居”的，为什么绕一个大弯取道广州、香港？很明显，他是受党的指示，到南中国的最大城市、蒋统区最重要的大后方，进一步支持、掀起民主怒潮，调动文化界的力量，运用文艺这个武器，帮助党开辟对敌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二

茅盾1946年3月16日到达广州，到4月13日才离穗去香港，在广州停留近一月之久。他在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后到上海、到苏联，1948年初又偕夫人回港。茅公在港期间，心系广州，事实上，他始终是广州第二条战线上的民主先锋、文艺导师。

当时，国统区南方的很多进步文化人和演剧队先后汇聚到广州来，筹建了全国文协粤港分会。中山大学等几十个大专院

校也从外地迁回市内，万千热血青年都复员到广州。另一方面，日俘刚遣走，国民党的新一军、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在魏德迈率领的美国航空队的援助下，也从缅北、滇南飞到广州。战云密布，和平反和平、民主反民主的斗争，显得异常激烈。茅公夫妇在这样严峻的时刻突然抵达广州，带给广州的文艺界及广大青年学生无限的力量与温暖。大家异常兴奋，在茅公抵达的当日下午，就纷纷到茅公落脚的开明书店去看他。他不在，闻风而来的文艺界朋友、青年学生越来越多，沈夫人向大家报告了重庆文艺界及民主运动的情况，大家关注地问这问那，听得非常入神。将近黄昏时，茅公回来了。大家围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都说：“沈先生比在桂林时更健壮了！”茅公哈哈大笑，不但看不到他半点“老”的痕迹，而且感到他越来越年青。大家非常高兴地围坐在茅公身边，叙谈中，感到许多事情需要他指导，都热望他在广州多留一段时间。这样，他本来是暂住在凤凰酒店，便干脆在榨粉街北头租了一间民房的二楼一层住下来。

那时，全国文协粤港分会虽已成立，由周钢鸣主持工作，但还没有适当的会址。广德路黄宁婴的家，就成了大家碰头开会的地方。茅公到穗后，首先就在黄宁婴家召开了文协粤港分会的一个小会，也是大家为茅公举行的欢迎会，文协会员20多人参加。茅公告诉大家，蒋介石反动当局，将进一步践踏民主，发动全面内战。希望大家挺起胸膛，在争民主、反内战的旗帜下，大步向前。在和平民主的大前提下大家要紧紧地团结起来。放开胸怀、共同呼吸、共同战斗！一切个人私见、孤高自赏的小圈子主义、自封门户的宗派主义，都应该在壮大的步伐中舍弃掉。新的形势、新的前途，决定了我们的方向：只要不违反人民、不违反民主，就是我们团结的对象，就是我们珍贵的战友！

为了形成更广泛的和平、民主统一战线，必须人下乡、文章下乡，把民主的气息带到广大乡村去。他指出，民主运动是一个大运动，又是一个长期的运动，对象不能局限于几个大城市，而必须推展到偏僻的乡村中去，加强工农联盟。应该积极培养、教育、提拔一大批乡村干部，把这些熟悉乡情、了解乡民要求、又有觉悟的乡村骨干组织培养好、提拔上来，通过他们把广大农民发动起来，民主运动才有广泛、深入的群众基础，才会形成势不可挡的民主浪潮，才能制止内战、消除内战。要做到这点，“洋气”是要不得的，知识分子的姿态、感情和生活方式，都要不得，在人民奋进的道路上，不需要摇摇摆摆的“看客”，而需要真真正正地站在人民的队伍中和人民苦乐相共、全心全意地把自己的感情、生活与人民融合在一起，才能切实发挥进步知识分子的桥梁作用。

茅公以一句话总结自己的讲话：文艺工作者如果离弃了时代，时代也就一定会离弃我们。

这个小会结束后，文协粤港分会接着召开了理事会。决定和别的文艺团体联合举行一次公开的欢迎会，并为茅公留粤期间安排了工作日程。

3月24日，文协粤港分会联合剧协、作协广东分会公开欢迎茅公的大会，在教育路民众会堂举行了。这在广州文艺界，可以说是一次空前的盛会。很多爱护民主、爱好文艺的青年男女早就涌进了会场。800多座位的会堂，却挤满了1500人，连站的位置也找不到的不少人，就只有在门外听了。茅公讲的题目是《和平、民主、建设阶段的文艺工作》，讲了近两个小时。会场除茅公的“蓝青官话”外，寂然无声，更没有中途退出的。话讲完后，大家还不肯散开。经主持会议的人的疏导，大家又聚集在门口，等待着茅公走出。茅公笑容满面地从人群中挤出来，大家便跟着他走。人的长龙一直跟着茅公走到大街。

3月29日，是黄花岗72烈士英勇牺牲的纪念日，本应照例休假。但那天下午，茅公应革命学生的邀请，在中山大学文学学院院长朱谦之、法学院院长梅龚彬的陪同下，到了石牌中山大学。同学们闻讯纷纷提前赶到文学院，12点钟后，就把几百人的大课堂挤得水泄不通。组织这个会的刘承祖、张承袞（犀文）等只得临时把讲演的地点改到法学院大礼堂。同学们一阵风地跑到那里去抢座位，千多人的礼堂容不下两千多听众，很多同学只好爬、站在礼堂四面的窗子上。后来的只能挤在门口，过道上。这是中大自复员到石牌以来，第一次讲学盛会。下午两点，文学学院院长朱谦之等陪同茅公走向礼堂，欢迎的掌声象暴雨一样激荡着校园，朱院长等只好抢先排开人群，引导茅公步上讲台。在持续不断的欢呼声中，茅公和挤在讲坛边的同学热烈握手，并微笑着挥手，向大家致意。

那天，茅公穿的是浅灰色西装，罩着一身灰绒大衣。在热烈的气氛中，他只好脱下大衣。他略带黝黑的脸庞，短而齐整的美髻，乌青向后梳的头发，加上深度不大的眼镜，使他显得很精神。

朱院长简短的介绍词，几度被热烈的掌声所淹没。为什么？在恐怖的低气压下，在长久的窒息中，在无所适从的十字路口，人们是多么渴望听到代表自己心的跳动的呼声，青年们是多么需要先驱者指示救国、救民、救自己的努力方向！

茅公和蔼可亲地简要地开场白之后，马上转入正题。开始的几句话，就非常中肯地道出了讲话的主旨，抓紧了听众的注意：“现在，是人民的世纪，也就是人民争民主的时代。……因此，当代文艺也应该以民主为主题，促使民主的早日实现。这就是现时代所要求的民主文艺！”接着，他以教授、学者的风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而又以文艺家的幽默语言，阐述文艺在人类各个历史阶段与民主的关系及其特有的形态，最

后非常巧妙策略地、意义更广泛更现实地落脚到当时民主运动同真正的民主文艺因果内涵及其必备的特殊条件（任务、要求），并非常简要而又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歌颂”与“暴露”的问题，进而提出当时文艺工作者及青年同学们应该努力争取的目标：“现在，在全国四万万人民争取民主的澎湃巨潮中，文艺是开始走进了它的新阶段。但这新阶段，仅仅是开端。我们必须有新的努力、新的创造、去争取一个崭新的环境到来，使暴露和歌颂不再受到限制，使人民文艺有一个新的发展，使短期内超过以往几十年的路！”这些教诲，虽然讲的是文艺，但敏感的同学完全领会茅公更深广的用意，完全明白当时青年运动走向的道路，也完全认清了自己所肩负的历史重任了！同学们平日苦心求索的真理，在茅公的指点下，更明亮了。

在群情激动下爆发的掌声中，茅公结束了他的讲话。当时室外的雷阵雨，似乎伴奏室内的时代强音后，也暂停了下来！同学们踏着湿腻腻的绿茵绕过法学院前面象征着法治的建筑物，欢送茅公向教授住宅区走去。据陈秋帆教授回忆：茅公及夫人还在梅龚彬、钟敬文等教授家中稍事休息叙谈后，才离开石牌的。

茅公在穗时间，正值香港《华商报》、《正报》在广州成立分社，于新都餐馆举行文化新闻界招待会，特邀茅公出席。第二天，为争取言论出版自由、为争取民主而产生的广州杂志联谊会，也召开了一个文化界欢迎茅公的会议。茅公在这些会上说：“言论出版自由是经政府正式宣布的，给了民众权利（注）；

（注）1946年2月17日，国民党立法院院长孙科再次抵粤，在广州一行轺宦邸招待记者，在大家的质询中，他不得不说：“……中央废止各种限制人民自由法规之命令，希望地方实行。若地方不实行，是地方的责任。人民可以向地方抗议……民主不是谁人可以带来的，是要由下而上去争取的。”（见1946年5月2日延安《解放日报》）。

今天我们来争，是为着维护政府威信，为了实践政府的诺言，防止反动分子犯法。这种争民主的行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完全争到这种合法权利。”在“争”这种权利时，茅公奉告大家千万不要太天真、太老实：“要学习对敌斗争的战略战术，不能只会赤膊子直冲；还应该象打足球一样，用迂回曲折的战术去制胜敌人……”这就不但指明了第二条战线的任务、目标，还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应有的斗争艺术。

在一些公开宴会上，茅公还婉转地就有些人好意或恶意地提出的问题，作了幽默的回答：

——“有人说，在上海别人送了我一幢洋房，那是谣传。一个朋友请我到他那儿去住，倒是真的！”

——“我没有到美国去的意思！如要休养，在自己的中国，不更好吗？”

——“八年反侵略战争时期，我们实行的，是抗战统一战线。现在，是民主时代，我们实行的是民主统一战线；凡是赞成民主的，都可以合作；只有反动派、法西斯分子，我们才坚决反对！”

——“在当前，还是要坚持两条战线的斗争：既要反对左倾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其本质还是右倾，因为它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帮助了法西斯蒂）；也要反对右倾的无原则地和别人统一而不斗争。”

——“当今，文艺运动的路线，还是大众化工作。要使文艺真正能为人民所了解和接受，要使每个文艺工作者真正成为人民的文艺家。”

总之，茅公在广州近一月中，非常紧张，在党的领导下，辛勤而不避艰险地为开闢广州的第二条战线做了别人难于做好的工作。他日夜不停地从这个阵地奔驰到那个阵地，在敌人严

密监视及暗箭深坑中，坚毅勇敢而又机智灵活地到处呐喊、到处鼓劲。讲的话很多，还写了一些文章，但都是紧紧地围绕“民主”这个主题，针对反民主这股逆流、根据不同对象、从理论到现实、巧妙地抓住当局的口头承诺，阐述他的独创见解，使反动派既震惊、害怕，又无可奈何。

三

1946年4月13日，茅公夫妇乘佛山轮到了香港。但他全神注视的，仍在广州、在国内。

茅公这次到香港的心情，本来是很矛盾的。他在后来不久写的《呼兰河传（肖红遗作）序》中曾特意提到：

“从我在重庆决定要绕这么一个圈子回上海的时候起，我的心怀总有点儿矛盾和抑悒。——我决定这么走，可又怕这么走，我怕香港会引起我的一些回忆……。”

为什么？因为他的爱女沈霞在延安为了更好地接受新的任务打胎身亡不久。沈霞与其弟沈霜（韦韬）在抗战初期曾在滬逗留读书。“……为了追求真理而牺牲了童年（指沈霞去延安），为了要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对民族、对社会有用的人而甘愿苦苦地学习，可正当学习完成的时候，却忽然死了，象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比在战斗中倒下，给人不知如何的感慨……。因此我这第三回到了香港想去再看一看蝴蝶谷这意念，也是无聊的，……即使去了，未必就能在那边埋葬了悲哀。”

然而茅公却强抑自己个人的哀痛，为了革命，不但来了香港，而且斗志昂扬地站在青年们、文艺界的最前方，密切注视广州、内地的学运。在4月15日文协粤港分会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迎宴茅公夫妇时，他根据重庆、广州及全国看到听到的情况，开头就说：“几个月来，中国政治现象有如病人‘打摆子’，一阵热，一阵冷，一个潮起，一个潮落。目前，又算到了高

潮。”茅公以这个比喻来说明中国的民主运动每经一次打击，却更向前、向高潮跃进一步。他向大家指出：“中国民主的前途，大势是乐观的。因为进步、和平与民主是人民一致的要求，但反动派的阻挠也不可忽视。因此，民主的路还是一条艰苦的路。……一定有很多迂回曲折。”因此，茅公要求大家：“必须培养实力，增强主观力量。”

茅公还进一步揭露了反动派反民主的伎俩：“第一，是以武功对付文化……比方撕书撕报、打架捣乱、开枪、打石头之类。第二，以文化对文化。比方你有一个团体，他也来个团体；你办一个刊物，他也来个刊物；并且也装做谈民主，跟你来个‘双包案’。第三，以统一战线对付统一战线，对于中间的人、无所谓的人，他们是会拼命拉拢的……”。茅公幽默地告诉大家：“像我，他们也来做过一番统一战线的。他们没有人写得出文章，但跑腿的人却有的是；此外，他们还有钱！”因此，茅公还进一步阐述了在广州各个会议上所作的号召，如要建立广泛的民主统一战线，注意克服‘左倾’和右倾问题等等。

在当天文化界的欢迎晚会上，茅盾谈文艺大众化问题，比在广州时谈的更深了。他认为文艺工作应向人民学习，他说：

“抗战初期有两个口号，就是‘文章入伍’和‘文章下乡’。前者因为政治逆转，进步文人根本不能进军队里去；后者政治环境不允许，但文化工作者本身也得负一半的责任。这就使我们并不懂人民的痛苦和要求……。支持了八年抗战的，是老百姓。……老百姓对于贪官污吏、保甲长压迫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民主政治，并没有什么深文大义，只要能分别好坏就够了，而老百姓是分别得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所以，我认为中国老百姓是绝对有资格谈民主的。相反，不配谈民主的，倒是那些不准老百姓谈好、谈坏的人。在这里，文化工作者是要向人民学习的，懂得他们的意见，才

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再，现在有人办刊物、弄团体，也挂起‘民’什么的招牌，实际上是反民主、反人民的。这些东西，老百姓虽不识字，一定看得出它的骨头来。文化工作者的任务就是帮助老百姓揭破这些假面。文化工作者的正确立场，是要老百姓百分之百地有资格做主人公，但同时得注意老百姓由于长期被压迫所形成的落后性，比如不科学、迷信等等。要向人民学习，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帮助人民纠正这些落后性，否则也是不对的。”

他提出：“今后的工作方向应该是眼光向着农村，向着广大人群，而不能只集中在大都市。文章要做得人民大众懂，‘雅俗共赏’，就是此意。”他自谦20多年的写作生活，在这一点上失败了。文化界一般都在这一点上失败了。只有歌咏，在这一点上比较成功，只要唱的歌不象国歌（指民国国歌）那么晦涩难懂，就会受到老百姓欢迎，就会真正感动老百姓。”

茅公不久参加港九学生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大会，他在演讲中指出：应走和平民主路线。同日，他还在《华商报》发表了《‘五四’与民主运动》一文。正是这天，广州反动当局则纠集了少数人举行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游行，砸了位于财政厅前的《华商报》广州门市部和兄弟图书公司，被撕破的进步书报，撒满了大街小巷，同时还打了人，查封了所有民主刊物。当天晚上，广州文艺界及进步青年们则借用长堤基徒教青年会地下礼堂开大会纪念‘五四’、抗议反动派暴行，由周钢鸣主持，黄药眠讲话。最后由中大同学演出活报剧《群魔乱舞》，痛斥反动当局的丑恶嘴脸。消息传到香港，茅公在气愤中马上写了《关于广州“五四”暴行》一文刊登在5月10日《华商报》副刊的《我们以更强大的民主力量抗击暴行》专栏中，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提出了严正警告。

当年5月26日，茅公夫妇由港抵沪。半年中为争民主、支

援学运，和沈钧儒等又多次联名发表有关声明，谴责当局的暴行，要求政府切实保障言论自由。12月5日到苏联，1947年4月25日归国抵沪。

这时，正值全国民主运动处于异常激烈阶段：内战与反内战、饥饿与反饥饿、逮捕与反逮捕、枪杀与反枪杀、卖国与反卖国的斗争如火如荼。全国青年学生、进步人士绝大部分被迫走上街头：罢课、罢教、罢市、罢工，国统区怒潮沸腾，反动派一筹莫展。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同志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派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

毛泽东同志这篇评论发表的第二天，即5月31日，广州学生示威大游行中，屡遭特务、暴徒冲击毒打，甚至开枪射击，血染珠江，重伤21人，轻伤30余人，捕去48人。广州警备司令部如临大敌，当日深夜又调集2000余军警，布署轻重武器，包围中山大学，机枪对准所有交通要道及宿舍门前，捆绑法学院院长梅龚彬教授，又捕去彭芳草教授及学生等10余人。这几天，武汉、上海、昆明、北平等很多大城市的学生都惨遭镇压。仅6月1日这一天中，国统区内被捕学生、教师、记者、进步人士竟达3000人左右。接着，勒令广州30多种报刊停刊，并查封13个文化机关。茅公等在6月1日、3日就这些惨案连续发表书面意见和公开信，表明他们的愤慨及坚定立场。

1947年底，白色恐怖日益严重，茅公在上海也难以安身了。在党的安排下，于1948年初又一次回到香港。除经常关注广州、内地的学运、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外，着力从文艺写作上更具体、更形象、更动人地促进青年们的觉醒、促进国内第二

条战线上的纵深发展，意图将从抗战开始至“惨胜”前后的八年中的重大政治、经济及民主与反民主、特务活动与反特务斗争等等作个全面的描写，来更有力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这是一部史诗性的巨著。茅公原计划写五部，后来由于条件所限，仅完成了《锻炼》一部。这部小说边写边在《文汇报》发表，连载25章。间接而更有力地鼓舞近在香港的广州青年的民主斗争。茅公还写了一些着重反映解放战争时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的历史命运，歌颂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及苏联欣欣向荣的图景。如《苏联游记》、《惊蜇》、《一个理想碰了壁》、《春天》等短篇小说。他以这些文艺创作引导在黎明前夕苦斗的广州青年、全国青年看到胜利的希望，也提醒大家，切勿放松斗志！

直到1948年底，茅公和在港的民主人士，在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的安排下乘船北上，到北京参加筹备政协会议。

总之，茅公从1946年3月16日来广州到1948年底北上为止的两年零九个月中，除在沪半年多、在苏近5月外，其余的大部时间（约一年零九个月）都在粤港。粤港从来是紧紧连接在一起的。人员来往、报刊信息的交流，犹如一个城市（那时两地来往没有任何限制，不需办任何手续，买一张车票、船票几个小时就到了），甚至不少进步人士、文艺青年都同在一个组织内活动（如全国文协粤港分会）；因此，茅公在香港，就几乎等于在广州一样，他的声音、他的文章、他的书刊，通过种种渠道，都能很快地到达广州、文化界及青年们中间，使大家及时地受到他的教育、指导！

四

从以上情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茅公在解放战争期间，在党的领导下，对开辟广州、华南等地的第二条战线，对

推动羊城的人民文艺运动，对以上两者的有机结合、互相促进上，起了极大的先锋作用、导师作用；尤其茅公以其崇高的威望，以其“超党派”的民主人士的优越身份，能够公开地到处在成千上万的青年群众中、文化界里大声疾呼，能够在明处毫无顾忌地以其坚定、灵活的战略战术与反动派面对面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周旋、争斗，使敌人暗枪冷箭难于施展其伎俩，使青年学生、文艺界胆壮心雄，更加自觉地朝着正确的方向、在第二条战线上浴血战斗。这样，广州的爱国民主运动、文艺运动，既有“地下”的党的正确领导，又有“地上”的茅公的鼓励、指点，便如南海狂浪、珠江怒潮，汹涌澎湃，冲击着华南反动派的封建法西斯的统治基石。

在这里，拟着重就广州及华南在茅公的影响下文艺战线与民主运动的结合方面略加追忆。

当时，广州公开发行的文艺、文化刊物（报纸的文艺副刊在外）就有司马文森、陈残云办的《文艺生活》和《文艺新闻》；周钢鸣、洪遭办的《国民》；周行、荷子（何芷）办的《草莽》；于逢、易巩、严主人、野曼办的《文艺世纪》。这五种刊物都遵照茅公的指示，把主编人的名字标出来，提防反动派以假乱真。茅公离穗到港的第三天（4月15日）中山大学文化社团联合会成立，创办了《中大文讯》，后来又出版了《人文报》。陈汉欣、李坚则在重庆《新华日报》青年副刊主编刘光的指点，又经中共中央南方局方方的批准、指导，成立了中流出版社，出版了两集以反内战、争民主为内容的《民间歌曲选》，创办了《世界新潮》半月刊。

广州除了这些铅印的公开发行有关文艺、文化的刊物外，油印的、从香港偷运进来的、从琼崖纵队、东江纵队秘密寄达的报刊、资料，就难以计算了。尤其是在茅公有关民主与文艺的几次讲话导引下，青年学生们自写、自编、自画的诗歌、小

说、论文、评论、漫画，往往都是在黑夜与特务捉迷藏中以壁报形式贴满学校，似夜空繁星，争奇斗艳；围绕当时全国人民群众对和平、民主的要求及国家民族历史转折的迫切任务，同学们借以交流激情，抒发向往，揭恶鞭邪，扶正扬善，笔锋犀利，真切动人。这些刊物、壁报，犹如一把把匕首、一颗颗子弹，在敌人心脏里穿刺、爆炸。

有些刊物及文艺组织，还往往超越广州，在全国各大城市之间相互形成交岔的网络，如中大的有些文艺青年曾被北平诗歌协会吸收为会员。我在茅公《悼征军》文章的感动下写出的《悼诗人征军》、《打开头上的天》及李沥青的一些诗作，也为北平诗协所主办的《呼吸》、《北方》等报刊登载了。这种全国青年们、文艺界形成的团结局面，给大家增强了战斗的信心。

在广州、在中大，几乎每次强烈要饭吃、争生存，要和平、反内战，要民主、反独裁运动之前，文艺界、文艺青年往往都是按照党、按照茅公、也是当时中华全国文艺协会总会提出的“为人民大众服务、实现和平民主的要求”，以自己的歌喉、舞步、画笔及诗话鸣锣开道。同学们自己改编的《和平民主才能生存》、《求生运动进行曲》、《团结就是力量》等悲壮的歌声经常似春雷荡涤夜空阴霾；示威游行日的清早，歌咏队的《晨呼歌》、《示威游行》，叫醒同学们“排好队伍，齐步向前……打碎压迫锁链，永做自由人”；在游行中，高唱《火把》：“……我们来了/举着火把/高呼着/用霹雳的巨响/惊醒沉睡的世界/我们是火的队伍/我们是光的队伍/……你们都来吧/你们都来参加/不论站在街旁/还是站在屋檐下/来喊口号/来游行/来举起熊熊的火把/把我们的愤怒叫出来/把我们的仇恨烧起来”在会场上、在街道上，碰上特务、反动军警，面对他们刺刀尖、机枪口，怒吼《你这个坏东西》！当同学们受镇

压、倒在血泊中、关在监狱里、躺在医院里时，大家泣不成声地吟唱《五月的鲜花》、《慰劳歌》等，表达年青人的义愤、抗议及战斗情谊！

广州文艺界、青年学生，还在茅公文艺与民主讲话的指引下，又得到复员回到广州的专业文艺团、队的辅导，纷纷建立了业余的文艺演出组织，仅中山大学就有“南燕剧社”、“创造画社”、“中师合唱团”、“流动歌咏队”……。其他大专院校著名的文艺社团，有文理学院的“梅歌咏团”，法商学院的“黎明剧团”，岭南大学的“艺文社”，文化大学的“联合歌咏团”、市艺专的“创作社”、国民大学的“青春歌咏团”等等。几乎经常有它们的演出。如《还乡泪》、《还乡难》、《黎明》、《兄妹开荒》、《风雨之夜》、《师生一家》、《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等节目都非常感人，策励大家勇往向前。

在示威游行中，往往是宣传车在前头开路。搞话剧的，化妆演说；歌咏队，尽情引吭高歌；搞艺术的，高举“内战千古——国立中山大学贺”的大花圈，配有讽刺诗的巨幅漫画及复制《马凡陀山歌》的画图则间立在修长队伍的各区段中，使争和平、要民主的行列，更为壮丽，吸引着广大市民支援、参与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40多年后的今天，印象仍难忘的，就是当时广州一些专业文艺家，遵照党及茅公的指示，深入基层、深入学校、深入第二条战线前沿的感人演出。如中大教授马思聪、黄友棣多次为同学们举办的音乐会，尤其是马思聪义愤填膺地谱写的《抛锚大合唱》、《民主大合唱》、《祖国大合唱》、《春天大合唱》，如号如角，如潮如涛，如鼓如雷，激励着同学们。其中以陕北郡鄙调子开始、象征光明将从延安方面来的《祖国大合唱》，在马思聪刚健有力地指挥下的专场演出，几乎把4000多青年的丹心热血都纳入到这大合唱的旋律中了：“呵 / 祖国

人民起来了/排山倒海般起来/……你就要从血泊里永生/让我们拍着手掌欢迎新中国……/。这近两小时的时代强音，很快地不脛而走流传到全国各大城市及南洋各地。当南京的艺术家在玄武湖畔演出这场大合唱时，万人参加，国民党当局震惊中，居然下令冲散了这场演出。但，这反而从另一方面显示了来自广州的时代音符的力量！

另外，丁波带领剧宣五队及七队到“中大”等学校的频繁表演，一首首带血、带泪的歌曲，一句句充满抗争、充满希望的台词，给广州的民主运动，也从情感上加深了不少热能！

当时，广州学校的教学中，不少进步教师、学者，在党的号召、茅公多次讲话的启发下，联系时代潮流传授知识、理论，尤其是文科、文学专业的课程，更是如此。如中大文学院教授钟敬文在他为我们开设的《民间文学》、《文学概论》等课程中，很多地方就是党及茅公有关文学的观点、文艺大众化的主张、文艺家的修养等等方面的深化、系统化的论述，使同学们在理论学习中，潜移默化地端正了革命的文艺观、人生观。钟敬文及朱智贤老师等就是因为这样和支持同学们的正义斗争，在广州“五·卅一”血案后被当局解聘、逼逃到香港去的。

至于茅公在粤港公开反复提出的民主统一战线以及“人下乡”、“文章下乡”等“民主下乡”的要求，也很有效地帮助了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广州市、中山大学党领导顺利执行了党中央对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

日本投降后，广州知识分子和其它蒋管区一样，不少人对国民党的政策，抱有幻想。具有“民主个人主义”的思想的知识分子，虽然认为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不好，但对中国前途始终看不准，对美国式的民主、美国式的制度，有错觉，而对共产党则有疑虑，甚至惧怕。但当他们看到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支持下完全不顾人民的意愿向解放区进攻造成的恶果（如遍地饥

荒、全国流血、恶性通货膨胀、残酷专制镇压等等），又在著名“党外人士”茅公多次有关民主的精辟论述教育下，绝大多数青年学生、教授、专家，甚至国民党的不少开明人士在民主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在民盟、民革、农工等民主党派的推动中，由醒悟到挺立起来“争生存”、“争民主”、“争解放”了。只举一例：在1947年广州“五·卅一”血案，紧接国民党调集军警特务2000人“围剿”中山大学期间，在党领导的民主党派影响教育下的绝大多数同学、教授、职工，都情不自禁地齐声吼着《团结就是力量》，进行了坚强的反“围剿”，个个紧握砖石、木棍，断自来水管，把内奸几乎全部赶出了校园，在体育馆斗争了死不觉悟的特务学生；从“三青团”办公大楼抢出了关押的梅龚彬院长。当时中山大学的石牌，虽然成了“红色”禁区，邮电交通被截断，外出同学、甚至炊事员出去买米、买菜都被毒打。但禁区内的几千学生及教职员工的争民主的相依为命的团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

华南党及茅公民主统一战线的号召，由点到面、由校内到校外。如王亚南教授的得意门生、中大校友余志宏，回到湖南后，担任中共地下省工委统战小组的负责人，根据党的指示，具体、直接对程潜、陈明仁等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做了很多工作，为湖南的和平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校友何之光受余志宏之托，到台湾请程星龄回湘促进和平解放、校友涂西畴在长沙国民党军、警、宪、特中做了大量的策反工作，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广州的文艺界、青年学生，在茅盾先生诚挚的“下乡”、“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更在党的具体领导和安排组织及民主党派的大力协助下，奔赴农村，发动群众，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据我所知，粤港的热血青年来到湖南各地从事革命工作、下乡引导广大农民争取民主要求、参加农村游击战争的，

就有200人以上(包括串连先回湘的粤港学生及原在湖南坚持地下斗争的刘东安兄弟、谢斐然、吴仕元等)。如校友郭名善、李寿康,在中共广东五岭地委的领导下,于1947年10月率领武装农民在桂东起义成功(后孙立也参加了该部队的领导),成为解放战争期间湖南人民以自己的力量推翻反动独裁政权的最早县份之一。又如中大学生张犀文(承寰)、黄道奇(维中)、何之光和胡兆瑞、卢其超、吴均(守义)、陈一凡、蒋璠、谭新东、沙成章、袁理凡(本香)、黄馥白、刘兆立(照黎)、金星(可钊)、罗绍云(马方)、刘梦华、陈修河、陈守均、严定如、罗祥生、张国兴、周铁泗、周泽民等40多人到湖南后,先后在邵阳、衡阳、衡山、东安、慈利、长沙、湘潭、常德、澧县、安江及郴州一些县发动群众,进行统战策反、组织农民暴动;香港分局还先后派了大批粤港青年党员金波、漆添鸿、李桐、周岳生、廖伯石、刘良仁、欧阳淳、彭开启、黄民熙、张明琰等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如“红鹰社”的李一扬等)到湘南、湘西、湘东、湘北乡下发动群众,进行推翻国民党封建专制政权的斗争。甚至不少广东籍及东南亚的华侨青年,如杨重华、陈克、梁天培、陈遐赞、李培、吕洪等也参加粤赣湘人民解放总队、北江一支队、连江支队、湘南支队、湘南游击司令部在郴州地区各县从事领导革命活动。

更值得一提的,就是湘南武装斗争中的文化工作,在亲聆茅公的文艺青年的努力中,又在著名作家白薇的指导下,使文艺与民主的结合,搞得有声有色。白薇这位顽强、正直、坦率、倔强、豪爽、嫉恶如仇、要求自己 and 男子汉并驾齐驱的女作家,1947年回到资兴老家不久,接到香港何香凝寄来的信说:“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为人民多做些工作。”她完全领会何大姐的意图,决定留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在乡下做启发群众觉悟的工作,最后和广州回来的青年一同参加了游击

队。解放后，在她写给周扬的一封信中，曾回忆这段历史说：

“……美梦于我，竟实现在湖南的大庾岭北麓，我是湖南南区游击队的成员，从秘密组织活动起，到实际游击半年后，地下党用明文令我搞宣传文教。于是展开我梦寐以求的快乐生活。快乐和艰苦是两面合一的，苦是甜极的……我乐滋滋地感到‘这才是人生’。……那样的生活如搞长些、标准更正确些、大公无私地坚持到底，那是生命千岁，千岁中如鲜花、碧草活生生，这才算活着！”多么铿锵的“梦”、多么豪迈的实践！当时，她除写了大量的宣传文件外（如《游击队宣言》、《告国民党军政人员书》、《告三湘父老兄弟书》），还带头创作了不少文艺作品，可惜散失了不少。现在可以见到的，诗歌仍有3000余行及描写随军医生的中篇小说《女医生》。她领导湘南支队文工团的精采演出，如歌舞剧《刘胡兰》等，至今仍栩栩如生地刻印在人民的心中。当然，白薇并不一定是茅公“人下乡”、“文章下乡”的直接号召下才留在五岭农村的，但她争民主的言行典范、她英勇顽强的文艺家形象，却往往令我们更现实地体会到茅公对广州、华南文艺青年教导的深义。在这种仰慕激情的驱使下，以我来说，曾恳切请求组织让我遵循党和茅公有关文艺工作的教导、留在白薇大姐身边学习专业文艺创作。可惜由于当时军事斗争、政治斗争的需要，没有批准我的要求。

黄爱、庞人铨被害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湛小岑

我和夫人李毅韬早年在天津南开大学与周恩来、邓颖超、黄爱同学，一起参加了“觉悟”社，一起从事反帝爱国活动，彼此之间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周恩来夫妇出国留学去了，黄爱回湖南成了著名的劳工领袖，我们夫妇则在《国民日报》办“觉悟”副刊。我们与周、邓、黄之间仍书信来往密切。尤其在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杀害后周恩来非常激动地写诗、写信给我，对黄、庞之死评价甚高。黄、庞之死，距今整整70周年了。现将当年情况叙述如后，以示纪念。

湖南劳工会，是1920年11月，由黄爱、庞人铨、王光辉、张剑白等发动组织起来的。当时，湖南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组织也如雨后天春笋，蓬勃发展。湖南劳工会成立不到一年，基层组织即发展到20多个，会员增至7000人。

黄爱，字正品（1897—1922），湖南常德人，“觉悟”社社友。1922年1月17日，他和庞人铨是在领导湖南第一纱厂工潮时，被湖南军阀赵恒惕杀害的。

湖南第一纱厂是1913年湖南官商合办筹建的企业。由于南北军阀混战，一直没有建成投产。1917年因资金不够，该厂工程筹备处把企业租给湘南华实公司经营。后来，华实公司也没有这个能力，又租给江苏资本家赵子安。这样，激起湖南地方工

●湛小岑，湖南安化人，任国务院参事、民革中央监委会常委，现年95岁。

商业家的反对。他们要求取消与华实公司的租约，另招湘股，同时，反对从外省招收技术人员和工人。华实公司为了维护他们的承租权益，就向赵恒惕赠送五万银元股金，要求赵恒惕“保护”。

1921年，纱厂建设竣工试车，湖南第一纱厂就此由华实公司正式主持生产。

以黄爱、庞人铨为首的湖南劳工会，首先起来反对纱厂由资本家承办，湖南全省人民的血汗，不容许资本家来侵吞，要求纱厂立即收归公办。为此发表宣言，举行游行示威。赵恒惕因受华实公司的贿赂，马上出兵进行武力镇压。但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彼伏此起，由工人罢工，到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声势越来越大。

1921年旧历年底，省会许多工人和教职员因得不到工资，掀起了反对赵恒惕政府的“索饷风潮”。第一纱厂的工人提出了年终发双薪的要求，资方不理，暗地与赵恒惕密谋，决定采取“杀一儆百”的手段诱杀工人领袖黄爱、庞人铨。他们用电话通知黄、庞到省总暑谈判，当即逮捕。第二天早晨，就将黄爱、庞人铨惨杀于浏阳门外的雪地上。这是1922年1月17日的事。与此同时，赵恒惕查封了湖南劳工会和该会出版的《劳动周刊》。

黄、庞牺牲后，毛泽东叫张剑白带领黄爱的父亲到广州向孙中山大总统请愿，要求严惩屠杀工人领袖的刽子手。孙总统当面答应查办，可当时孙中山管不了赵恒惕，革命的领袖手里没有革命的武装，此案也就只好查而未办了。

在赵恒惕的白色恐怖中，湖南劳工会的部分领导和会员撤到上海，会同我在上海成立了“湖南劳工会驻沪办事处”。由王光辉任书记，继续坚持反帝、反军阀的斗争。3月下旬的一个星期天，办事处与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一起，联合举行

黄、庞追悼会。邵力子在《国民日报》、《觉悟》上发表文章——《追悼会不要白开》。我于4月2日在《觉悟》上发表文章，倡议召开一次全国劳工代表大会。经过邵力子的多方奔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于4月12日发出了通知，华北、华中各地工会代表大会于5月1日在广州胜利召开了。

后来，毛泽东在湖南船山学社举行了追悼会，发行了纪念黄、庞的特刊，通电全国，历数赵恒惕的滔天罪行。

1923年1月16日，周恩来从柏林给我和李毅韬来信，并附寄了第二国际左派领袖、德国共产党创始人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照片，他俩是1919年1月15日被德国反动政府杀害的。信中指出：“昨日是此两张像片中人的被害四周年纪念日，明日又是黄、庞的血祭日了。在此两个悲惨的纪念日中，你我的感情却是些甚么？前日，柏林各处都有纪念会举行，且有示威行动，但不甚激烈。去年的昨日，中国北平、广州、上海正开了很盛的卢、李纪念会，过两日，长沙浏阳门外雪地上便演了《中国卢、李》身首异处的惨剧，今年的昨、明两日呢？”

周恩来把黄、庞和卢、李比拟，用他们的牺牲，阐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残酷性，从而揭露了反动派的本质，不论是德国的还是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他们对于革命者的镇压，都是一样的残暴。尤其信中最后一个问号，发人深思，给人激励。启示人们在当时形势下，在血的面前，真正的革命者应下怎样的决心，在先烈走过的路上，应该如何迈步？

这时，我已与李毅韬结婚（李在“觉悟”社代号是43，曾化名峙山、施湖、施山等）。我们夫妇在天津与邓颖超等共同发起成立了“女星社”，出版《女星旬刊》，由李毅韬任主编。又办起了“女星成年妇女补习学校”，由李任校长。1924年1月又协同刘清扬、邓颖超出版《妇女日报》，由李任总编辑。

当时，周恩来还寄来了一首题名《生别死离》的诗，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

.....

没播革命的种子，
却盼共产花开！

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
却不用血来染他，

天下哪有这类便宜事！

.....

贪生的人，
也悲伤别离，
也随着死生，
只是他们却认识不透这感人的永别，
永别的感人。

周恩来指出：“正品（即黄爱）的死，真是壮烈而又悲惨……我对他的唯一纪念，便是上边那首表示我的心志的诗和最近对于C、P坚定的倾向……得到正品这个死耗，更使我的信念十分坚决。无论如何，我总信我可以不负这个死友了，不管他信的是C，还是A……”。

1932年春，我和翦伯赞在天津出版《丰台》旬刊，揭露国民党南京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抵抗的卖国实质。不久，《丰台》旬刊被封，又组织“劳动问题研究社”，出版《劳动季报》。

这一年我曾回过湖南，在长沙会同湖南总工会的会员把黄、庞的忠骨安葬于岳麓山。这真是：

岳麓如冠，盖不住忠魂怒发；

湘波似雪，映衬出碧血长虹。

解放后，王光辉将湖南总工会所有文件交给中共中央统战

部，这些资料现存全国总工会。

1952年，刘少奇同志到长沙，湖南总工会评议员周天朴请求给黄爱、庞人铨修墓。刘少奇随即批示湖南省民政厅和省委统战部照办。现在岳麓山上的黄、庞公墓就是1952年重修的。

（梁竞存整理）

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始末

彭 铭 鼎

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是由原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营、西北行辕更改后的名称。名称虽经几改，其职权始终未变，它是统辖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党、政、军全权的机构。兹就其演变到最后崩溃，略述其梗概如下：

一、西北行营

所谓西北行营，系于1946年由国民党原第八战区长官部改组而成。抗日战争结束后，所有战区名义都不复存在，而西北方面，由于“伊、塔、阿”三区人民起义反蒋，气势汹涌，而蒋正阴谋全力反共，无暇西顾，乃于1946年设行营于兰州，全称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营。派张治中为行营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张常驻迪化（今乌鲁木齐），与三区首领阿合买提江言和，以缓和新疆局势。当时国民党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张治中、陶峙岳、宋希廉、刘孟纯、彭铭鼎、汪承钊等。行营的编组大致如下：

一、行营机构本部：

主任：张治中。付主任：陶峙岳（常务）、郭寄嶠（兼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参谋长：宋希廉（就任三个月调任新疆警备

●彭铭鼎，湖南益阳人，当年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任少特别参谋长兼102军副军长，与陶峙岳将军一道率部起义。后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现已离休。

总司令，参谋长一席由杨德亮继任）。参谋处长：首任为陆军大学中将战术系主任沈静，1946年9月，沈与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彭铭鼎对调。情报处长：王孔安；补给处长：刘味书；人事处长：何其祥；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军法处长：孙耀武；总务处长：先为拜伟，后由刘光汉继任。办公厅主任：祖若衡；高参室主任：张某（忘其名）。

二、行营所辖部队

行营警卫团、宪兵22团、通七团、第八补给区、骑兵学校（附骑兵教练旅）、高级步校；宁夏马鸿逵（俗称宁马）所属第18军（即整18师）、骑兵第十旅；马鸿宾（驻宁夏同心城，不属马鸿逵）所属第81军（即整81师）；青海马步芳（俗称青马，1946年进驻陇东）所属第82军（即整82师）、骑兵第八旅、骑兵第十四旅；新疆警备总部所辖新二军（胡宗南系）、第42军（胡宗南系）、骑五军（青马系）、骑四旅（原新疆部队）、骑九旅（原新疆部队）。

河西警备总部：该总部前司令为陶峙岳，陶于1946年6月调新疆，组织新疆警备总部。原河西总部的部分人员随陶入新，原驻河西的部队早已大部入新。其余在1947—1948年间全数东调。该总部仅剩一个警卫营、一兵站分监，1949年5月增加一骆驼兵团，另若干地方治安部队。

有人说，1949年6月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又兼河西警备总司令，决无其事。1949年6月青马已入主兰署，权势熏心的马步芳怎肯让陶成为双料总司令？

二、西北行辕

1947年国民党各行营一律撤销，兰州行营改为行辕，职掌仍旧，内部编组略有变动：

一、军制上的小花招——处的名称和排列稍有改变。

编组军队首先要有人，计划和指导作战必须有情报，作战消耗需要有补给，基于此，乃将行辕的人事、情报、参谋、补给各处改称为一、二、三、四处。第一处长：何共祥；第二处长：胡子萍；第三处长：彭铭鼎；第四处长：刘惠书。其它：政工、军法、总务、办公厅、高参室等仍旧。

二、行辕所辖部队略有变动。

1. 抗日战争后，军多改为整编师，此时有的又恢复军的称呼，实际是标签不同，内容完全一样。

2. 陇东增加了白海风的骑兵第一旅。

3. 兰州设警备司令部，由原驻兰的新四师师长周嘉彬兼司令。

4. 河西走廊濒临外蒙，边境沙漠浩瀚千里，甘、新交通常遭蒙骑骚扰。笔者当时向庶理行辕政务的常务副主任陶峙岳建议：建立习惯沙漠生活的战斗骆驼团，供边境巡逻使用。经报请国民党中央批准，该团于1947—1948年逐步建成。置腾格里沙漠的民勤县集训。该团团长由行辕第四处参谋贺新民调充。该团由四个骑枪连、一个机炮连组成。根据巡逻任务，以精干、轻快为主，故编组限额为千人左右。当初研究编制是这样计算的：每连150人左右，共五个连，加上团部、研究及勤务人员共约千人。

以骆驼编组战斗队，接近代军史来说，这还是创例。因此从驼到兵到干部服行边防巡逻战斗任务，全都陌生，须经长期摸索（训练、试战）才能肯定其得失。当时只是一种试验性措施。解放之初，彭总（彭德怀）嘱咐完整的保留下来，意即认为这一试验不宜中断而已。

5. 各省正规部队变化不大，保安团队都有扩充。

三、与西安绥署呼应进犯边区。

1947年，胡宗南进犯延安，蒋介石令行辕配合行动。其情

况大致如下：

1.青马的82军及两个骑兵旅并配属平凉地区的保安团队为陇东兵团，向合水、庆阳以东地区进攻。

2.马鸿宾的81军及白海风骑兵旅为海固兵团，进窥曲子、环县。

3.宁马的第18军及骑十旅、附宁夏保安团队为宁夏兵团，掠取三边后，相机向榆林进攻。

这一行动结果：，海固兵团在环曲之线遭到歼灭性打击，所剩残余逃回同心城；陇东兵团龟缩宁县、西峰镇，禁若寒蝉；宁夏兵团躲避一野惩罚后，一度窜到榆林，随即惶惶逃回宁夏。

三、西北公署

1948年，国民党的各方面军都改为“剿总”或“绥署”，国民党中央令西北行辕改为西北“剿总”。张治中为保持其骑墙面目，既不愿改为“绥署”，更不愿改为所谓“剿总”，乃要求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改组后的公署，从五泉山迁驻新建的“三爱堂”，这“三爱堂”是张治中命名的。他说这“三爱”即爱兵、爱民、爱友军，并说友军就是解放军。中央为此对张颇多责难，但张向来在蒋面前装罗得势，故未被深究。

一、公署机构本身。

公署职掌与行辕同，但人事上略有变动，行辕改为公署后，行辕主任改称公署长官。

长官：初为张治中，1949年春，张去南京争取和谈，长官职务先由付长官兼甘肃省主席郭寄嶠代理。同年5月中央令马步芳正式接任长官职务。

副长官：陶峙岳（兼新疆警总）、郭寄嶠（兼甘肃省主席）、马鸿逵（兼宁夏省主席）、刘任（是崩溃前夕加上副长官这一

头衔的)。不兼别职，专领副长官名义的有马鸿宾。

其中常务副长官先为陶峙岳，1948年秋，陶兼新总，公署常务由郭寄嶠接替，迄马步芳接掌兰署，常务副长官名义随之取消。外间传说董其武为西北长官公署副长官，但从西北行营时代起，迄1949年9月，公署所剩残余部队在酒泉归向人民止，从未听说辕署里有董其武其人。

参谋长：先为杨德亮。杨走后，由桂系伸到西北的爪牙刘任接充。

副参谋长：彭铭鼎。迄1948年秋，郭寄嶠接管公署常务，郭寄嶠推荐彭月翔为第二副参谋长抓情报和后勤〔彭月翔原为甘肃省保安副司令，为郭的亲信，顾祝同的老乡，与胡宗南、顾祝同关系密切，受他们的唆使，纠合246师师长沈芝生、173师师长李焕南等反对起义。胡宗南电报斥责陶等说：“据彭月翔电报你们要率部投降，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殊属无耻。”在起义斗争中，彭月翔初则要求胡增援，继而乞求派军协助，最后求顾派飞机接他逃走。终于飞机也不敢来了，在走投无路的绝望中，被迫跟着起义部队一路过来了。他与胡、顾联络的秘密电台，在解放过旬后，经康世恩同志勒令康世诚（世诚是世恩乃兄，系彭月翔的主要帮凶，原为国民党平凉地区专员）交出来的。〕。

处室：第一、第二、政工、军法各处及办公厅、高参室的领导都未变。第三处处长为张焕琪、第四处处长蒋树勳，总务处长余易麟（其中第一处处长何其祥，解放后继续通敌，1950年在兰州被镇压。

青马接管公署后，他带来了以马骥、马绍武为首的所谓“智囊团”数十人，总揽公署一切军政大权。原公署人员不过装装门面，联系非马家部队，应付中央而已。

二、公署所辖部队。

1948—1949年间，甘、宁、青三省竞相招兵买马，扩充势力，迄解放前夕，公署管辖范围所有部队大体如下：

1. 公署直属单位。

兰州警备团（原行营警卫团改称的）、宪兵22团、机械化工兵团、通七团、骆驼兵团、榴弹炮营。

2. 配属单位：第八补给区，辖三个汽车团、两个监护营、数十个工厂、仓库、医院等。

3. 宁夏兵团（司令马敦静）：11军（军长马光宗），辖189师（师长马世俊）、158师（师长马青保）、保3师（师长马全忠）；128军（军长卢忠良），辖256师（师长马福允）、356师（师长马保琳）、保4师（师长周福财）；贺兰军（军长马全良），辖257师（师长马英才）、保1师（师长王有录）、保2师（师长马义忠）；骑10师（师长马敦厚），辖骑19旅（旅长马得英）、骑20旅（旅长马万荣）；另外特种兵独立团、营各4个。

宁夏境内不属宁夏兵团的还有第81军，军长马惇静，原为马鸿逵乃兄马鸿宾所属，以中卫、同心城为基地。宁夏二马乃兄弟间过从虽不甚密，但也少纠纷。

4. 陇东兵团（司令马继援）：82军（军长马继援兼），辖100师（师长谭成祥）、190师（师长马振武）、248师（师长马德胜）、骑14旅（旅长马成贤）；129军（军长马步奎），辖287师（师长马璋）、357师（师长杨修戎）、骑8旅（旅长马英）；新骑兵车（军长韩起功）；骑8师（师长马步康）。

有谓静宁会议改宁夏兵团为陇东兵团，原陇东兵团改为陇南兵团，决无其事。按宁马出兵关中，仅其一部名叫贺兰兵团，以卢忠良为长，而宁夏兵团则是马敦静挂帅。

5. 陇南兵团：91军（军长黄祖勋），辖191师（师长冯济安）、246师（师长沈芸生）；119军（军长王治岐），辖244师（师长蒋云台）、247师（师长陈倬）；120军（军长周嘉彬），

辖173师（师长李焕南）、245师（师长刘漫天）。

6.新疆警总：整42师（师长赵锡光），辖128旅（旅长钟祖荫）、227旅（旅长朱明光）、235旅（旅长李组唐）；整78师（师长叶成），辖178旅（旅长莫我若）、179旅（旅长罗恕人）、231旅（旅长田子梅）；整骑1师（师长马呈祥），辖骑1旅（旅长韩云福）、骑2旅（旅长韩有文）；骑4旅（旅长唐井然）；骑9旅（旅长马平林）；新疆警备团（团长毛希陶）。

7.河西警备：直属单位、警卫营；配属单位、兵站分监、骆驼兵团，地方团队。

四、公署崩溃

全国解放前夕，已被逐出关中、收集残余喘息在陕南的胡宗南部，尚不甘心失败，乃乞求国民党中央增调了两个生力军，并要求兰署合股，反扑关中、作垂死挣扎。马步芳任兰署长官，夜郎自大，也想乘机一逞，向蒋讨赏，乃联合宁马倾巢东出。青马与胡曾初步商定，共赴咸阳，而胡部心存诡诈，让马先驱。宁马亦求自保，他勒羁乾州，让青马独赴咸阳送死。结果青马顿挫，退回永寿梁冀伏。中共一野许光达兵团乘胜挺进，以雷霆万钧之势从胡马间隙直扑岐山与蔡家坡，包围胡部，全歼其主力三个军于渭北扶风地区，此即有名的扶眉战役。两马闻风，狼狈回窜，国民党国防部曾囑兰署举军事会议于静宁，并派贺衷寒等专程到兰打气，希望两马抱六盘出，保甘、宁、青，牵制解放军南下，使胡宗南再获喘息机会。终因二马各怀鬼胎，争相自保。宁马逃回宁夏，青马龟缩兰州，在一野追歼下，彻底覆灭了。

陇南兵团原驻秦安、天水及其以东地区，胡宗南曾千方百计希图拉其反扑关中。笔者为此曾专机飞到汉中，向胡劝阻，意在保住这点部队，作为策反对象。因为国防部满参陶晋初于

1948年底出任新疆警备总部参谋长之前，曾到香港接受乔冠华指示，嘱陶去新后组织力量迎接西北大解放。当晋初赴新过兰时，与笔者几经密商，约定：关外由他负责，第一步串通乃兄，拉拢179旅旅长兼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为基干，进而沟通哈密178旅旅长莫我若。调走死硬派骑五军。如果北疆进展顺利，第二步向南疆发展。关内由笔者负责，组织力量，主要目标是驻甘“中央军”。基于此，陇南兵团为甘、宁、青地区仅有的中央系部队，并且尚未设置兵团部由公署直接控制，乃理想的起义对象，势在必争。经笔者与胡争论结果，留住91、120两个军。119军被胡拉到关中，打得七零八落，残余逃回甘肃南山地区，后由王治岐、蒋云台收集起义了。

为保住91、120两军，与青马有过很多争论。争论中，青马总是理屈词穷，因为该两军所以未被胡宗南拉到关中送死，是国民党参谋本部指定该两军为关内关外的机动兵团，不能首先投入第一线，从而得以辗转西撤，置黄河以西的景秦阜兰间避免卷入兰州会战，这是颇费心机的。

兰州解放后，公署（公署中的青海人员都早回青海去了）率91、120两军及第八补给区并公署各独立团营，沿河西走廊西撤。笔者与120军军长周嘉彬原商定在武威起义，因副长官刘任和91军军长黄祖勋反对未果。新疆二陶深恐由兰西撤部队波及玉矿，坚持要求我们在张掖以东举事。为了扩大起义领导力量，在武威曾把公署中较有影响的政工处长上官业佑（国民党中委）、军法处长孙耀武（张治中亲信）拉进领导核心，共同商定在张掖举事。不料上官业佑倒向刘任一边，计划被他泄露。从此刘、黄更加猖狂，周说黄对他步步监视。刘任竟掖国防部委黄祖勋（蒋介石卫士出身）为河西警备总司令，彭月翔（顾祝同老乡、郭寄嶠亲信）为公署参谋长，希图囊括河西全面控制权（自1946年行营时代起，部队调动一直是由笔者主

管），同时刘、黄立即把部队拉去高台，希图与新疆反对起义的叶、马、罗（这叶、马、罗即蒋介石卫士出身的整78师师长叶诚，马步芳的外甥、整骑一师师长马呈祥，整179旅旅长兼迪化警备司令罗恕人）联成一气，希图扑灭起义怒火。因为新疆此时起义与反起义斗争也正激烈展开。出人意外的是原不知罗恕人为军统特务，他竟是反起义的急先锋。原来想依靠他确保迪化（今乌鲁木齐）作为新疆起义的据点、以对付难以驯服的青海骑兵军（即整骑一师），错误的认敌为友（为什么会错误至如此程度？原因是多方面的，罗与二陶是几十年的老朋友，罗又曾当过陶的参谋长，从来不知他与军统有关系。罗与笔者又是益阳同乡），从而晋初的准备工作彻底破产，他的行动也失去了自由。他们硬要置晋初于死地。陶魁亦非常尴尬，但凭他向以忠厚待人，群众关系好，致未遭到野蛮冲击，相反的保住了晋初的生命。周嘉彬经不起刘、黄压力，潜赴酒泉机场飞跑了。上官业佑、孙辉武都倒向刘任一边，形势可谓险峻已极。幸而部队由张掖夜撤高台途中，刘任撞车重伤使反起义者陷于慌乱。9月18日晨，部队陆续到达高台。笔者断然作如下处置：1.派第八补给区少将副官处长贺义夫率四个营，为酒泉警备司令，嘱其牢牢控制酒泉为起义据点，保持与新疆总部密切联系；2.重新掌握部队，作了全面部署，特别暗示120军及231旅对91军动态密切注意；3.据报刘、黄已离开高台，潜赴酒泉。除嘱贺加强戒备外，要他加紧侦查刘、黄行动，并对河西总部进行监视；4.为稳定军心，要各部队深刻认识，西出阳关，戈壁千里，拖家带眷，人困马疲，兵临绝地，切忌妄动。希望大家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各就阵地，加强工事，严加戒备，俟与新疆部队取得协调，再图后策。经过上述处理，形势似乎比较缓和。但揆诸刘、黄的诡密行为，当前斗争的主要焦点将在酒泉的得失。故笔者于当日过午驱车赶到酒泉，决心与刘、黄

揭盖子，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到肃后，贺面报警备部署初妥，已知刘的所在，黄仍行踪不明。笔者疑黄已进入河西总部，即断然闯入河总追询。只见该总部参谋长汤祖谭在，却未见黄。当时汤未作出任何表示。笔者即离河总，到卫生街21号设置起义指挥所。此时，贺建议逮捕刘任。笔者认为：要捕应对刘、黄同时下手，现在未找到黄的行踪，宜暂缓一步。不多时，汤来表示赞成起义，从而消除了黄祖勋窃据河总的担心。不久，从电话中得知叶、马、罗接受陶总劝告，离开新疆，关外形势大为好转（这三人后来越怕米尔，经印度、南洋逃到台湾了）。当日下午，一兵团王震司令员派第二军五师副参谋长刘生东为代表，持王震致彭介夫（笔者字号）将军的信，约笔者当晚在马营见面（王震是中途遇见新疆、河西派往兰州向彭总（彭德怀）汇报的代表曾震五，得知玉关内外情况后派刘来的）。王震司令员给笔者信中大意是：你们弃暗投明，甚表欢迎，希望尽快采取具体行动。笔者见信后，立即向高台部队作如下指示：1.解放军1、2两兵团兼程西进，前锋已过甘州；2.新疆部队已决定起义，我们完全陷于夹击地位，除改弦易辙，别无出路；3.基于此，决定我公署在高台所有部队乘夜西撤，集中酒泉附近起义。望接到这一指示，立即行动。同时，笔者将自己佩带的左轮手枪连子弹100发解下，请刘生东带交王震司令员，表示我自己首先解除武装。刘生东见此，欣然返回复命。刘任见大势已去，当夜偕上官业佑乘飞机逃跑了。黄祖勋也想乘机逃跑，未果。黄曾一度唆使部属武装反抗，未逞。最后，他裹胁十数从，遁入祁连山，逃到川北（有一说他逃到了云南）被捕了。伪公署在高台的所有部队，包括黄祖勋的基本部队在内，当听说新疆已决定起义，处于两面夹击地位，也都情不自禁地按照指示立即撤退下来。西撤部队次日（19日）下午陆续到达酒泉附近集中。但在集中待编之初的数日中因彭月翔的

挑唆，仍有风波。在这些风波荡漾时，由于贺义夫率部严密戒备，先兵团长曹叔希、河总参谋长汤祖坛自始至终与笔者一同对闹风波者进行说服，同时笔者令八补给区派车200辆，接运第二军先头部队第五师于23日到达酒泉，局势完全稳定，起义终于告成。

河西警总是1945年成立的，当时蒋介石为收拾新疆，派吴忠信游说马步芳，骗走盘踞河西的青海两马部队。蒋所使用的手法是委马步青为柴达木屯垦司令，并乘青海二马不和之隙，暗许马步芳俟马步青部队进入青海柴达木后即由马步芳吞并。两马部队离开河西后，蒋即令胡宗南所属19集团军开进河西，于酒泉设警备总部，作入疆准备。1942年，19集团军入疆后，本来这个夹在雪山、广漠之间的贫瘠走廊，再无保留警备总部必要，但初为防止青马回窜，又为防备入疆部队立足难稳，加之胡宗南还要利用它来改造异己部队，故而保留了。迄1947年，西北行辕曾电国防部和参谋本部，建议撤销河总这个空架子。参谋本部回电，嘱与胡宗南协商。终因胡不同意，未得解决。1949年4至5月间，玉矿拖欠工资，激起工人众怒，河总采用高压手段，以致愈闹愈僵。而玉矿安全与新疆驻军关系密切，因为国民党时代驻新军队的一切供应都靠关内，而军需运输又赖玉油，倘玉矿有损，部队即无法生存。陶鉴于当时河总对玉矿处理失策，乃派驻哈密的整178旅副旅长刘连元，率该旅532团开到玉矿，进行调解，缓和形势，维持生产（有人说这178旅532团是120军的，实大谬不然）。刘连元率部进驻玉矿，经过调解后，玉矿恢复正常生产。随后中共中央令陶确保玉矿安全，如有破坏，必予追究。陶为此，又增派新疆警备团进驻安西，支援532团，加强对玉矿的护卫。陶为防止护矿部队被任意调走，或被别人瞎指挥，再造成严重后果，特委令刘所指挥的护矿部队，直属新疆总部，一切听从新总命令，不接受其它任

何单位的指示和调遣。迄至公署率领残余部队退到张掖，陶唯恐因此波及玉矿，对中共中央无法交代，他几次在电话中对笔者说：玉矿万万不能损坏。否则，中共就不会相信我们，还谈什么起义？他并要求由兰西撤部队，力争在张掖以东起义，以免影响玉矿。他并告笔者：“已令刘连元率两个护矿团为你直属指挥，玉矿安全，由你负责。”笔者当时颇为气愤，认为他把我作替罪羊。但为了大局，也只有坚决照办。在起义斗争中，笔者一面要贺义夫支持玉矿，并派员陪同解放军代表刘生东上矿帮助刘连元。刘生东代表到矿后，他首先向护矿的国民党官兵说明全国解放形势，交代共产党对待起义人员的政策，他并以现身说法（他原是刘戡的参谋长，在宜川瓦子街被俘的），阐明解放军对待被俘人员都如此宽厚，对起义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这样一来，护矿官兵的恐惧心情就顿然消失了，维护油矿转趋认真。刘生东同时协同刘连元发动工会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动员工人积极分子组织护矿巡逻队，协同护矿部队日夜巡逻。刘生东在矿上支持刘连元工作两天半，终于将玉矿完好的交康世恩师政委带领的一个装甲汽车团接收了。康政委上矿前，曾到酒泉卫生街21号即笔者的起义指挥所，找笔者介绍玉矿情况，就在埧池边晤谈数十分钟。玉矿之所以能安全回到人民手中，靠的是党的英明政策，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威力，形成了压倒一切的声势，军民倾向共产党，从而全国仅有的这一小小油田得以保全下来。当然，刘代表的指挥贴切，刘连元的艰苦撑持也有一定直接影响，但单凭个人的作用是无济于事的。刘代表从油矿回到酒泉时，要我向接收单位建议：给刘连元以奖励。因刘连元向我报告交防情况即回哈密归队去了，而康世恩政委来找我介绍情况时，他也急于赶路上矿，诸多情况尚无法详谈，同时笔者也尚在忙乱，忘记提到刘所交代的问题。玉矿的解放，大体就是这样。有人把它编造许多情节，不知是何用心？整个酒泉

起义也极简单。这里重复概括一下：王司令听了曾震五的汇报后，立即写信交刘生东于9月18日带到马营交给笔者，笔者见信立即令公署在高台所有部队于9月18日乘夜撤到酒泉附近集中起义，并经派车200辆接运二军第五师于9月23日到达酒泉，起义即如此告成。有人编造刘生东代表先后几次来酒泉与某些人谈判，决无其事。按酒泉和新疆国民党残余的起义，是自动派代表赴兰州向彭总（彭德怀）请求的。其主张起义的领导者深感国民党大势已去，自愿弃暗投明，决无任何讨价还价的想法和表现，还有什么谈判的呢？当时的一兵团王震司令、第二军王恩茂政委都还健在，一问便知其详。

231旅本属新疆警总整78师的建制，因该旅进关接兵整训，驻兰州附近的天祝永登间，归长官公署直接照顾。因系补充不久的新兵，故在兰州解放之前数日西撤高台。该旅与8旅团及新疆警备团均参与酒泉起义，来回新疆。

酒泉、新解相继起义后，解放军一兵团即进驻新疆。从前玉关内外，天山南北，红旗招展，万众欢腾，祖国大西北乃告彻底解放！

我和程潜的交往

肖作霖*

一、和程潜最初交往

要谈我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事，就要谈我和程潜先生的关系。我和他并不是1949年才走到一起的，而是渊源已久。

早在1938年，程潜公（即程潜）在河南担任第一战区司令官兼河南省军区司令时，我就被量往他那里去工作。开始是担任省军区政工处长，就地招收了一批高中学生，办了一个抗日军政训练班。已经学了两三个月了，想量续办下去，学半年。讲老实话，我当时对抗日大业热情程勃，还是有点雄心壮志的。

但是，当我第一次去见程潜，并且请示关于这个军政训练班问题时，他却一声不吭，严肃得很。也许由于他当时正在痛骂一位临阵脱逃的高级军官，余怒未息，一时三刻转不过弯来；也许由于他认为我是黄埔学生，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自然而然产生一股厌恶感，甚至怀疑我创办这个训练班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帮助老蒋来控制什么？因此，他对我毫不客气，一点面子也不给。简单地问了几句之后，就说：“不办了！结业算了！”

*肖作霖，1938年任河南省军区政工处长，后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湖南省保安副司令、长沙警备司令、湖南省党政军联合办公室主任。建国后任湖北省政协副主席。

当时，我很不是滋味，也不想多说什么，他说不办，我只好算了。不过，心里很不痛快，回到家里，左想右想也想不通。这天晚上，接到一张请帖，是程潜请吃饭，我没有去。我年轻时，火气也是蛮大的，当时28岁，已是少将，自认为还是混得不错的。对这个训练班也煞费了一番心血，想不到他程颂公一句话，喊不办就不办了，真是有意见。因此，不想再去讨没趣。当时，我对这位老资格的顶头上司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过了几天，何皓若来看我，他也是湖南人，当时担任河南省财政厅长，一见面就告诉我说：“那天，颂公在宴会上还问到你哩！问你为什么没有去？他程颂公难得称赞人的，对你却很称赞哩！说你肖某人讲话不罗嗦，而且很有条理，印象很好，要我来找你去，跟他谈谈？”我说：“既然训练班不办了，还怎么谈？”因此，我还是没有去。我想起那天他骂人的样子，心里就有些胆怯，不愿也不敢去闯那个“头七”。

训练班结束前，我打了一个电报向蒋介石请示。由于是程司令官的意见，老蒋也不便说什么。事情办完之后，程潜又派人把我找了去，这一回不再谈训练班的事了，尽谈一些不着边际的散白话。这时，我才发现他不但会骂人，而且会谈天，骂起人来尖酸挖苦，令人难受；谈起笑来妙语连珠，彻夜不倦。

慢慢地，我们就越谈越没机了。我对他谈起1927年宁汉分裂的事，当“4·12”老蒋叛变后，我是很不满意这位校长的，当时曾从黄埔分校跑到武汉来投奔武汉中央，因此，也算是个左派。我谈起这一点，程潜很感兴趣。他问：“当时，你对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很赞成吗？”我说：“当然赞成，要不然我怎么冒着风险步行赶来武汉？”他又问：“现在，你看怎么样？”我说：“现在，国共两党不又携手合作，共同抗日了么？这就是贯彻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嘛！”对于我的回答，

他频频点头表示赞赏。

当时，他对于团结抗战的态度是很真诚的。当发现我对老蒋也有不敬之处后，他对我的态度也有了很大的改变，对我很信任，很放心。他兼河南省军区司令，任命我当省军区参谋长，把他的图章也交给我代印代行，等于就是让我当了这个军区司令。这是程潜一贯的作法，他是大将风度，大臣不亲庶务，从来是不屑于过问那些罗里巴嗦的行政事物的。

当时，蒋介石曾来电指示，要我把训练班的全部学生带到桂永清的教导队去，由桂永清任教育长，我任副教育长。但是，程潜不让我走，要我在第一战区任民训处长，同时兼任河南省军区参谋长。从此，我就成了他的亲信。河南省军区下辖14个师管区、16个团管区，他都交给我管。我这个人个性很强，并不适合当别人的参谋长，但适合跟他，跟他合得来。

程潜见我对办训练班仍饶有兴趣，就亲自批准在河南省办了一个训练班团，专门训练县以上的骨干。由他亲任团长，我任副团长兼教育长，至于这个团如何办？办在哪里？他是从不过问的。我也很少过问，也学着他的样把班团一切事务委托给副教育长去全权处理。因为，当时军区司令部在南阳，而训练班团在鲁山，我作为兼参谋长只能跟司令官在一起，住在洛阳；而且，我还兼任了《郑中日报》社的社长，尚且从未去过，就更无暇顾及这个训练班团了。不过，由于我热衷此道，在每期训练班团结业典礼时，还是要赶去致词合影一番的。

我说程颂公有大将风度，就是指他善于用人，善于发挥属下的长处，很信任很放手地让你去干；他一看中你，就大胆使用，“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一般人不容易做到的。有一次，他和李宗仁在南阳会晤，李宗仁问他，“河南省军区在征兵和训练新兵方面是全国最好的，诀窍何在？我想领教领教。”程潜说，“我搞不清楚。”李宗仁又问，“参谋长是谁。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他？”程潜又说：“问他？他也不一定了解？”李宗仁奇了，又问：“那怎么会成绩如此之好？”程潜笑道：“可能这就是诀窍吧？凡事只有放手让下边去干，才能干出名堂的。”他说这话是有道理的，并不是有意装糊涂，而是自矜自己用人有本事。我也是学着他的办法办事的，把他的图章和我的图章都一古脑儿交给了担任副教育长的副处长，我也养成了和他一样的作风（即凡事很信任人的作风。他连过去一度有宿怨的人的亲信都能信任，都敢信任，比如晏勋甫以及后来的邓介松，都是唐生智的人，他也同样是用而不疑的）。因此，后来胡宗南曾称赞说：“作霖兼职，多多益善。”意思是我兼职越多越好，不怕事情办不好。殊不知我这点本事正是学来的。

二、程潜的特殊性格

程潜对所用之人只看主流，不拘小节。我当时年轻，喜欢玩，一坐上麻将桌子就是一个通宵达旦。有一次，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晏勋甫说：“要打一个电报催作霖回来。”程潜说：“不要催，他玩够了自然而然就会回来的！”他看人看事是有把握的。

平日，他不管具体事情，一有空闲就是写字，或静坐、或念佛、或作诗，他是位儒将。他喜欢游览，洛阳有个白马寺，朱镇南将军就经常陪他去游玩，有时邀我一道去。我们都穿长衫子，潇洒得很。他又是位大将，只管大事，从不看批公文；平日我们开会，他只是坐在那里静静地抽雪茄烟，一不过问，二不参与讨论。当散会时，他问：“讨论得差不多了吧？”我们说：“讨论完了，您老人家还有什么指示？”他说：“没有。”于是，他就和愿意留下来陪他熬夜的人谈天了。主要是和晏勋甫等人谈，谈古、谈诗词歌赋，还谈子平之术，谈得围

飞色舞、津津有味。其实，我也算个健谈的人，但对他们所谈之道却不甚了了，甚至不懂，因此，很少能插上嘴。但又不便贸然走开，只好陪着旁听。他讲话蛮有风趣，谈兴蛮浓，讲来讲去就变成他一个人包揽全场了。他经历复杂，见多识广，几天几晚都不谈现话，谈得起劲时，别人都插不上话的。

他这个健谈的习惯一直保持到湖南当主席时，还是如此。当时，我和邓介松每天都陪他一起吃中饭，边吃还边谈，滔滔不绝。他不讲究吃喝，特别喜欢吃皮蛋，我们三人坐上桌时，皮蛋碗就放在他的面前。晚餐，有时我们回家吃，有时是别人请我们去赴宴，他就只剩一个人吃，也就无法交谈了。为什么没人请他吃饭？谁敢请他呢？都认为他不怒而威，严肃得令人可怕。其实，他并不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平日不喜欢演讲，却喜欢谈天。

不过，他谈天是要选对象的，语逢知己千言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对看不起、看不惯的人，他是不屑与谈的。有一次，到河南来开会的一些湖南籍黄埔同学贺衷寒、袁守谦、刘运尧、邓文仪等，想见见他。因为，当时袁守谦想当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而程潜保荐的却是李世璋。由于李世璋思想比较左倾，陈诚从中作梗，蒋介石不肯下委任状，而委派了袁守谦。程潜很不满意，不想见袁，也不让袁到差上任。一个执意要见，一个坚持不见，袁守谦几次找到我，使我左右为难。因为，袁守谦是黄埔同学，又邀了这么多同学来见，无非是想缓和一下彼此间的矛盾。但程潜却推说没时间，拒而不见。我只好大胆作主引他们到客厅坐下，说他们都来了，是来看看老前辈的，还是要见见才好。程潜没有办法，只好出面接见。但是，他一句话不讲，象尊木菩萨一样坐在那里。大家向他致敬问好，他绷着一副脸爱理不理。于是，只好算了，快快告退。我只好心怀愧疚地请他们一行到中山公园吃茶，表示陪礼，大家

笑一笑分手。还有一次，河南军区几个处长因为从没见过他，想来看看，他不置可否。我便写了几句话，叫人家一起来见，他也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他的意思是你们不是要看我吗？那就请看吧！让你们看个够。当时，弄得几位处长也十分尴尬，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开口说话。事后，都说他可敬而不可亲。其实，我觉得他是很风趣，很可亲的。

程潜是个自恃清高的人，对于军事学理论上造诣颇深，自认为是学得最好的。当时，陆军大学的校长杨杰也认为自己是中国最大的军事家，但就是怕程潜的军事学。他们俩都是留日同学，杨杰还当过程潜第六军的师长，平日坐在一起讲起蒋介石，认为蒋根本不懂军事，“连起码的常识都没有！”这未免有些言过其辞了。

程潜平日常穿中山服，不穿西装，不吃酒，抽烟是抽雪茄烟。他的书读得好，诗做得好，字也写得很好，因而自命不凡，大家也很敬重他，推崇他。他自己鄙视老蒋，喜怒形诸于色，却告诫我对蒋系亲信不要锋芒太露。后来，李世璋由于北伐时当过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的秘书，与邓演达的关系也颇深，而且倾向共产党，因此终于没有当成第一战区政工部主任。程潜为了安插这位自己信得过的老部下，特意因人设事地成立一个政训处，让李当处长。明知李是左倾拥共的，却仍然重用，说明程是真心拥护国共合作的。程对我器重的原因也是这样，认为是黄埔学生中难得的人；认为黄埔学生必然亲蒋，而我却对蒋不满，确实难得。

最后，袁守谦还是当上了政工部主任，他也会做诗、会写字，慢慢地跟程潜也合得来了。加之，袁是长沙人，谈起来就更加乡音亲切了。这却使我有些为难起来，因为，袁守谦的政治态度是与我们相反的。当时与共产党名为合作，实际上常闹磨擦，程潜照例是“不亲庶务”，不探闲事的。于是，袁守谦

和李世璋之间，政工部与政训处之间常有矛盾。后来，把李世璋调为机要处长，仍然时起风波。有一次，李世璋根据机密情报，开出一份进步人士的名单要我负责保护，而袁守谦却不卖账，我与他们二人都不便闹翻，只好从中调和。下面的人不了解我的苦衷，都说我袒护左倾分子。好在我与袁守谦私交甚厚，他也不便得罪我。象这样的保护名单不止一起，形势紧张时，李世璋就通过程潜交给我，说：“这些人，你适当照顾一下他们。”我有了程潜这句话，就不怕袁守谦作梗了。当时，我的实权比袁守谦大，尽管他的地位要比我略高一筹，也无可奈何。

我这种政治态度，一般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我当时是河南省复兴社的头头，全国的总头头是蒋介石。我们复兴社主张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力量集中，意志集中；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但参加复兴社的动机，因人而异，并不全是反共的，相当一部分还是真诚希望复兴民族的。我们的口号就是“复兴民族，准备抗日”，这并没有错。别人认为我是复兴社头头，就一定是镇压共产党的，其实我是同情他们的。

三、光复前后几经变迁

1939年，程潜升任天水行营主任，名义上指挥五个战区，即：一战区卫立煌（河北），二战区阎锡山（山西），五战区李宗仁（河南），八战区朱绍良（甘肃），十战区蒋鼎文（西安）。连阎锡山都要向他请示，打电报要称职阎锡山谨上，呈主任程。看起来权威很高，实际上是个空架子，行营的副长官是卫立煌，与程潜就合不来，对于这些名位权力，程潜看得颇淡，他大智若愚，不去计较，落得一个清闲自在。

1940年，他这种无为而治的态度似乎有些转变，似乎想有

所作为了。当时，他奉调回重庆，接替李济琮出任战地委员会主任委员。这时我正任平凉师管区司令，他打电报叫我到西安，想带我到重庆去出任他这个委员会的党务组长。他的计划很大，准备还要成立政务组、军务组等等，组下还要编处。问我的意见如何？并说：“你现在的职务不要辞，先安排一个接手的，等我到重庆后再电召你去。”我听了当然高兴，准备跟他回重庆大干一番，这是一个国共双方都有代表参加的联合机构，的确是大有可为的。

但是，当他一上任，才知蒋介石早已委任了各组负责人。党务组长是方觉非，中央委员，河北人，北伐时当过郭沫若的政治部副主任，资格很老，有他这位大驾在，我就无法问津了；军务组长是黄某，黄埔一期学生，资格也比我老；政务组长的位子说是留给程潜委派，但也未轮到我，而派了方凯敏。方当时的政治态度也是反共的，后来湖南和平起义他没有参加而去了广州，担任政务部次长……至此，程潜原先的计划全部落空了，非常气恼灰心。当时，他为什么想我出任党务组长？因为想我对黄埔系好做工作，他是想团结方方面面共同抗日的，这也体现了他的大将风度。

在重庆，他最讨厌的是CC系的人。有一次，陈立夫来看他，他不见；陈立夫是陈英士之后，对程潜来说，陈立夫是晚辈，不肯见他也无可奈何。程潜认为陈氏兄弟把持党权，在上海开“五大”时，把程潜只选了个中央后补委员，简直是一个莫大的侮辱。在河南期间，我帮他把CC系全压下去了，这使程潜非常满意，其所以对我器重这也是原因之一。

由于战地委员会各组处骨干仍为CC系所把持，程潜感到鞭长莫及、尾大不掉，干脆又是什么事也不管，天天打麻将。因此，我也就没有去战地委员会工作，开始是到中央训练团，后来到兵役部当司长。有时，我去上清寺看他，讲到蒋介石独

断专行，用人不当，他劝我不要再多管闲事，说：“这类事情，你我都是没有办法的，何必去多事呢？”

程潜不管事的态度，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就是要你不去多事嘛！因为，老蒋生性多疑，不仅对程潜，对其他人也如此。比如，我到兵役部之后，鹿钟麟部长知道我是黄埔系学生，而国民兵役司司长一职向来是由蒋介石派黄埔系学生担任的，鹿怕派一个难于共事的人不便驾驭，便主动保荐我出任。于是，蒋就犯疑了，找我去问：“你什么时候认识冯玉祥的？”我说：“不认识。”蒋又问：“你什么时候认识鹿部长的？”我说：“是在洛阳，与程颂公、鹿部长一起吃过饭，认识的。”蒋这才默默地点点头，由于是鹿钟麟亲自保荐，蒋也只好同意了。从内心里，他是不想自己的学生去投靠别人、为别人所用的。

抗日胜利之后，程潜的态度仿佛又有了一些变化，竟然出任武汉行辕主任。这是一个指挥对共军作战的机构，我以为他是不会去当的，但他还是去当了。这回是贺衷寒、袁守谦先我而去见他，由他们保荐我当他的参谋长，而程潜却拒绝了。说：“肖作霖是不乐意做这个事的，他也不适宜做此事。”

的确，他很会用人，知人善任，表现在什么时候用什么人，反蒋时用我，而亲蒋时则不用我了。这时，我给他介绍一个唐纵当他的参谋长，他接受了。唐纵当时在蒋介石的侍从室六组工作，在重庆时曾经监视过程潜行动，当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唐纵的六组是主管军宪特的，曾经问过我：“程潜与毛泽东见面谈些什么？他跟你谈过没有？”我说：“没有，最近我和颂公根本没有碰过面，谈了什么内容，我一点都不知道。”

唐纵和我在黄埔六期是同期同学，他是湖南酃县人，比我大四岁，和我有一定交谊，相互比较信任。这个人还是有一点

正义感的。他过去在戴笠手下当过书记长，后来当蒋介石的侍从参谋、六组组长，管军统局，戴笠都要听他的。他曾问我：“程潜可靠不可靠？”我一时不好如何回答。因为，我可以骗他，但他好据此骗蒋，则非同小可。于是我只能说：“颂公那个人你也知道，就和我一样，对宋、孔、陈是不满的；对校长嘛，现在相处关系好一些，而过去是长期敌对的，这些都是事实。你要是相信我，就该相信他，不会不反共的。”我这样回答，无疑是很策略的。当时，唐纵不想在侍从室六组干了，想调出来，依托程潜当个湖南或是湖北的省主席，因为，程潜有这个资格，王东原就是由程保荐当上湖南省主席的。

程潜同意我的推介后，要我代他写个签呈给蒋介石。他知道：如果保我当参谋长，蒋会怀疑，如果保唐纵则不会怀疑。不过，后来唐纵也没有当成这个参谋长，而是另有高就，出任全国管察总署署长了。

当时，程潜出长武汉行辕，是对形势估计问题，也可能舍不得一定权位。我主张他不去就任，不如静待时机，但他未以为然。当然，他也并不是积极反共，他没让我当参谋长，因此，我没有参加三年内战，抗战一胜利就退役了。当时，作为民国军队的中将，要60岁才能退役，而我30多岁就退了。退后在南京办《大众报》，不赞成打内战，办了一年多即被关闭了……

四、协助程潜竞选始末

1948年春，我回湖南，经过武汉时，正好遇上程颂公准备竞选副总统。他说：“你来得正好，我正准备打电报找你。”我说：“我可什么事都不能做了，因为已经退役了。”他说：“不是要你干军事，而是……有人劝我竞选副总统。”我

惊异地问：“这个时候了，您还去撑他老蒋的台子？去凑蒋的趣？我不赞成。”他说：“好吧！你与邓介松去谈谈看。”

竞选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邓介松主持干的。他个子不高，象个白面书生，个性强，却活泼，也是谈笑风生的；他是湘乡人，一贯是个左派。当我问及竞选之事时，他说：“不是什么去凑蒋的趣。而是……蒋的局面不会很久了，当副总统的人有可能取蒋而代之。”我说：“蒋在短期内是不会死的。”他说：“不一定要他死，而是要他自动让位引退；而程颂公资望很高，湖南的黄埔学生也很多，有力量。”当时，我觉得他讲得有一定道理，但又不无顾虑地说：“这种可能性是很渺茫的，况且，我们现在也没有钱去搞竞选，怎么办？”他说：“有人出钱，四川的汤文华，湖南的王东原、李默庵，都肯出钱。”

不久，我回到上海，程潜打电话要我去南京，而且要我把小轿车也带去，意思就是要去他那里去住一段时间。开始，我对这件事兴趣不大，因为，蒋介石对黄埔学生控制很严格，我不想锋芒太露，何必树敌太多？所以，我只答应帮程颂公在上海照应照应，不想去南京；但后来还是要我去了，我的车也被杨继荣“骗”去了，另外把一辆车还我。杨继荣当时在武汉行辕当交通处长，管事务，这个人个子高，长得结实，黑黝黝的，很会应付内内外外；他把一部坏车还我，说补我一些钱，却一直未补，我也没有办法。

当时，程颂公为了竞选，组织了一个“中国政治学会”，主要台柱子有邓介松、邓飞黄、罗中凡等人。邓飞黄是国民党历届中央委员，又是老资格的左派人物，和共产党有一定的亲缘关系，为程颂公竞选出了大力。初选时，程的得票并不少，比于右任要多，仅次于李宗仁。后来，蒋介石要孙科出马，要黄埔

学生都支持孙科。这样，激怒了程潜和李宗仁，李宗仁来看程潜，程决定把自己的票全部让给李宗仁，认为自己反正不能出了，不如让李宗仁出，也算是对蒋一种反抗。结果，尽管CC系和黄埔系大都支持孙科，但还是不及李宗仁的票多，李宗仁终于当选了副总统。而程颂公只好退而求其次，回到湖南出任长沙绥署主任兼省主席，这也是他的生平宿愿。

光复后，他之所以出任武汉行辕主任，与其说是对武汉感兴趣，不如说是对湖南感兴趣。过来几十年间，他曾几次主湘，但都是转瞬即逝，被人挤走，于心是不甘的。他这个人政治雄心还是有的，为桑梓效力的观念并不是很淡薄的。光复后，他之所以据武汉，之所以保荐王东原任湖南省主席，之所以对不认识的唐纵马上同意其要求，都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想以两湖作基础，将来待机应变。因此，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甘心附蒋反共，他的主任是个空衔，与李先念部队发生磨擦都是在蒋介石直接控制下进行的，与他的关系并不大。

竞选失败后，蒋给他一笔钱，拉拢他，还要利用他牵制李宗仁。当时，白崇禧坚持要程让出武汉，程并不肯让，蒋介石也不愿意。但是，没有办法，桂系有力量，只好将程调长沙，主管湖南、江西两省，程也愿意去。他派我先回湖南打前站，对我说：“没有一个地盘是不行的，我在上海反蒋七年，也没有反出他的手掌心，到湖南去就有个落脚地方了，还是跟我一道回家乡去吧！”我当时还有犹豫，认为自己在上海有一定的基础和朋友。他又说：“湖南是个最好的基地，还是跟我回去打好这个基础。”我同意为他去走一趟再说。

开始，程并没有打算自己当省主席，他保荐李默庵，但有人反对，又保荐黄杰，还是有人反对，这才自己出马。

李默庵当时任南通第一绥靖区司令长官，常到上海来，家眷也住在上海，我与他交往和交谈较多。谈话中，他流露出对

蒋介石相当失望，内心倾向共产党。程潜竞选时，他不仅出钱，而且出力。他虽是陈诚的老部下，但与陈并无特殊关系，虽是黄埔一期生，而且是起来比较早的将领，但湖南人最终得不到重用，只有依靠颂公，拥戴颂公。平日他比较小气，但对资助颂公竞选很慷慨。落选后，他想趁此机会回湖南，加之自己有一定威望，因此，同意出任省主席，蒋介石也同意。因为，蒋不能不尊重程潜的意思，既然程管两省，难道不能保荐一个湖南省主席么？

黄杰和李默庵一样，是黄埔一期同学中仅次于胡宗南的重要将领。最初，胡宗南是第一师师长，黄杰是第二师师长，也算是起来得比较早的，但后来有段时间冷落了一阵。他是长沙人，字达云，是位风流儒将，喜欢模仿蒋介石的姿势走路，也喜欢写字做诗，字写得有自己的风格，诗则不如袁守谦。当时，他的思想倾向并不如我和李默庵，但表面上却与我们一致，也是想借助颂公之力回湖南当省主席。他没有在军政部讲武堂呆过，因此并不是颂公的学生，关系并不亲密，凡事就通过我来与颂公沟通，表示回湖南后都用颂公的人，只说：“我只用一个秘书长朱景云，怎么样？”

但是，由于贺耀组等湘籍人士坚持反对，李、黄二人主湘之议均未能实现。湖南的CC系和三青团、在乡军人会等也都蠢蠢欲动，有阻程回湘之说，这不能不引起我这位打前站的人的深思。

于是，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在陈明仁家吃中饭，他的大师傅会搞菜，特别是牛肉弄得好吃，我们一行七八人都是黄埔学生，都有同样心情，我是个有心人，就在饭席上提出来搞一个联名帖子，表示“团结拥程，回湘应变。”当时，大家都一致赞成，有些人可能注意力不在此，因而对这八个字无印象。但事后杨继荣对我说过：“颂公看了这份名帖很高兴，还在上面题

了几个字哩！”

这也说明，颂公回湖南是想有所为的，也是很有政治嗅觉的，是下了很大决心的。说他“无求名，勇拂绩”，只是谦逊之词。我当时也是个有雄心大志的人，我还想走第三条道路哩。当时想撇开蒋另立旗号，就必须与美国人挂勾，开始美国人也曾考虑过程，在这方面跟我也有一点点关系。

傅泾波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学生，司徒雷登很喜欢傅，傅在司徒面前也能起一些作用。在重庆时，一些燕京大学的朋友介绍我认识了傅，当时并无多少来往；到了南京、上海之后，来往多了。这时，我们都住在国际饭店，在交谈时谈到程颂公欲去湖南，为此，傅曾主动地找我两次。这个人平日谈时局是从不表态的，这次却问我程潜的情况。当时，美国人想换马，对李宗仁并无把握，认为李在黄埔学生中没有威信，因而想到程颂公。我对傅说，程资望高，无派系，是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军政部长，各派系都能接受的人物。傅说程没有军队。我说：“他虽无军队，但在军队中影响大，黄埔军官中有一部分是他的学生；而且，程懂政治，最会运用，凡事心中有数；最理想的是他对共产党也有优势，他是真心拥护三大政策的；虽然大革命失败后，也曾反共，但过去与共产党不是百分之百的敌对，这就是优点。缺点就是无实力，还来得及武装嘛；我们湖南有的是兵，就是武器装备问题。”傅认为那不难，只是来不来得及倒是个问题。当时，他们美国方面对战局是最清楚的，比我们清楚得多。因此，他们知道来不来得及的问题。

后来，我建议程颂公礼节性地去会晤了一次司徒雷登，司徒雷登也来回拜了他。我没有参加，但傅泾波在场。我问傅：“谈了些什么？”傅说：“是礼节性的。”傅又问我们回湖南后有什么具体打算？我说不出，只说：“能保乡土就算不

错了，要有大作为则必须自己建军，至少必需半年时间。”傅认为来不及了，在这方面来说程是不如李宗仁的。因此，后来我们与美国人并没有具体谈，也没有很明显地去找美国人。不过，这种思想倾向也是很自然的，也不完全是为了走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也是走不通的。

当时，我确曾想过：程颂公如果有二、三十万人的基本队伍，就可以取蒋而代之；湖南兵员不成问题，军官也多如牛毛，就是没有枪械，没有时间。我对傅泾波说，回湖南后有什么情况，我再联系，但后来并无联系。因为，时局发展太快了，的确是什么也来不及了。后来，国共和谈期间，我也没有再去找傅，颂公与美国人也再无联系，如果当时实现划江而治，说不定我还会去联系的。事实证明，这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然而，在我们回湖南之前，有这样一些“过场戏”还是有利的。不但有黄埔系“团结拥程”，而且有美国人前来“问津”，怎么不好呢？

五、浩浩荡荡回湖南

当时，我搞这些事的目的是想大造声势，浩浩荡荡回湖南。我还造出舆论，颂扬程是湖南的“家长”，加上有这么多“天子门生”拥戴他，就显得特别有力量。其实，程并无一兵一卒，但声势却很强，想借此压住CC系和黄埔系。当时，湖南的CC系是由张炯把持，是反对程潜回湘的，黄埔系三青团是李树森控制，李虽然也是程讲武堂的学生，但程对他印象不好，李对程也有疑惧，不想程回去；湖南的在乡军人联合会则由长沙警备司令掌握，他准备纠合数百军人到火车站挡驾，给程一个下马威。因而，当时的形势对程主湘是很不利的，我不能不未雨绸缪，早作防备。

我和邓介松先行回湘后，做了许多工作：首先利用我们的声势压住了李树森，他这个黄埔一期生怎抵得住我们众多的同学。我对他说：“我们这一批人都拥程，你怎么办？”李树森见此情景也只好转变态度，我又解除他的顾虑，只要他拥程，我们不会亏待他。接着，邓介松利用他与CC系头目的关系，做了一些疏通工作，张炯等也就掩旗息鼓了。最后一个蒋伏生，我与他私交颇好，也不难对付了。

蒋伏生也是黄埔一期学生，为人脾气很坏，平日穿长褂，拿蒲扇，象个学究，但为人却很残暴，过去捉住逃兵都是用腰斩处置的，惨不忍闻。当时，他的警备区管半个湖南，又是在乡军人会会长，出于反共的本能不同意我们回湘。抗日胜利前，蒋介石很信任他，打算任命担任铁道兵司令，消息传出很久了，却迟迟不见委令下达。蒋伏生迫不及待，他头脑简单，也弄不清蒋介石和唐生智貌合神离的内窍，竟恳请唐生智在见蒋时“便中一询”，代为打听。这一来，使蒋介石大为恼火，以为蒋伏生投靠了唐生智，决定立即撤消前议，而且从此不再让蒋伏生充任带兵官。蒋伏生后悔莫及，从此极力反对唐生智，处处与唐系的人作对来博取蒋介石的欢心，于是，又得罪了唐生智，弄成个猪八戒照镜子——里外都不是人。我了解这段故事，对他启示说：“如今你又反对颂公，岂不四面树敌么？你总得依靠一个人嘛！”他说：“颂公能重用我么？”我说：“我担保不会降你的职。”这才稳住了这个曹失鬼。

我和邓介松在长沙活动了两个星期，各方面工作都做好了，报馆舆论界也取得了一致认识，这才打电报给颂公，请他蒞湘上任。

但是，程潜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他不喜欢的人就不肯卖账。我曾极力拢络李树森，向李许了愿，说颂公回来了，不会对李怎么样，还许他出任保安副司令。但程潜却不同意，不肯

见他，也不肯要他。我认为李是一期生，老大哥，不能亏待，就带他去见程，程却理也不理。这使我很为难，使李树森也很尴尬，只好辞职离湘，后来去了台湾。

程颂公回湘后，我说想仍回上海，不肯留在湖南。程说：“你去上海，作不得什么用，不如跟我一起在家乡干。”我推辞不脱，只好说：“要我干，我就不搞政治，我要带兵。”他说：“好，我们要成立自己的部队，现在有几个保安旅，你去当保安副司令，管五个旅(后来改为师)，我自己兼司令。”于是，他照例把图章都交给了我全权处置一切。后来，又任命了王劲修当副司令，我又把程的图章都交给了王，我还是帮助颂公处置一些政治上的事务。再后来，王劲修在湘西剿匪工作上没搞好，引疾请辞，又任命了彭杰如当副司令，主持其事。颂公和我所兼的正副司令之职，始终是挂名而已，从不过问和干预其具体事务。

当时，黄杰、李默庵都出任长沙绥署副主任。黄杰兼任第四编练区司令官，驻衡阳；李默庵兼任第十七绥靖区司令，驻常德；刘嘉树任绥署秘书长，他和杨继荣是同母异父兄弟。杨继荣没读过什么书，过去当过戴笠手下中层头头，桂林办事处主任，后脱离军统，混了个少将，颂公用他作总管，他在程公馆可以穿堂入室，俨然亲信。刘嘉树是跟李默庵的，王劲修则既跟李默庵、又跟黄杰干过，他们都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杨继荣则为第四期。

长沙绥署还有个副主任是唐星，字天闲，新化人。他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与程潜同学，但不同期。程潜是第六期，唐星比程要晚一些，大概与李明灏同期。1937年，程潜出任参谋总长时，唐星跟过一段时期。唐与桂系渊源较深，与桂系另一智谋人物刘斐，也是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又是新化同乡。北伐时，他当过师长，很有学问，平日不讲话，心里点子多，人

称“小诸葛”。白崇禧是武诸葛，他是文诸葛，很会出主意，又不露锋芒，是个人才，以此见重于李宗仁、白崇禧，程潜也很器重他。他曾在武汉行辕当过总参议，有亲共倾向，因此到湖南来受到黄杰、刘嘉树等人的排挤，程潜也不便过于亲近他；因为，程潜自己并无实力，对黄埔系的人既依靠，又有顾虑，认为他们毕竟不是自己人。唐星虽然不是黄埔学生，却当过第六期老师，加之唐既是桂系，又是亲共，程潜也弄不清他的深浅。

开始，我并不认识唐星，后来才见了面，也知道他的政治倾向；因而比较维护他，极力赞成颂公委他出任长沙绥署总参议。我记得那张委任条子还是我代颂公写的：“奉谕委任唐星为长沙绥署总参议，此令。”写时，我又对颂公说：“唐天闲资格老，建议当副主任。”颂公当即同意。于是，签呈到了刘嘉树手里，却扣住了，留宗不办。直到后来李宗仁当了代总统，才正式发表，这是后话。

唐星在湖南始终没有当权，所以，他对湖南起义主要是起了一个与白崇禧周旋的作用，缓冲了桂系对程的压力，蒙哄了白崇禧，掩护了程颂公。故而白崇禧曾痛心地说：“我在湖南上了两个人的当：一个是陈明仁，一个就是唐星。”

平日，唐星不大讲话，一讲话就很风趣。他与杨东莼、刘斐关系很好，都是桂系的才子和谋士。杨东莼、唐星是政治谋士，刘斐则管作战，当过国防部次长。刘斐个子颇高，一表人材，讲话也很风趣，平时待人似乎较冷淡，但与程潜谈得来。他们年龄也相近，但不是决定作用。刘斐在白崇禧面前讲话很有份量，保护了程颂公和程星龄。陈明仁调到湖南来，也是刘斐向白崇禧建议后，才得以顺利实现的。

六、调陈明仁回湘

关于调陈明仁回湘的主张，最初是张严佛说出来的。

张严佛是仅次于戴笠的军统局头子，当过军统局大区区区长（一个区管几个省），曾经很显赫的。他与程潜、陈明仁同乡，也是醴陵人，小时还与陈明仁同学，在北京师大读书时还参加过共产主义青年团。戴笠死后，他没有接任，却由他的部下毛人凤接任，心中不服。毛人凤表面上尊重他，让他当设计委员会委员，他觉得没意思，不想干了。我和他是朋友，在南京时，我劝他回湖南跟颂公干。他与颂公也熟，在西北当军统局区长时，与颂公相处很好。因此，他同意我的意见，但要求当个厅长。颂公知他是特务，但一则此人表现较好，在特务中有“圣人”之称；二则是同乡，谈得来，过去相处很好，较了解；三则可以利用他缓和与军统方面的紧张关系，可以压住中小特务、分化他们，便同意了张的请求。事实上，后来张严佛在这方面是起了作用的，尤其在拉回陈明仁方面，也是他的作用。可以说，他为湖南和平起义是立了大功的，但后来起义后却重新逮捕，死在战犯营里，是不应该的。

当时，颂公虽然答应了张严佛的请求，但回湖南后，张并没有当厅长，因为各厅厅长人选，早已内定了。想请他在省府当个专员，他不肯干，于是安排在绥署任中将参议。后来，颂公在赶走张炯、赵恒惕之后，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成立了党政军联合办公室，由我任主任，张严佛和程星龄任副主任，张还兼任机要组组长（保卫组长为朱明章、党务组长为仇硕夫、政务组长为程星龄、军务组长则由我兼任），参加了我们筹划起义的核心会议。

当时，张严佛讲出了陈明仁和他南京四方城的密谈，讲出了陈想回湖南的意图，因此，我们就请他去拉陈回来。这件

事，颂公对他很放心，他也完全为我们服务。他早已与蒋介石离心离德，人很敏锐，看得出一些问题，与陈明仁的关系又深，因此，派他去最合适。他到汉口与陈明仁讲了一些心腹话之后，陈明仁就决心回湘了。

1949年初，陈明仁先回来看看形势，我们在程星龄家接待他，唐星也在座。我们对和谈问题讲得很坦率，但陈却不肯做声，形成僵局。事后，通过张严佛问明，才知陈明仁是不放心唐星，他当时对唐星不摸底。于是，我们再次约会时就没邀唐星参加。这一次，陈明仁才把心事谈清，摊了牌，而且建议：一要颂公向白崇禧要求调他，估计白崇禧一定会同意；二要作为湖南中坚力量，要我担任长沙警备司令，相互配合。当时，长沙警备司令蒋伏生已调往衡阳，继任者为刘进。刘进早年参加过共产党，后来跟胡宗南一段时间，与胡宗南闹翻了，很消极，倾向进步，但与我们互未通气。我说：“如果我兼警备司令，刘进怎么安排？”陈明仁说：“好办，我请求白崇禧调他当我的副司令就行了。”陈的这些主意，我们及时转报了颂公，颂公很高兴，批了个“照办”。于是，由陈明仁向白、程写了个请调刘进的签呈，但武汉和长沙绥署尚无权批准，转报国防部。当时，国防部长是何应钦，照准并任命我当长沙警备司令，这是有案可查的。

我们为什么要积极活动调陈明仁回湖南？因为当时颂公太没有实力了。当时，酝酿起义的几个核心人物，除颂公外，是我、邓介松、程星龄、唐星和李默庵，李默庵没有统率军队，而其余几个“天子门生”如黄杰、刘嘉树等是反面人物（杨继荣无关紧要），当然是越来越靠不住了。

黄杰当时不敢把矛头对向颂公，也不敢惹恼我，就集中火力攻击邓介松。他们纠合黄埔军官要赶走邓介松，说邓是CC分子，又是唐派人物。当时，程颂公对邓也有些动摇，认为他

有些跋扈，独断专行，等于是个代省主席。因此，不得不成立党政军联合办公室，置于省政府秘书长之上，办公地址也设在楼上，颂公指着楼下的邓室对我说：“如果依介松一意孤行，要出事的，你要代我管起来。”

但是，我和邓介松合作很好，对他很尊重。他送上楼来的公文，颂公要我批阅，我没有批，仍按原样交还给邓。邓以为是颂公看过了的，便照发照行。因此，仍然和过去一样，由他在主持一切，故与黄杰等人的矛盾并未稍减。

我认为：邓介松的和平倾向是很坚定的，为湖南起义做了许多早期工作。比如：分化C C系，赶走张炯，都是他干的；赶走赵恒惕是他与我商量好了的。他要我装着去看望赵议长，故意表示关切地要赵注意安全，并且表示要由警备司令部派兵来保卫赵。赵恒惕生性多疑，过去与程潜有旧嫌，深怕是程要派兵监视和软禁他，便自动卸职离湘了。

邓介松很有学问，旧学功底深厚，字和诗都很好，脾气很刚，几乎没有柔和余地，他是唐生智的人，也有唐生智那股犟脾气。当时，唐生智是反对征兵、征粮、征税的，邓介松和我都与唐有关系。当时，刘嘉树、杨继荣搞了个绥靖捐，有些逆潮流而反动，他们的房子也是绥靖捐来的。这种捐对过往木排都要收税，类似往日的厘金税卡。邓介松坚持反对，闹得很僵。程颂公要我出面解决，我感到很为难，心里也是不赞成搞这个捐的，但只好进行调解：一是在项目上减少，二是在时间上缩短，只搞了三个月。我当时认为不应该为这事发生分裂。这事是绥靖公署搞的，刘嘉树搞的，颂公对此是不管事的。他们搞这个捐的目的是为了落腰包，颂公不一定晓得，糊糊涂涂的让他们搞了。为此，弄得湖南的气候对颂公很不利，引起一些人反对他，进步人士也对他失望，我们为此很着急。假如湖南人反对，那我们还有什么了不起呢？岂不是没有存在价值了么？

开始进湖南时，我也是想搞军队的，后来放弃了这个主张，颂公也对搞军队不那么热心了。因为，他也看出来：蒋介石答应他装备3个军、8个师，都是敷衍他。于是，我们才想到要停止征兵，以收拾人心。

讲到停止征兵，这是有段相当曲折的发展过程的。

入湘前，为什么那么多“天子门生”拥程？因为蒋介石同意给三个军的餉械，黄杰等是出于这个用心拥程的。蒋介石则想利用湖南兵，程颂公则想藉此据有一个地盘。后来，由于形势的影响，东北、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接连失利，再有天兵天将下凡也无济于事了，我们才转变了想法。这是共产党军事胜利的影响，也就是党的影响。当时，我们虽然还没有和地下党挂上勾，但党的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在这个问题上，邓介松一开始就是对的。他不同意建军，不同意把地方自卫队改编为正规军队。他主张取消地方武装势力，我不同意。但邓说：“那些地方武装，将来会闹得不可收拾的，不如早点撤消。”后来，湘西事变说明了这一点，这使我很佩服，邓的确是见解过人的，方向也是明确而坚定的。后来，颂公同意“大县留一点，小县不要自卫队”，因而使全省后来除湘西之外均无事变，由此可见邓介松的确是有远见的。

七、开始寻求和平出路

讲老实话，我们当时都还没有起义的打算，连“起义”这两个字都没有听到过，后来才感到诧异，我们算“起义”？由于蒋介石的新闻封锁，我们也不知道真实的战局，不了解外面的形势。后来，由于南京政府偷运金银、逼催军粮，才慢慢察觉出来，大势已去。

这时，地下党方面在河西桃子湖方叔章家有意识地组织了一次聚会，邀请我和邓介松参加，准备让李达（字鹤鸣）做我

的工作。但由于他们对我们的思想不摸底，上午除了伍慧农讲得多一点之外，李达并没有发言。后来，我讲得多，大骂国民党，骂蒋介石政府腐败，我的态度明朗化之后，李达才发言，大家也才敢于畅所欲言了。因为，我当时是实权派人物，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这一次听了李达的启示，对我和邓介松的影响很大，回来向程颂公讲了，他也很感兴趣。

这时，不断有密报告到南京蒋介石那里，说我这样，说我那样。这些密报一是通过警察总署唐纵，被唐纵卡下来了，没有给蒋看；另一条途径是通过侍从室俞济时，也被卡下来了。他们二人与我私交都比较厚，俞济时和胡宗南是相对立的，而我与胡宗南早已决裂，因此，我和俞很好。俞济时曾派人警告过我：“你再这样搞，我无能为力了，不能总是帮你掩盖。”唐纵也对我说：“你说话办事，一定不可超出范围才行。”

最后，是刘嘉树一份密报通了天。他说我要组织一个民主自治同盟，拥护程潜。这份密报使俞济时再也无法掩盖，拿上去了。蒋介石看了之后，曾问李某：“你与肖作霖接近，他究竟怎么样？”李某说：“我不知道他的情况。”这时，蒋介石表现很焦躁，在办公室里走过来走过去，决定追究这回事。

这时，我正好到南京去，一下飞机，宪兵总司令张镇就来接了。我还以为他是来机场接哪位要人哩！问他，他说：“接你。”我说：“哟，你太客气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交情太深，另眼相看呵？”张镇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叫你的司机把车开回家去吧！”我说：“不，我要到中央饭店去。”当时，有司机和侍从副官同坐在车上，他也不便多说，由于我坚持要到中央饭店去，便到那里开了一个房间。等住下后，他才告诉我说：“你还不晓得么？校长要对你下手了，我怕你落到雨衣那帮人手里（时戴笠已死，此处指毛人凤等人），那就没有办法了，现在

落到我手下，至少不会吃亏吧！”我当时大吃一惊，不知所以。张镇又问：“你看怎么办？”我问：“到底是什么事？”张镇说：“你在湖南拥程、反蒋，想自己搞个独立局面，是不是？”我说：“既然是为这事，那你也保我不了。”张镇迟疑一会，又问我：“你跟俞济时关系如何？”我说：“还好。”张镇说：“那你直接去找俞济时，我的确不好讲话，我只能负责看管你。如果俞济时还帮不了你的忙，那就仍住在我这里再说。”

于是，我就去找俞。一见面，他的神色就不比过去了，绷着脸。我就开门见山地对他说：“一切我都知道了，我自己来报到。”他未及答话，我又说：“你是应该了解我的，我对孔宋两陈是不满，但有两点：一不会反对校长，二不会拥护共产党。这两点你应该相信吧？”俞济时说：“我相信。但你在上海办报那段时间的言行太越轨了！我过去帮你压下一大堆密状，而且两次派人带信给你，你理都不理我，我对朋友只能做到这样子了，你太越轨了……”

于是，空气僵滞下来。一会儿，俞说：“先到我家吃饭去吧！”我只好跟他同去，吃了几杯酒下肚之后，又有感情了。俞说：“这件事是我转报总裁的，我不便管，你跟乃建（指唐纵）好吗？”我说：“很好。”俞说：“你要乃建跟校长说说吧！”这天中午，我们一直谈到下午上班，俞派车把我送到了唐纵家。

于是，由唐纵写了一个报告呈稿，担保我不是拥共反蒋，平时讲话不谨慎是有的，但不会反对校长……等等，这份报告还是由我自己拟稿，由唐纵亲笔抄正的，他只更动了几句，就拿上去了。

这件事情了结之后，俞济时又谈到程潜的长子程博洪在上海办了一个《时与文》杂志，要查封。俞说：“这里面完全是

共产党在操持，这对程颂公也是不利的，最好你去劝他们自己停办，一旦由我们查封就露痕迹了！”为此，我只好去会博洪，他不肯停刊，说一定要等他们来查封，这样就可以增加蒋介石一个罪名。但我劝他要为父亲着想，当时，地下党有关方面可能也做了一些工作，实际上还是被查封的。不过没有见报，没有贴封条。因此，蒋方则说是自动停刊的。

这样，多少缓和了一下蒋程之间的关系，但我仍未被解脱“看管”；我对俞济时说要求见见校长，说自己在家里等候召见。一天，俞打电话来叫我去见蒋，我真不知此去吉凶如何？不免忧心忡忡。当时，张镇、袁守谦和俞济时都很关切，都在门口等我，怕我万一谈不好，就会被扣起来。

这天，我身穿一件长褂子，袁守谦说不妥，临时借给我一套中山装，我和他个子差不多，倒也非常合身。晋见之时，气氛却很缓和。蒋介石叫我坐，他召见学生从来是不轻易叫坐的，这回却很例外。他问我最近看什么书？又说博洪停刊了，很好，过去叫他来当秘书，不来，给他钱去留洋，又不去读，却办这样一个刊，当然不行……当时，我只是唯唯诺诺，不敢多言。召见完毕出门时，张、袁等还在等着我哩！生怕我出事，他们也有干系。

这次没有出事，既出乎我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因为，当时的军事形势、政治形势都对蒋十分不利，人民群众“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热浪高涨，他们要求停止内战，释放政治犯。对此，蒋介石不能不有所顾忌，不能不尽力笼络人心，而且，为了缓和舆情，不能不在1949年元旦发表了求和声明。

这样，湖南就更加热闹了：省参议会通电呼吁和平；各界人士也纷纷响应；还决定成立和平促进会；颂公还通过程星龄，秘密会见了地下党的余志宏教授。不久，中共方面提出八

项条件。程颂公被列为战犯，又引起了震动。

这时，程颂公对于共产党所提“八条”，尤其是惩办战犯，把他也列入战犯名单，当然是有震动的。但并不大露声色，也没有特别的愤慨，只是心里很有想法而已。孙科打电报来，征求程对“八条”的意见，要求回电。我们当时分析，认为孙科这一手来意不善。如果程回电表示反对，孙科则利用程的威望去影响别人，并把反对和谈的责任推在程的头上；如果程回电表示赞成，孙科则不会发表，而且也会把拥护和谈当作我们的“越轨”言行。

面对这一两难局面，我们怎么办？如何回电？颂公和我们反复研究了几次。讲句实在话：颂公对于“八条”的实质内容，他基本上都同意，就是认为那语气太盛，讲得不好听，只能这样，不能那样。尤其是第一条，他不赞成，既然我们都是战犯了，那还有什么好谈呢？把和谈一方当战犯办，怎么还叫和谈？黄杰对此尤为愤慨，他们拍桌打椅，极力反对。有一次，我和程、邓在一起吃中饭时，谈到黄杰他们的情绪，也颇有同感，认为共产党应该客气一点。但是，我们认为：还是应该回电答复孙科，而且要公开答复，因为我们基本上同意“八条”作和谈基础，就不能让孙科扣住不发表。我和邓也认为：既然和谈，就无战犯可言。程颂公听了有所动，当即要邓介松拟稿，程看了一下，亲自改了第一条，加了几句话：要我们一边答复一边登报，不给孙科以可乘之机，而让全国人民都知道：我们湖南还是赞成以中共“八条”为基础进行和谈的。

八、促进和平步步艰难

随后，邓介松还建议颂公释放政治犯：这是我当警备司令时放的，但是邓介松首先提出来的。当时，我们并没有抓政治犯，不知道湖南有不有政治犯？邓介松有个亲戚在军法处当处

长，知道有政治犯，顾公就要我写个条子给警备区，全部放了。接着，邓介松又拟了一个停止征兵的命令，送呈顾公，因为事关重大，顾公没有立即签发。

这时，李达教授对我们说：“不如把程潜先生的儿子程博洪找回来，他们父子之间好讲话。”于是，我和程星龄立即写信，请博洪回湘。

一天，程星龄与博洪在一间房子里，我约他们一起去向顾公讲停止征兵问题，认为这个事已经到了非讲不可的时候了。当时，不能不有些顾虑，觉得这样做，与蒋介石一下子就闹翻了。于是，我又去找邓介松，邓说：“我已拟了一个命令，与程顾公也谈过，但被打回来了，恐怕不行的。”我说：“我们一起去。”

开始，邓介松和我找程谈时，也是不同意。我说：“我们征什么？要征他们去征！”程潜对此，不能不有所顾忌：前段时期抗交军粮，不是抗，而是拖，蒋介石要程亲自到南京去了一趟，也是以阳奉阴违的态度跟他拖。后来，蒋派粮食部官员来坐催，程以老卖老，对那些钦差大臣发了一顿火，也仍是一种拖的策略。而现在要公然停止征兵，是非同一般的。程怕因此而引起在湘的黄埔学生反对，但此事确实已到了非干不行的时候。于是，他犹豫再三，叮嘱我要想办法压住或稳住黄埔学生，这才从腰间拿下一个小图章，郑重其事地在写的那份向国防部报告的原稿上盖了章，又在邓介松所拟的命令上也盖了章。又叮嘱说：“这命令不可先发表，要等国防部答复后再发表。”

当时我想：谁知道国防部答不答复？何年何月答复？如不答复则不发表，又如何能让舆论界知道？当时，一部分舆论界已在酝酿拥唐倒程，有份报纸连“社论”都写好了，周翊寰主办的《舆论导报》更是突出地拥唐。现在，我们有了这张“王

牌”，怎么不打出去呢？于是，我一告辞出来，就把电务室主任刘伯谦找来，要他马上一面向国防部发电，一面抄送各报。我记得那天正是星期日，各报休息，但第二天都全部刊登了这个消息。

很快地，黄杰等都知道了消息，他们一起去找李默庵问情况。那天，我从麻园岭“华园”家中去上班，经过李家门口时，恰巧车胎坏了。去向李借车时，发现他家门口停了好几部车，又恰遇黄杰下车，黄杰也感到奇怪。因为，他们这次是唯一避开我的，怎么我也不请自来了？还以为是李默庵通知我来的哩！

我发现他们脸色不对，问他们：“开什么会？”黄杰说：“不是开会，你怎么也来了？”我说：“我是找默庵兄借车来的，就借你的一用吧？”黄杰说：“既然来了，就一起进内去吧！”进去之后，我发现王劲修、蒋伏生等均已在座，李默庵见我，也不知如何解释。因为，一切事情他与我都是相通的，只有这件事彼此都未事先通气。而使他也感到奇怪的是：我居然不请自来了，而且是与黄杰一同进来的，真是不可理解。因此，一开始气氛很不自然，大家都没有开口讲话。

最后，还是黄杰开口说：“老实讲，今天我们就是为了停止征兵的事！”我听了，感到惊异，他们先一天就知道了消息更使我纳闷，估计可能是电务室告诉他们的。这时，王劲修发火说：“这件事都是邓介松干的，我们要打死他！”接着就七嘴八舌嚷开了。他们有些人是做得出来的，还会闹得颜公下不得台。于是，我说：“这不能怪邓介松，是我搞的。”他们一听，顿时木然。我又说：“今天这个势候，搞兵没有什么用了。现在，我们只有依靠颜公，颜公又靠什么呢？靠湖南人支持。目前，湖南人对我们失望，这个形势很危急呵！”他们说：“停止征兵了，那几个师还成不成立？”我说：“如果你

们要兵，把我们保安部队那些人枪拿去好了！”王劲修是保安第二副司令：他说：“这事你一个人作不得主吧？”我说：“那就全给你嘛！你拿去成立一个军总可以吧？”他们又嚷开来。我说：“如果你们一定要闹，颂公知道了，恐怕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说：“我们一同到颂公那里去，要颂公收回成命就算了。”我说：“我不能去！我与你们不同，我不能对颂公出尔反尔，颂公要收回成命可以，我不参言，我先走了。”于是，李默庵送我下楼，他对此事也感到左右为难，不好处理。

一会儿，等我到达颂公处时，他们也到了。因此，我来不及向颂公先讲明，颂公也不知道已经登了报，他是从来不看那报的。当听到黄杰等人的讲话后，他顿感木然，说：“这件事得再考虑吧？作罢，你看怎么办？暂时不行吧？电报还没发吧？我说：“恐怕已经发了。”他说：“你怎么就发了？还见了报？”我说：“要挽回人心，只有登报。”黄杰等人一定要颂公逼我去收回成命，我就以去就相争，如果硬要这样逼我，我就只有离开湖南了。颂公也藉此压压他们，从中调和。说：“去查查，看发了没有？实在发了就算了。”

我领会颂公的用意，去把电务主任找来，刘伯谦很高兴地来见程，因为平日从没召见过的，程甚至不认识这位电务主任，见面时问：“你来干什么？”电务主任说：“肖主任要我来的。”程又问：“昨天那个电报，你还没有向国防部发吧？”电务主任不知内情，以为发得有功，连忙立正说：“报告主任，我当时就发了！”程立即将脸一沉，喝一声：“滚！”电务主任吓得一兢，莫名其妙地退了出去。

程颂公还是有魄力的，他既然干了就算了，不再推三磨四，也不怪我。加之，登报以后，各界一片赞扬声，他很高兴。只是为这件事跟黄埔学生闹僵了，蕴酿着新的矛盾。但不几天，蒋介石宣布下野，他们就软了，否则，还会有麻烦的。

这件事后，李默庵对我仍如往日那样友好，但我们在筹谋调回陈明仁时，又没有和他通气，使他发生误解，这是后话。而黄杰呢？则对我耿耿于怀，但也无奈我何。我是不会去向他低头的，后来形势越来越有利于和谈派，他倒主动找我了。一天，他打电话找我说：“有事谈谈。”我说：“下午一定来。”黄杰说：“就是要请你来吃中饭，要不要我派车来接你？”我只好立即去了。那天，他是请京剧名演员王玉蓉吃饭，邀我作陪，藉此缓和一下我和他之间的关系，而根本没有什么事。对此，我们彼此都清白，心照不宣，都不露痕迹，因而谁也没向谁低头。

1949年3月，代理蒋介石出任总统的李宗仁召集各省到南京开会，程颂公带着我去了。这时的言论比较开放，主战的主战，主和的主和，有的宣传“唯物论”，有的鼓吹“唯心论”。我劝颂公只讲“唯生论”，即民生主义。只要关心国计民生，就自然主张反战倡和，而又不致授人以柄。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我还主张与共产党竞赛，主张国民党整党肃政，还专门写了一个条呈给蒋介石。但是，递不上去，被袁守谦等人扣住了。他关切地劝我说：“这个条呈肯定不会接受，还会被关起来！你要整党？整谁？整二陈？你要肃政？肃谁？肃孔宋？怎么行？”贺耀组也这样劝我，不要冒失。其实，我当时拥和、拥共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不过是藉此放个烟幕弹而已。

其实，他们也很清楚这一点。

一天，袁守谦和我的族侄肖赞岩来看我，想来说服我。我们一起吃饭，黄杰和刘嘉树也在座，他们嚷着要我请客，要我出酒，我就拿出上海海关总税务司送的两瓶白兰地来。但我的厨子师傅手艺不佳，就转移到刘嘉树家去弄菜。宴席上，黄杰提出今后怎么办？肖赞岩说：“在当前形势下，黄埔同学要精诚团结，校长已决定今后专员、县长都要由黄埔同学担任，颂

公没有这方面的人，要请您向颂公讲，我们同学不但要管军事，还要管政治。”我当时没有作声，过去黄埔系搞的复兴社就是这玩意儿，我清楚他们的用意所在。

又一天，袁守谦和肖赞岩从奉化来，袁才说出真意：“校长要我们恢复黄埔组织作最后努力，校长是靠黄埔起家的，现在要靠黄埔救亡。”我清楚：蒋过去怕黄埔同学起来抗日而不能左右，故而取消了复兴社；现在又想恢复。袁要我合作，他管组织，要我管宣传，要我利用上海的房子办刊物，他可以资助金条，要我离开湖南到上海来办这件事。当时，袁的态度是相当诚恳的，但我没有答应（后来，袁在长沙还是办成了这件事，时间已是1949年7月，我已离职去邵阳了。）

这期间，张镇也来找过我，我劝他抓宪兵起义。他此时也知大势已去，但却无能为力。对我说：“现在可以由他直接控制的宪兵只有6个团了，而且分散在桂、赣、湘等省，要集中起来是相当困难的。”他还说：“你们要起义我不反对，但校长对我有知遇之恩，过去戴笠一帮人几次要搞掉我，要把宪兵司令的位子夺过去，都是校长未同意，因而保护了我，我不忍心背叛他，我将来只有跳海完事的。”他还说：“我与你们处境不同，但你跟我讲的话，我保密，你放心，我不会讲出去。”后来，张镇到湖南，去常德接太太，我劝他太太住澳门，他也赞成。但他自己却去了台湾，不久就被陈诚害死了，据说是打了毒针身亡的。

唐纵也去了台湾，但始终未见重用，因为他担保过我和程颂公，担保我们可靠，结果不是那么回事。他对蒋也怀有感情，不能背叛，但程颂公也答应过用他，因此，对程也有好感，这就注定了他无法升迁了。

总之，在南京开会期间，我接触了各种各样同学，他们也都都在各作打算了。

九、程潜派我去香港找党

颂公在南京开会时，对我说：“听博洪说，中共在香港有个南方局，你亲自去香港一趟，你的关系很多，去找找南方局，我一定要跟毛润之直接接上头才放心。”他这时的心情是很迫切的。早在年前，他要邓介松送500块银洋，资助李达去北京，就是想找毛主席。但李达去后，迄无回音，确实令他放心不下。其实，李达北上后，曾把程潜的消息告诉了毛主席，毛很高兴，要李达马上再回湖南做策动工作。李达说：“我这回北上，一路颠波，已是九死一生，再回湖南去会死在半路上的。”因此，未能成行，也不便回信。后来，毛主席派李明灏送信来，才算直接挂上钩。但那已是7月间的事，远水难救近火。

于是，我遵照颂公的嘱咐前往香港。当时，只有从上海去比较安全，而我这个人主和态度比较露，要去还真有困难。时任松沪警备司令的陈大庆是我的朋友，我请他帮忙买张飞机票，他觉得惊奇。我说：“如果我自己去买票，上了飞机也会被扣回来的！”他更感新奇，问我：“去干什么？”我说：“有事。”他碍于情面只好照办了，而且还不好意思要我的机票钱。

我到香港后，找到了易礼容。他是湘乡人，过去是在共产党里搞工会工作的，在清水塘和毛润之、刘少奇、李维汉、李立三共过事，当过总工会部长和省委书记，后来离开了共产党，仍从事进步劳工运动，在重庆校场口事件中，还挨过打，又回到党的轨道上来了。我在香港和他很要好，向他讲明来意要找毛主席。他笑笑说：“南方局书记方方我认得，随时可以带你去，但要找毛润之，何必一定要找南方局？找我就行了嘛。”我这个人政治关系很广泛，在重庆就和易礼容搞熟了的。他也

向我讲明内情：最近毛主席已派人来请他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他对来人说：“润之自己不写封信来请我么？喊我去就去？我不去，要等他来了信才去。”当时，这位老人还拉架子哩，但他说：“我终归是要去的，见了润之我帮程颂公讲讲就是了！方方虽是南方局书记，但跟毛润之的关系，恐怕还不如我吧？”

我听了很高兴，请他一定帮忙，但易礼容又拉架子了，说程颂公这个人多变，他不相信。我说：“你相信我嘛，我可以给他当这个家。”他说：“相信你？你对他有把握么？不行，除非他亲笔写封信给毛润之，而且，我还要亲眼看到他写的，我才相信，我可以负责把信带给毛润之。”我拗他不过，只好依从，说：“那就只有请您回湖南去一趟，看他写信。”他说：“可以，你能担保我的安全么？”我说：“我现在是长沙警备司令，可以保得你的险。”他又说：“那好，不过，还得程颂公亲自给我发个电报来，我才可以去长沙。”

我与易礼容谈妥后，立即回到广州，但被一个朋友发现，此人是当时广东省主席薛岳的副主任梁华信。他一把拉住我，死人也不许马上回长沙，说是薛岳要我吃饭，我想推辞，他却不肯。说：“薛主席请你吃饭，你不去，面子上也说不过去吧？你最低限度也要等过了明天再走。”我只好勉为其难了。吃饭时，薛岳表达真意，原来是想湖南搞湘粤联防，想我们支援他们粮食。当时，我只想早日抽身，一切要求都同意。他们还不放心，又这个请那个请，请我吃了几天，才放我走。回湘后向颂公汇报，颂公很高兴。说：“很好，易礼容这个人很好，我要赶快打个电报。”

但是，电报发出后，易礼容却在一两天前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动身北上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后来，我在北京遇到他，他还记得这件事，说：“真可惜！要是早两天收到程颂公的电

报，我到北京后就会对毛润之讲，也算是我对毛润之的一个见面礼嘛！”我说：“您为什么不等一两天？”易礼容说：“毛润之亲笔写了几句话，南方局又买好了票，我只好走了。”说时，非常懊悔似地……。

从香港回来后，形势发生了突然变化。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过了长江，湖南怎么办？主战派又大肆嚣张起来，省会人民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来促进湖南局部和平。当时，我和李默庵也赞成这样搞，藉以压压蒋、白势力。于是，在地下党领导下，很快就发动起来了，声势之大，又使我们感到为难。因为，军统（保密局）方面已派人来湘，策划镇压，白崇禧也派了密探来了。我们担心，游行时万一丢个炸弹怎么办？因此，建议颂公非改变计划不可。颂公也同意。

但是，长沙市学联不肯，部分学生代表来请愿。我作为长沙警备司令，出面去与学生讲，一见面他们就吼叫，就起哄。他们对警备司令是很反感的，却不知我这位司令的真实态度。我对他们说：“请你们绝对相信程主席，他是绝不会违背人民意愿的。你们的主张不一定要通过游行来促其实现，徒然牺牲一些人没有什么意义……”我还说：“你们要贴标语，随便贴到哪里都可以，贴到省政府来也行，我们负责保护你们。”然而，学生代表不听，坚持要游行，要求程主席接见。没有办法，只好请颂公亲自出面。

颂公脾气不好，见学生不听话，就来火了，拿出家长式的架子气势汹汹地说：“这样不听话，那还了得？”学生们哪里肯服气？但对颂公还是有所畏怯，不敢吼叫起哄，就相约一齐用脚蹬地板来表示抗议，使颂公感到哭笑不得，进退两难。当时，我实在焦急，又不能再出面，一出面只会激起更大愤怒。这天，幸亏刘岳厚出来讲了几句好话，等于向学生求情告饶。而且这些好话都是在颂公先行离坐之后才讲的，颂公要是听见

了会不高兴的。他老人家是醴陵人，醴陵人一般都会讲话，但他只会聊天，不太会讲话，尤其不会低声下气讲好话。

这件事，最终还是地下党方面出面，才做通了学生们的工作，取消了原定的十万人游行计划，避免了一场无谓的牺牲，我们也才松了一口气。

但是，总的形势仍然越来越紧张。白崇禧要退到湖南来了，他公开要程颂公撤换我和邓介松，还亲自打电话来催程颂公办这件事。当时，我正在场，亲眼看见颂公接电话后很不高兴。他是有个性的，也深知白崇禧来者不善，于是，就决定进行抵抗。

研究抵抗的那天晚上，我和庸星、李默庵、唐伯球、程星龄等都参加了。颂公说：“如果抵抗不住，实在没有办法，我只有离开算了！”我说：“我们实在是不甘心呵！当然，不一定打得他桂军赢，但要集中十来万人还是没有问题的。还是实力不够，因为他们是精锐部队，有两个兵团，但我们的群众比他们多，他们也受大损失。他们撤退的目的是保存实力，无心恋战，我们可以给他留出路，湘南不要了，让他们驻扎衡阳去。”总之，当时我是坚决主张打的，程星龄也是主张打的，唐星没有讲话。当时要李默庵负责指挥，还为他准备了一条退路，即万不得已时，往湘西退一步。

会上，管财政的李维城也说：“没有钱，先拿6万元，然后再想办法。”于是一切都定了。会后我要警备区参谋长李少白去炸汨罗桥。天亮时分正准备动身时，接到颂公电话，说要改变计划。我坚持不同意，颂公说我太冒失，说桂军并非大军南撤，只是先开来一个师；说陈明仁也不同意蛮干，地下党方面也不同意这样搞，我只好作罢了。这天晚上，颂公和我们一样，通宵未睡，十分紧张。

后来，白崇禧大部队终于来了，我是非走不可了。未雨绸

缪，我建议颂公保陈明仁代我出任长沙警备司令，颂公说：“你是不是再到香港去一趟？看一下形势，再回来。”

这时，颂公已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已知道有个周礼。但由于当时党的线索很多，主张也不一，他有点不大相信。对我说：“你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就是的，他们能保得我的险么？还是要去找南方局，通过他们找毛润之。”我不肯再去了，对颂公说：“白崇禧不离开长沙，我就不愿离开湖南，要和他周旋一番。”颂公问：“你在长沙是呆不住的，准备到哪里去？”我说：“先到邵阳老家去，再看情况。”颂公点点头，表示同意。

于是，他找白崇禧，建议由陈明仁继任长沙警备司令。白崇禧当然同意，转问陈明仁，陈却故作姿态说：“我是华中剿总副司令，怎么还去兼长沙司令，属程的长沙绥署任命和指挥？不干。”白崇禧一再劝陈屈就，劝陈“勉为其难”，并且说：“可以由华中剿总和长沙绥署联合任命，属我（白崇禧）直接指挥。”陈明仁才同意，他这样做是为了在白崇禧面前显示与程不和掩饰他与程早已达成的默契。他高明之处还在于上任之后，装出一副反动姿态，大骂共产党，对进步人士抓了不少。实质上是保护性的拘捕，后来一个个都放了，只瞒住了白崇禧一个人。

我离任时，没有给陈明仁办什么交接手续，只对陈说：“我的人，请你留几个，我开个单子给你。”陈说：“不行！你的人我都要换，一个不能留，但是可以另作安排。”在谈到账目时，陈很慷慨地说：“钱多了，归你，钱不够，你不管，交接后，我们不再见面，你要赶快离开长沙。”对于他这番用心，我当然是非常理解的，随即离开长沙，到了邵阳。

十、湖南和平起义前后

后来，程颂公也到了邵阳，我又与他汇合一起了，于1949年7月29日一同潜回长沙共谋起义。陈明仁接到我的电话，马上要派车来接我去见面，还要唐生明去邀一位姓董的军长也来，对我说：“你等等，我跟董军长说几句话。”于是，当着我的面问董：“现在形势很明显了，你打算怎么样？”董说：“我只有跟你走，以总司令意志为意志。”陈说：“我投降，你呢？”董说：“不，我们就是不投降！”陈明仁就是要他讲这句话，然后叫董到那边去坐，然后对我说：“听见了吗？他们不投降，我也不能投降。”我说：“不是说起义吗？怎么是投降呢？”陈明仁说：“我问你，这省政府怎么办？要不要缴印？军队怎么办？要不要缴枪？如果要，那不是投降是什么？”我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陈明仁说：“现在你回来得正好，我把原班摊子交还给你，我一个人坐飞机走。”我顿感木然，陈明仁又说：李仲坚（指李明灏）来了，你跟他讲去，他是代表共产党来的，你跟他到颂公那里去一趟，问清楚，我等你的回信。”

这时，我刚来乍到，以为一切都搞好了，起义之举已是万事俱备，只等宣布了，谁知还有这样重大的问题没谈清。于是，我去乐嘉巷唐生明家，李树涂（我们背地里这样戏称李明灏）睡着还没起来，唐生明喊他起来，我问他“究竟怎么搞的？陈明仁的兵团怎么办？”李这才记起来，说：“昨天接到了林彪的电报，兵团不动，省政府不动，就只要把长沙城让出来，解放军好进城。为什么要让城？主要是怕万一起冲突。”这就把问题澄清了，陈明仁要的也就是这几句话。

于是，我对李明灏说：“那我们也用不着再去颂公那里了，我也不去回复子良（指陈明仁）了，请您直接去对他讲，

这已是圆满的答复了嘛，这样就安定下来了。”

陈明仁平时不大讲话，也不聊天，性情直爽，豪饮豪赌，人高高地，嘴巴抿得很紧，表现出很坚毅沉着，凡事就是要弄个清楚明白，绝不含糊。有人就认为他讲条件、讨价还价，用左的眼光，否定他，中伤他，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然，不能说他在起义过程中没有思想斗争，没有反复，但总的是不错的。地下党和各方面对他起了作用，尤其是唐生明的作用很大，这是值得一提的。

起义后，程颂公和陈明仁都到了北京。开始，难免有些顾虑，不知道共产党讲的话可靠不可靠？但程完全没有想到毛主席会到火车站迎接他，很是受宠若惊。

我是从上海赴京的，在上海遇到程博洪，他表示感谢，说扶助他父亲上了岸。他们父子感情是很好的，这时，颂公也催博洪一同赴京。直到开国大典那天，我才到达北京，没有赶上他们开政协会。散会那天，毛主席请颂公吃饭（这时，陈明仁已和李明灏赴山东看望杜聿明、王耀武等去了），我和程星龄、晏勋甫、方叔章等都奉邀参加。

开席前，朱德穿着旧棉衣，双手拢在衣袖里走进来，开玩笑说：“呵？今天是开湖南会！”因为当天出席作陪的还有刘少奇、林伯渠、李立三、章士钊等，都是湖南人。当时，颂公答话说：“总司令，您没搞清楚，是开醴陵会哩！”因为，当时大部份客人都是醴陵人，主人中李立三也是醴陵人。这时，李立三正有个文件呈毛主席批阅，他对毛主席毕恭毕敬地，给我以很深的印象。我还发现：朱德喜欢讲笑话，周恩来平易近人，刘少奇围一条花围巾，比较沉默，而毛主席则很健谈，谈了几个钟头。

吃了饭之后，他们还一直谈到晚上两点，才告别上车。真是亲如一家人，领袖们没有一点架子。当时是两桌，毛主席陪

一桌，周总理陪一桌。总理把我当学生看待，说：“你答应我一个任务，好不好？”我开始吓了一跳，问：“什么任务？”总理说：“人家敬我的酒，你代一代，我敬人家的酒，你吃一吃，行吧？”我欣然照办，最后，总理说：“这次我们二人两不吃亏，我少吃酒，你过了瘾呀！”

这些往事，现在回忆起来犹倍感亲切。讲句内心话，我是拥共亲共的，我对共产党没有意见，对我们起义将领内部倒有意见。1957年，我和陈明仁到广州视察。陈明仁说：“本来，我这次不去的，听说这次你去，我才决定也去。”于是，我们二人同行同住，相谈甚欢，整整一个星期，天天在一起，记者们也天天跟着我们，作了些宣传报道。当时，陈明仁在谈话中对程星龄很反感，我也有同感，把别人的功劳都加在自己头上，使领导只相信他们，而对陈明仁的人则重视不够，不闻不问。陈明仁说：“我们回湖南去开个会，找一找最原始谋划起义的是哪些人？要大家提供情况，供党组织参考，不让少数人包办，隐瞒真情，搞得是非不分。”我当然表示赞成和支持。

回湘后，陈明仁找周小舟谈了这事，周小舟表示赞成，决定一层一层地谈。首先是在第一层谈，他们是大局清楚，实际情况并不清楚，陈明仁就要我把具体名单搞出来。但是，紧接着就开始反右了，陈明仁也几乎成了右派。因为，他本来准备放一炮的，见形势变了，才没有讲了。后来，我被划了右派，程星龄也被划了右派。对于这次“争功”的事，程颂公对我很不满意。直到近几年我才知道，颂公并没有抹煞我们的功劳。他曾经写过一份名单给省委的，据说我是第一个名字。后来，由于他把名单越写越多，没有重点，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不过，那份名单还是送交了省委。由于重点不突出，程星龄怪颂公，陈明仁也怪颂公，其实不是颂公，有人告诉我说：是由于党的关系，我这个人在党内通不过，甚至把我当军统大特务看

待。我始终认为：是谁向党组织提供这类线索呢？当然不是颂公，他从不过问这些事的。总是有人从私人派性出发，利用一般人对历史的无知而售其奸。

程颂公对我的确是肯定的。早在北京参加开国大典期间，他就要我和程星龄写个名单呈毛主席，看参与起义的有哪些人？但是，在写名单时，我和程星龄有争执，颂公就要我们各写一份，再综合一起。当时，我很懒，也不大重视，没有写。程星龄就写了交给颂公，颂公以为是和我一起商量综合了的。于是，很认真地改了一些，就郑重其事地交给林伯渠了。林转给毛主席，毛主席就把程星龄叫去问情况：“张严佛不是军统特务吗？怎么也起义了？”程星龄答：“是的，但他过去有特务圣人之称。”毛主席笑笑说：“呵，特务还有圣人？我才听到你说过。”据说这份名单中，对我许多事迹没有写上去，我有意见，也对颂公讲过。所以，后来颂公在写给省委的名单中就把我列为第一名，但已无济于事了！事实上，我也算不上第一名，这又有些过誉了。

（周全整理）

白崇禧30万大军是怎样溃败的

向 隅[●]

1949年7月下旬，湖南局势正在酝酿巨变，笔者从长沙匆赶衡阳，转入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随即节节撤退，由衡而桂而柳而邕，至12月5日行抵“小董”（属广东钦县），突遭共军夜袭，华中长官公署的主体及第十兵团本部，在此未经战阵而一夕瓦解，白崇禧将军及其拥有的30万大军，自此风流云散，遽然完结，各方原先寄与白氏能撑持西南危局的最后希望，亦完全归于泡灭。所有长官公署人员，当时东逃西遁，或被俘北去。笔者算是漏网之鱼，几经艰险，潜抵香港，幸而转来台湾。因此，我对40余年前西南最后告终一幕，毕生难忘，尤以每年逢到12月5日，更是感慨万千，无可释怀。

兹特蒐集有关资料，原文节录于本篇，以免断章摘句，而存真实，最后纪述笔者亲经目睹之见闻及其得失检讨意见藉供成败兴亡史迹参研之一助，并留下个人一生经历中最为沉痛的一页。

黄旭初慨谈李、白、黄分道扬镳

白氏生前（彼逝于1966年12月2日）曾接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多次访问，经印行访问记录两厚册，对于西南最后溃败一役，并无专篇详尽纪述，只是偶尔有时提及几句而已，无法瞭

●向隅，湖南衡山人，曾在华中长官公署任职，现居台湾。

然当时全般情况，不无缺失。这或许是他讳言其事，也许是访问尚未到最后阶段而白氏遽然辞世。兹先就黄旭初先生（当时任广西省主席）在香港春秋杂志所作的一篇文章节录如下：

1949年秋，中共谋迅速统一大陆，对川、康、滇、桂各省拼命进行和平煽动，虑李代总统成为美援的对象，对桂军作战又较吃力，故尤注意广西。周恩来两次函约黄启汉赴平给以对桂和平使命，黄由津乘船到港后，10月5日托张任民、韦永成电白长官说，“中共对桂尚留余地，应进行妥协。”10月17日邱昌渭由港到桂说，黄启汉想明天来桂。白表示，等他到即因起程来！黄闻这消息，遂不敢来。

白将赴渝，10月26日召集夏威、李品仙、徐祖贻、林一枝、张淦、王景宋、孙国铨和我商讨今后的战略，咸以为应确保云南、桂西南、粤南、海南岛，并控制越北，应即派一师到龙州。27日白即飞渝。

李代总统自白氏来渝后，对军事和政治屡行商讨，彼此都注意着最后应向云南的问题，李遂决定亲赴昆明视察。临行前夕他对蒋某复出，自己去留的问题，11月2日夜間，在重庆曾家岩中四路104号刘航琛住宅召集白崇禧、李汉魂、邱昌渭、刘士毅、程思远、黄霜邨等再作一次微询意见，想早得决定。大家因这个问题太困难了，意见未能完全一致，讨论未得一个确切的答案。3日，李率随员飞滇视察，白在渝想把这问题有个着落。

白以为由过去十个月来所得的教训，蒋既不肯放手，李也无法做通，彼此僵持，终非善策，不如由蒋来干，事权专一，以消除当前的危机。为双方的处境着想，李似可乘此机会出国，进行外交活动，这并非交换条件，不过各求其适而已。白和吴忠信取得联络后，11月4日即将此意托吴迅速转达台北方面，请予考虑答覆。又请邱昌渭飞昆报告李代总统，这些办妥。

后，白4日下午即飞返桂林。

邱秘书长11月8日由昆返渝，当晚即得吴对白的答覆道：“蒋复职后，李仍应回任副总统。至于出国的事，万不能提，一提就是不合作，甚至蒋怀疑李会在国外进行反蒋的活动。目前局面严重，亟须蒋、李通力合作，共济时艰。”

这样一来，无法再商下去了。在李看来，目前彼此间的不愉快气氛，他自己离开或即云消烟灭。他在抗战期间患上严重的胃病，医嘱必须割治，过去以工作关系，无法抽身，现在很想藉此出国，彻底治疗。为此，他宁愿放弃法统地位，而切望出国。蒋竟靳而弗予。

李代总统11月11日离昆明，乘“天雄号”专机于下午5时许到桂林，即致我电话谓过几天会到南宁，但次日却派“天雄号”机接我赴桂。我12日下午4时抵桂，当夜，他召集白崇禧、李品仙、夏威、徐启明、王真吾、程思远、黄雪邨和我讨论蒋谋复出，他个人应如何自处的问题。在讨论中，他表示意欲引退，另谋再起，但多不赞成，请他再行考虑。13日下午，华中公署政工处座谈会讨论军队因供应不足，钞票难用，以致军纪不良问题，白氏拉我参加。夜间李代总统再约昨夜几位继续讨论他的自处问题。最后，他自己决定从速赴美治疗胃疾，并与美国当局商谈援助。大家对此一致赞同，他决定明日赴邕。当日共军已攻川东，攻黔的攻抵马场坪，重庆催他返渝坐镇。14日上午，白长官为银元券不能充分兑现，发生纠纷，召集桂林有关人员讨论，令我参加，终未得到妥善的结论。我们和李代总统共进午餐，白向他建议：到邕后宜赴琼一行和粤方各将领一谈。下午2时半飞邕，李品仙、程思远、王真吾、黄雪邨、黄中廬、姚槐和我随行，四时到达，驻节绥署，夜间他接白电话，谓蒋总裁今日下午3时抵渝。他说：“这样很好！否则我在渝筑危急时难去，心里终觉难安。”

他15日飞海口，因气候恶劣，中途折返。16日再往，下午4时返邕，谓已和陈、余、薛几位晤谈，他们表示，无论如何两广都应团结。重庆催他返渝的电报一日数至，他决定不去，谓蒋不难乘此胁迫我发表引退劝进文告，即不然，也是一切仍旧被他挟持，动弹不得。他自海口归来，胃病又复大发。

重庆中央社17日发表消息：“蒋对复出掌政，表示毫无成见。”似为试探各方的反应。

李代总统在邕候机赴港（因中国、中央两航空公司11月10日投入中共后，各线停航）。11月18日傍晚，白长官自桂致我电话，以为出国手续尚应考虑，可否再从长计议？我请他明日早来面商。白19日上午10时抵邕，向李建议：“可否和蒋商定辞职再行出国，对国人较为有个交代？”李说：“即使蒋同意这种办法，也必食言，决不许我出去，只有此时以元首资格出国，不须护照，才能如愿。”意极坚决。我也觉得除此以外，别无更好的办法。白对李赴美，本来就是他数月来一贯的主张，对手续一点，现在也明白只好以元首资格才易出国，故不再持异议。李预定到港后即令外交部通知美国政府说，即将到美检查胃病，并声明不受美政府招待。他雇用民航空运队的专机19日到得太晚，20日上午8时才起飞离邕。

李代总统将离邕时，本已派定李品仙赴渝向蒋总裁报告，但白长官自请前往。他11月20日上午10时飞渝，临行时他问我有何话说？我说：“望您早去早回。”他道：“战事即发，须要指挥，明天一定回来。”

白21日由渝返柳，谓在渝昨今两次谒蒋总裁，蒋表示无复职意，将派人赴港劝代总统返渝，谓出国应先办妥手续。蒋氏左右对李不辞职颇感惊异云。

李代总统20日上午9时45分抵港，在坚道私宅略作休息后，当天就住到太和医院养病去了。22日，蒋总裁派居正、朱

家骅、洪兰友、郑彦棻携亲笔来函来港慰问病状，并劝回渝。但李表示病体严重，必须就医。27日，李接驻美大使顾维钧来电，谓美当局已通知有关方面，予以入境的便利。28日，蒋再派朱家骅、洪兰友来港，携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10月29日决议：“当前局势严重，中樞不可一日无人主持，仍切望李代总统宗仁同志迅返中樞，力疾视事，万一为病势所不许，即请李同志以副总统名义出国，并致力于外援的争取。”面达李氏。李婉拒了中常会的建议，并致函阎院长表示他决定出国，中樞请阎负责，交朱、洪二氏复命。12月5日，李代总统由港飞美就医去了。

蒋总裁因共军攻川黔，11月14日到渝指挥作战。15日贵阳失陷。共军刘伯承部由永绥、来凤、咸丰攻黔江、酉阳，专向宋希濂部无兵防守地区乘虚分路钻隙而入，宋部不战自乱、仓皇西逃。24日黔江陷。中樞29日迁成都。蒋总裁30日飞蓉，重庆失陷。宋希濂旋被俘，所部全灭。12月7日中樞由蓉迁台北。9日四川邓锡侯、潘文华、西康刘文辉、云南卢汉都通电投共。10日蒋飞返台北。胡宗南部18日失剑阁，27日失成都，残部后在西昌消散。西南终告，大陆尽陷。

现述华中作战和广西失陷的概略。

共军11月初旬先攻贵州和广东南路。华中派黄杰兵团援黔，未到而贵阳已陷，黄兵团回防柳州以北。又派张淦兵团往攻广东西路，并以鲁道源兵团随其后。12月20日共军才发动攻桂北，21日击破黄兵团第七十一军于小溶江，夏威副长官由桂移柳，白长官由渝回来也遂飞柳州。22日桂林放弃。另一路共军由黔边入三江县，第五十六军放开正面，共军遂长驱南下，24日已到沙塘，柳州城空无兵，白长官率指挥人员仓猝飞邕。25日，柳州、梧州同时放弃。攻梧共军是由道县入富川经贺县、信都而来的。27日，张淦兵团在濂江获胜，解决共军一个

半师，适美国参议员诺兰由渝到邕访白长官，闻讯请求飞往视察。30日，我军在南路失散，共军追鲁道源兵团西过兴业，张淦兵团遂被隔断在博白、陆川地区；徐启明兵团南撤散布武宣、桂平、续向钦廉。12月2日，由柳北经迁江西撤的黄杰兵团已抵昆仑关，宾阳、上林失陷。白长官派李品仙主任飞海口转防城，准备船只接徐兵团撤往海南岛。鲁兵团溃散后，3日，张兵团也被共军解决，司令官张淦、军长李本一、张文鸿被俘。4日，黄兵团过南宁到吴村，见邕钦公路车马拥塞，秩序混乱，遂循邕龙公路西奔，到达爱店后，12日商得法方假道赴台湾，13日入越。徐兵团4日其第四十六军在那隆、第一二五军在武利被共军阻击。5日南宁陷后，共军更由邕分兵向钦县，徐部队遂前后受击，在大寺、上思一带被截为数段，狼狈西向奔逃，能上船渡到海南岛的不多。继黄兵团后入越的计有第十一兵团、第一百军第十九师、第四十六军、第一二六军、第四十八军、第五十六军、第一七六师、第三三〇师九九八团、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部队等各单位。此外尚有广西保安团、桂西师管区、国防部突击总队等。

白长官3日午刻由邕飞抵海口，他请陈济棠长官4日上午召集余汉谋、薛岳、李扬敬、韩汉英、李品仙、夏威、黄旭初并双方幕僚数人举行会报，由白报告华中此次对南路作战企图转守雷州半岛的计划和作战失败的情形，现拟将三个军由钦县、防城运来雷州半岛和海南岛共同防守的计划。陈氏以败军守雷无把握，主张悉数来琼。白表同意。即商定可供使用的船只。白当夜即乘船往钦县部署。但共军由灵山、合浦、南宁三路向钦县追击，使我军狼狈万分。由邕向钦的军官眷属多已被俘，部队能上船的很少。撤退的计划又失败。白9日晚返抵海口，潮落，翌午上岸。

华中十余万雄兵，就这样完了！失败原因是：一、桂军在

省外太久，一到家乡，逃亡特多。二、在衡撤退时受损，新补充的战力较差。三、应退却时不速走，反停顿多日。四、统帅忙于细务而忽视分工，对计划和指挥稍欠周到。五、共军行军力强，常超越我军先头拦截。

李品仙献议，惜未断然采行

广西绥靖公署主任李品仙，在他所著的回忆录里，对此事也有一段概略纪述，兹录于后：

华中区所属各军，于10月上旬自衡宝向广西撤退途中，曾于冷水滩附近对追踪前来的共军予以有力的反击，歼灭甚夥，使共军一时不敢西进。尔后曾在湘桂边境对峙了一段时间，后西广州失守太快，为防共军沿西江西进，直扣梧州，拊我军之背，乃不得不将我军主力转移于梧州方面。于是防守的战线愈为延长，兵力益感不足。11月中旬，广州方面之共军已逐渐逼近梧州，并向钦、廉方向前进，我军侧背大受威胁，复因两面对共军作战，兵力分散，不得不将桂北一线之守军向西南柳、浔、梧、郁方面转移，暂将桂林放弃。

早在放弃桂林之前，对以后之作战计划究应如何决定，实在颇费考虑，曾由白长官召集各高级军官举行秘密会议。我是奉命参加会议的一员，当时大家对放弃桂林以后的行动，大致分为两案：此两案的第一步行动，都是退守庆远、柳州、浔州、郁林之线，但第二步行动则颇为不同。第一案主张不得已时撤往海南岛，第二案则主张逐次向西退守滇桂边境。当时对两案的争论各有理由。夏副长官威力主第一案，白长官随后亦同意该案。我是主张第二案的。我之所以主张第二案，乃是基于前此向李代总统建议退守云南方案所发展出来的。主张此案的尚有第一兵团司令兼湖南主席黄杰将军。因当时中央政府已迁入四川，以后不得已时可能仍频迁至云南，以昆明为最后根

据地。政府既在川滇，我们的军队自应以中枢的行动为行动，无论如何应确保后方云南的安全，作为他日反攻的基地，因此应尽可能确保桂西，以屏障昆明。当然此案可能因当时昆明已谣啄纷传，而不无顾虑，但我曾建议由政府下令先派遣一个军进驻滇东，以建筑最后防御阵地为名，以监视龙云为实。如果中央有一军驻在昆明，龙云必不敢异动，则此一顾虑自可消除。事实上我对云南的情形事前已经注意，在10月初即派绥靖公署副主任甘丽初前往昆明视察。据他归来报告，说事有可疑尚无实证。当时我即将此种情形详报李代总统，并由甘副主任在广州面报中央及总裁蒋公。倘当时决心采取此案，当可及时制止。

主张第一案的人，只着眼海南岛容易防守，因当时共军尚无海军，无法渡海，可说是一种消极的主张。殊不知自己大军渡海撤退或将来反攻登陆也同样是不简单的事。我们自己有否准备大军渡海的工具，有无充分的时间，有无预先周详拟妥的计划，似乎都未加以考虑，鉴于欧战敦克尔克之役，以英国海军之强，船舰之多，敌前渡海撤退虽然成功，但也只救出人员，武器、装备几乎完全抛弃了。试问我们那来这样多的船舶；而且部队登舰还是有从容的时间，方不致混乱，如果计划不周，准备不够，届时前无去路，后有追兵，仍是不堪设想的。当时白、夏两位都主张渡海退守琼州，其把据如何，我真是不敢乐观。

因我当时已专任绥靖工作，在长官部决定放弃桂林必要时退守海南后，我随即将绥靖公署移驻南宁。我决定在往南宁之前，一度衔命飞赴海口与陈长官济棠及薛主席岳接洽，转告白长官于必要时率军撤往海南的意图。陈、薛两位亦极力主张华中军退至海南，协同防守，徐图恢复大局，并说以后一切总当在互商之下协力进行，彼此无庸客气等语。我返回桂林复命

后，即转赴南宁，就绥靖工作略为调整部署，不料局势恶化竟如此之速，在仅仅不足一月的时间内，桂林、贵阳、重庆、成都均一一弃守。我华中军自撤回广西之后，可说未经一次重要的会战即迫于情势不得不仓皇急退。长官部对大军最后的行动，无论采取何案也未能加以准备。我军转进至庆、柳、浔、郁之线后，事实上已无法立足，遂继向南宁外围撤退。此时，长官部召集各高级军官再行会议，决定退守海南，令各军逐次向广东之钦廉转进。

我素来心直口快，会议中我实在忍不住又说话了。我说：“现在卢汉已经投靠中共，昆明是不能再去了。我们的部队只有渡海向海南撤退一途，而渡海地点现在只有龙门港一处可用了。可是龙门港地狭水浅，稍大船只不能靠岸，未审长官部对于登船之码头、趸船，以及舰船等项，是否已准备完妥？装载的区分及指挥系统，以及装载计划等已否策定？如有一项准备不够，都是会发生极大危险的。”我这一问，长官部的幕僚及原来主张第一案的诸先生，好似如梦初醒，竟瞠目结舌无法回答。于是，白长官又要我再飞海口，商请陈、薛两位筹调船只前来接运。我明知在时间上已经是来不及了，也只好尽人事而听天命，遂立即束装出发，临行并吩咐绥署副参谋长照料绥署人员，以后统随长官部而行动。翌日我乘机抵达海口，当与陈长官及薛主席洽商，请他们协助调集所要船只，前往龙门港集中应用。陈长官告以，此时此地那有如许船只，当地海军舰只仅有太仓舰一船，炮船一艘，其他无论渔船、商船在港内停泊的亦甚少，如需大量船只，必须向外港徵集，且徵集外港船只也非三数日即可办妥的。及转商薛主席，所得的答复亦是如此。我亲自赴各处调查打听，也完全相同。此时，真如冷水浇头，只有望洋兴叹。无奈何只好将交涉情形立电南宁复命。三数日后，郁林、博白、茂名、雷州等地纷纷为共军所占，并传

闻张淦总司令亦为共军所俘虏。接着夏副长官及白长官亦相继来到海口。此际各路部队则悉向防城、小董且战且走。其中沿粤桂边之一路，中途曾为共军截击，小董亦为共军占领。各部队如龙门港已无渡海可能，遂又折向龙州方面转进，一部则入十万大山作游击战。南宁则于12月上旬失守。最后到达龙州之部队，由黄杰将军率领进入安南(越南)暂避敌锋，待机复国。整个大陆由此沦陷，痛心无已。

广西局势，如此急转直下的原因，除受全般形势影响，势已无法再战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此乃抗战期间原属我第二十一集团军辖下之第七、第四十八、第八十四等军，其官兵大部份都是广西子弟，他们在抗战初期出征，由我率领转战于豫皖鄂一带，离乡背井已有十年之久，一旦部队回至广西，不免均思家心切，在父母倚门儿女情长的情形下，初则纷纷请假，请假不准则继以逃亡。因此，这支久经战阵，素称强悍的部队，回到家乡不过一月，未经大战，人员已减损过半，循至士气衰落人无斗志，遂使10余万大军，转瞬之间化为乌有。回想太平天国时，因内部不和自相倾轧，翼王石达开率所部数十万人远走四川，亦以所部均属八桂子弟，于经过黔桂边境时，散失过半，及抵四川所余无几，卒至在大渡河为清军所歼灭。我华中军此役，无异历史重演，曷胜慨叹。

衡阳军事会议，白氏徬徨无主

时任第十兵团司令的徐启明将军(广西部队，受白氏指挥)，来台后曾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刊行的访问纪录中，以身经战阵的实况，曾作有如下的忆述：

健生(白崇禧别字)坐镇长沙甚久，其时程潜暗结陈明仁投共，碍于第七军在该地布防，不敢发动。7月中旬，共军一面自赣江上游发展，一面向湘西发展，其时鄂西绥靖司令宋希

未派部队防守常德，以致湘西门户洞开。是以健生于7月22日退出长沙，转移至衡阳。7月29日在邵阳的程潜突然潜回长沙，8月4日与陈明仁公开投共，林彪部队兵不血刃进入长沙。为应付此突变，中央发表黄杰为湖南省主席兼第一兵团司令，招抚第一兵团官兵来归，并加整理。我在此时奉命在衡东地区拒共军进犯，司令部由醴陵再移到耒阳。

8月初旬，我奉命赴衡阳参加军事会议，会议由健生主持，主要目的在研究军事态势及准备第二步部署与长远计划。关于态势方面十分恶劣，刘共主力第三、四两兵团与林共的四二、四四、、四八等三个军仍在吉安、清江、新喻等地区，刘共第五兵团已到宜春、萍乡，林彪主力三十九、四十、四一、四三、四五、四六、四九等七个军已抵长沙、株洲、湘潭、宁乡一带，另一部三八、四七、五十、五一、五二等5个军则由宜沙分窜常澧各地附近。我华中长官所辖兵力则相对减少，张轸部早已投共，收编为中共五十一军，赣州指挥所及其所属之第四、十二两兵团已于8月初解除受华中长官公署指挥，大部退往福建广东，黔西绥署六个军节节退往川湘、川鄂山地，与湘省战事关系越来越少（于10月10日亦解除受华中长官公署指挥）；第一兵团的三个军甫经变故，亟待整理；因此在湖南能打的部队剩下第三兵团的第七、四八两个军，第十兵团的四六军和第十一兵团的五八军。全部兵力连广西民团有30万，战斗兵力约20万，但主力仅4个军，要抵抗刘、林两共全力进攻，态势恶劣已极。

关于长远计划，健生宣布上面指示，总裁电报指示我们退往广西，中央则再守四川，不得已的时候我军可退往云南，但李代座则要我们退往广东，不得已再退海南岛。李代座在我们开会期间曾飞衡阳，在机场与我们见面，半小时后匆匆离去，他强调要退往海南岛。健生以前处理任何事情，采取任何决

策，都很迅速地采取最有利的意见，但此时我发现他很徬徨，有不知如何决定之感。最后我发言了，我说：“现在再想要扭转局势似乎是不可能了，失败已定了，应该研究如何图生存，作长远的打算。先说我们守广西、守四川，不可能。抗战可以，现在是对内，性质完全不同，一定会给共军突破，突破后退往云南，路那么远，大兵力如何分途撤退，退去了又有何作用？还是不能生存。再说退到海南岛，也不行，这么大的兵力，运送过海不容易。以我的想法，死里求生只有退向安南，那很容易部署，只要规定那一军从广东过去，那一军从桂林经南宁过去，边境这么长，路途很近，带着武器补给一起退过国境，只有这才是唯一生存路线，其余条条都是死路。”我说完，所有参谋处的将领都点头赞成。但健生说：“退到安南有困难，一定要引起国际问题，首先我们没和法国搞好，先要和法国冲突，我们和保大也没搞好，这么大的兵力一定会惹起国际干涉。”我即补充说明我的构想：“我们退往安南目的正在闯祸，起了乱子成为国际问题才好，这才会引起美国的重视。我们退到安南不只是为了生存，将来还有希望卷土重来。如果长官你不便去，最好夏副长官（威）或李副长官（品仙）去。再不行，我和张总司令（淦）可以去，我们负责指挥。要决定就应早决定，以免将来手忙脚乱。”健生犹豫难决，最后还是决定在湖南前线先挡挡，才退回广西，因此才有青树坪大捷。8月中旬，健生用第三兵团主力大败林彪的一个军及一个师于青树坪，被击后退几十余里，迟滞共军之攻势月余，但我第七军损失亦惨重，态势依然恶劣。我说：“打胜仗也挽回不了恶劣的态势。”我兵团奉命由耒阳向桂北撤退，防守湘桂边境。第三兵团则于10月初由衡（阳）、邵（阳）前线撤退回桂，沿途遭受袭击，退到全州整补，由我兵团防守桂北门户。

10月初旬，我负责指挥部队防守正面，命第五十六军（军

长马拔萃）防守贵州、广西边境，自率四十六军、一二六军沿湘桂边境布防，我司令部设在平乐，健生坐镇桂林。10月5日，我又应召赴桂林开会。我在会议中表示：“没有什么好研究的，态势比衡阳更恶劣，但力量仍在，对大局不能挽救了，只有退往安南一途，而且现在还来得及。”开会期中，李代座也到桂林来，眼看失败定了，情绪很不好，他仍要我们退往海南岛，个人方面他想出国。健生和我都认为在这时候出国没有意义，拿什么名义出国？他又匆匆离开桂林了。

健生遇到他平生最难解的问题，总统要他退云南，李代座要他退海南岛，我和黄杰等主张退到安南，黄杰开玩笑说：“我们换了帽子变为安南军，打胡志明，保护保大。”我说：“我们去闯祸，法国人阻挡我们连法国人也打。他们兵力小，我们几十万兵力，如何挡住我们。”可是健生仍不敢采纳，犹豫中仍想守住广西。一方面于11月上旬命第一兵团及新组成的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由桂林及靖县附近向独山、都匀推进，驰黔增援（其时共军突入黔省，并有自黔南下之势）；另以第三、十一两兵团向玉林、北流、容县、岑溪地区集中，而仍以我兵团守湘桂边境。此一部署似乎一方面可使第一、十七兵团退到云南，而一方面可使三、十一兵团退到海南岛，可见健生之徬徨犹豫。

我在湘桂边境沿全州、恭城、富川等地布防，与共军对峙，紧张得很，好几天没睡觉，共军数度进攻未逞。但他们分兵打广东，10月15日即占了广州，并猛向雷州半岛疾进。11月上旬，共军突入黔东，17日占贵阳，于是分军自黔南犯，直指柳州，桂林震动，健生命我守桂林，不能守再退南宁。我说：

“只能迟滞共军进展，不能反攻。”共军自袭贵阳得手分兵南犯后，主力复由全州来侵，另有少数攻我恭城、富川，围攻桂林，健生命我不得已即退出桂林。我命马拔萃率五十六军退

往柳州，必要时留一师在柳江打游击滞缓共军前进，其余退往南宁。自带四十六军放弃桂林，撤离桂北，经平乐到濛江，四十六军由谭何易军长统率转入郁林五属，我率我的参谋长诸葛曙和司令部——包括特务营——经贵县赴南宁。

11月底，我抵南宁，健生、鹤龄（李品仙）、熙苍（夏威）等都在一起，这时第一、十七兵团自宾阳向南宁撤退，第三、十一兵团在粤桂边城作战，防备共军突入南路切断我军退往海南岛的去路，不幸失利退往郁林，态势更形恶劣。健生仍想将20万大军撤到海南岛去，命鹤龄去海南岛联络。鹤龄第二天就飞往南宁，据他报告是运输船舶登陆艇的缺乏，而且钦廉与海南岛都没有好的码头。我说：“退到海南岛怕不行了，前有大海后有追兵，又没有足够的船，我们怕要给消灭了。”健生仍以为退到安南必引起国际交涉，仍决定各兵团退往钦廉，能运多少出去就运多少。11月3日他把他的长官公署若干人员及一连炮兵拨归我指挥，命我带到钦州，自率高级将领飞海南岛去策应。

我等所有空军飞机都撤离南宁后即率长官公署人员，我的司令部以及一连炮兵，一营特务营撤离南宁。由南宁到钦州有邕钦公路，但过邕江必须搭浮桥才能将大炮运过去，浮桥又搭得不好，耽误不少时间，我先到南宁对岸亭子圩去集结部队，看到黄杰也在那里集结第一兵团部队，他也奉命到钦州去，两人便在亭子圩讨论敌情及健生的命令，这时第三兵团在博白、陆川情况不明（后来知道11月30日张淦司令被俘），第十兵团的四十二军在廉州距钦州最近，但共军向钦州直驰，目的在封锁我军出海口，我们两人一致认为安全撤到海南岛的时间怕不够了。黄杰说：“我恐怕到钦州的时间都没有，我决心到龙州去。”到龙州当然是非退入安南不可。他又说：“我们进安南只有一条路，就是换了帽子，变成保大的部队，先解决胡志

明。”我说：“现在我没办法不按长官部命令行事，我看时机，有机会就到海南岛去，若时间不许可，我回转过来跟在你后头。”这时眼看大势已去，愁闷、苦恼、束手无策。

我集结好部队即沿邕钦公路行军，我乘汽车，但部队仍步行，很快地到了上司，与在海南岛的健生通一次无线电报（用密码），我报告我正朝钦州进发。他说：“船的准备很困难，码头也不好，你看时间许可不许可，慎作决定。”次日我们到达钦州的小董，中午接到报告说第三兵团已垮了，四十六军已向钦州来了，同我们接近了。不久四十六军的先头部队到了小董，但是这时我方空军忽来传达命令（我们摇“布板”供飞行人员辨认），这是健生派来的，他判断过海南岛已没希望了，希望我马上转往龙州。我马上下令所有部队转向，不要集结，不要停顿，向西北取道大直、大寺向龙州疾进，谭何易军长在我后头，亦由无线电指挥他尾随我之后行军。由于军情紧急，到了夜里我仍下令夜行军，走到天亮到了大直，接到报告是共军已打入钦州，守在海口的警卫团溃败了。

到了9点左右我们到了大寺，发现前面有敌踪，谭军长也赶到，他对我说我们的后卫已被共军追及，有了接触。我说：“我们并不怕后面的共军，最要紧的是要打溃前面的共军。”这些是尾追黄杰兵团的共军，无意中在大寺以西切断了我们的去路，我只好下令攻击。从上午9点打到下午四五点，共军后面追兵亦赶上来，前面之共军亦源源而来，越打越多，我们被包围起来，越打越少。我只好对谭军长说：“你带人突围后直捣龙州跟随黄杰到安南去。”4点多钟谭军长带着李芳西师长等突围，居然打开一个缺口，1000多人脱出包围圈，我带警卫营随后突围，共军已加强戒备，没能成功。这时天色已晚，我带着几十人（其中有一连长是钦州人）脱离阵地向十万大山潜行。我说：“天黑了，只要脱离战场及共军火力就可以了。”

这时一个机警的士兵把我的军帽扔了说：“你这个帽子还要干什么？”拿他的帽子给我戴上，另一个士兵脱了自己的军装给我穿，我化装成为普通士兵连夜潜行，我们专找有村庄的地方走，共军没料到我会向山区走，一方面忙着俘虏在战场上的士兵，居然给我脱离战场的机会。我们一直走到一个距离大寺五六十里的村庄才停止，潜伏起来，派人去调查情况，回报谭军长带1000多人脱出包围圈后看到司令官没能跟出来又回头攻击，没能动摇敌阵，只好脱离战场马不停蹄一夜赶五六十里路快赶到龙州了，至大寺方向溃散的有两千多，被俘的有二三千人。我听了十分伤感，大兵团就这样溃败了，好在谭军长等安然无恙，希望他们能顺利进入安南，获得自由。

大将用兵，一着之差

黄杰将军对此事的记述更为详实，特录如下：

1949年11月5日，华中白长官在桂林官邸召开军事会议，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军事行动上两个方案：

第一案是向南行动，至钦州转运海南岛。

第二案是向西行动，转移至黔滇边境，进入云南。

参加会议的有长官公署副长官李品仙、夏威、参谋长徐祖贻、副参谋长赖光大、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第十兵团司令官徐启明、第十一兵团司令官鲁道源等。

我自转进到广西境内之后，对当前的共军态势，曾不断作过研判。此时，华中地区林刘两部共有19个军，为数在55万人以上，其主力将分由湘粤边境进犯广西，企图吸引我军主力在广西战场决战。我华中战列部队的五个兵团，总计不过30万人，兵力战力，都比共军要差。在战略态势上，共军是外线作战，我军则是内线作战。

依照当时全般状况判断，与内线作战的指导原则和要领：

华中部队在战略上应避免决战，向黔滇边境逐次转移，以百色、昆明为大后方，准备持久作战。在战术上，应集中兵力，形成局部优势，捕捉战机，乘共军分进之际，机动运用，将其各个击破，使共军合击态势的包围，无法形成，以小吃大的惯技，无法施展。

同时，华中部队进入黔滇，不但西南防卫力量增强，而且可以支援在川康的胡部，向云南集结。我全部兵力，集中云南，固守黔滇山岳地带，有雄厚的兵力，凭藉西南天然的作战地形，整个战局，仍大有可为。如果华中部队向南转移，兵力分散，在行动中可被优势共军合击包围，或者各个击破。即使我们的行动迅速，能在共军未完成包围之前到达钦州，而本身运输工具又供应得来，可以转运到海南岛，然而大军局促在一个海岛上，琼岛海峡既不能形成天然障碍，自然更不易发挥防卫固守的力量。两相权衡，向西行动，比向南行动，对我们任何一方面都要有利。

根据上述理由，我在会议中具申意见，力主向西行动，进入云南。和我持同一见解的只有李品仙中将，其余在座的将领如夏威、张淦、徐启明、赖光大诸人，都持相反的意见，力主向南行动，转运海南岛。

最后，白长官裁判，采用了第一案——向南行动。此一行动的结果，幻灭了我们固守西南基地待机反攻的远景，也损失了几十万能征惯战的精锐部队。

在向南转进的行动中，第三兵团、第十兵团、第十一兵团，这三个属于华中序列的战斗兵团，不但转运海南岛未成，而且大部份尚未到达钦州，即被共军合击包围，各个击破，以致全部覆没。只有我统率的第一兵团在东南北三面临敌，在前后左右无掩护支援的情况下，孤军西进，最后因云南卢汉投共，被迫进入安南。

这一场失败的战争，留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这沉痛的教训，使我益加体验到大将用兵，差以毫厘，即失之千里。一着之差，关系着几十万将士的生死与全般战局的成败，我们必须永远记取这个教训。

11月9日，黔东镇远失陷，贵阳方面，情况告急。我的部队，奉到向独山都匀方面集中，策应友军作战的命令。上午我到兴安去视察第九十七军，下午到大溶江去视察七十一军，并对各部队官兵代表讲话，重点在安慰与鼓舞，以情感连系情感，让感情的交流，来凝结大家的向心力，在孤立无助的局面中，命令的尊严，固然重要，但在尊严的后面，尤其需要贯注一种亲切的关怀！

11月10日，召集幕僚会议，研判敌情与我军状况，并对部队在行动中的交通道路，搜索警戒，通信连络，集结位置等战备上的许多问题，仔细考量。随即在灵川指挥所下达作战命令：一、兵团奉令策应贵州方面友军之作战，先以主力一部取捷径向宜山南丹急进，掩护兵面主力，在该方面集中。二、各部队之行动：

（一）第一期：

1.第九十七军以暂一师留置一团于七星桥东西各要隘担任守备，该师主力即开兴安附近，接替三十三师防务，并归第七十一军熊军长指挥。该军三十三师于交防后，即由现地经灵川、义宁、百寿、长安、龙峰向宜山急进。军部率八十二师由现地沿桂黔公路向南丹急进，均限10日开始行动，戌月有日以前，到达宜山南丹地区，并应确实掩护兵团主力集结。

2.第十四军率六十二师、六十三师沿桂黔公路向河池附近地区急进，限13日开始行动。该军第十师仍任桂林市守备勤务，归第七十一军熊军长指挥。

3.湘西纵队沿桂黔公路向金城江附近地区急进，限13日开

始行动，在十四军后尾跟进。

4. 兵团部沿桂黔公路，于11日到达桂林，14日后移柳州，俟各部到达南丹地区后，即向宜山及河池跃进。

（二）第二期：

1. 第二期各部队之行动，另令飭知。

2. 第十四军之第十师及九十七军之暂一师，其进行部署统归熊军长区处。

3. 第七十一军八十七师留置一部扼守梅溪口东南各要隘，主力即移资源及其以南地区；担任仙桥村、牛胜村、军田头、大溶江各要隘的守备，军部应于11日先行移驻灵川，八十八师仍在现地服行原赋任务，候令行动，预定向怀远地区集结，掩护本兵团右侧背之安全。

13日下令省府、绥靖总部、兵团部的后方人员，与第六十三师一八九团的一个营，归蒋副总司令指挥，由桂林出发，经柳州、南宁至百色待命。

部队行动部署既定，鉴于当前的局势，日趋严重，将来的任务，日见艰巨，部队逐次转战，装备亟待补充，省府及绥靖总部的许多事务，也急需料理。这些问题，在桂林方面都无法获得解决。于是，我决心再到重庆去一次。11月16日上午，由桂林搭乘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的专机飞渝，12时40分抵达渝郊白市驿机场，下机后即偕毛局长赴林园谒见总裁。我提出了下列几项报告：

一、衡邵转进，第十四军损失一八四、一八五、一八七、一八九四个团，第七十一军损失二六三团，现以湖南保安第二师拨补第十四军，湘西纵队拨补第七十一军。

二、检讨此次作战失利的原因，在湘西方面，我军行动太迟，待沅陵被共军突破深入辰溪后，再行调动，形成逐次使用的弊病，以致东北西三方面都已无法兼顾。衡穗方面，战略上决

策太迟，如决定坚守广州，则衡邵早应放弃。华中兵力，除一部守备湘桂边境，大都可转用于广东。如决心坚守西南，则广州不必设防，可集中全部兵力于西南地区，缩短战线，整顿态势，击溃共军。

三、本兵团现在的任务，奉命掩护桂林与驰援黔东。

四、拟实施战时体制，在湘东、湘南、湘西，分设三个行署，省府与绥靖总部相继进入凤凰、龙山间建立根据地。

17日晋见行政院阎院长，国防部顾总长，分别报告转进经过及部队任务。并当面提出报告两件：

第一件是请求免除湖南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职务，以便专心注意军事。第二件是请财政部将欠发湖南的保安经费与政务经费归垫，并请拨发部队犒赏金及补充武器弹药，空运柳州就地装备。

18日在重庆湖南省银行约集湖南在渝的立监委员，国大代表，省参议员举行茶会。就长沙变乱后，省府改组及搬迁的经过，作详细的报告。同时，说明省府改组后，财政困难万分，自就职以至撤离省境，未向本省人民取过一草一木，所有省府一切行政费用，都是在中央颁发的军费中挪用。今后大局艰苦，我们只有责任，只有义务，部队需要精神上与物质上的双重支援，吁请全力协助，共同来争取回乡的机会。

19日，分别访晤国防部第四厅副厅长宋达少将，联勤总部财务署长吴嵩庆中将，财政部王平次长，洽办武器装备及经费等补充问题。并与国防部第三厅厅长许朗轩少将晤谈，就本部现在的任务与行动及国防部对大陆海洋战略方针与行动指导，彼此交换意见。

20日，再度晋见总长顾上将，签保胡松林为新编第一军军长，刘多勋、杨勋、潘厚昆、王光业等四员为师长。新编第一军请求列入第一兵团序列，受我的指挥，总长允予考虑。

21日，参加陆军大学特八期湘籍学员座谈会。江望山、李仲武、李均、李峻钦等四员愿分发第一兵团服务，当予接纳，并各发旅费，壮其行程。下午接见政治大学湘潭学生80人，予以热情的慰勉，希望他们能在时危世乱中挺立起来。

原来计划在22日即回柳州防地，后因空军第五军区的飞机任务太紧，延到27日匆匆返防。

记得9月上旬我来过重庆，一转眼就是两个多月。那时这里虽然也免不了要笼上一层战时的色彩，却依然表现得繁荣而安定。现在，浮动的人心，面对着浮动的局势，风雨欲来的紧张空气，使人窒息，使人惶恐。这座曾经支持过抗日战争胜利的西南名城，能否再支持一次剿共战争的胜利，我的感觉，非常惘然！

10月27日上午9时，空军的专机派定，偕朱玖莹、王力航、鲁立刚、张星老等省府重要人员，在白市驿机场起飞赴南宁。29日回到了我的指挥所。

我的前线指挥所，于11月18日移驻柳州。19日，第九十七军八十二师的二四六团到达南丹。20日第十四军的六十二师与六十三师到达雒容，第十师离开桂林，正在南进。21日第九十七军及八十二师的主力到达宜山，三十三师到达柳江，第十七兵团到达独山以南地区。

这时，独山方面的共军，向南窜动。桂北方面的共军，由黄沙河窜向全县。战争的序幕，又已揭开。

我的布置是第七十一军在沙浦、柳城，罗城、天河、柳州、宜山一带阻共南犯。第十四军进驻沙浦、柳城，以一部进驻大浦。第九十七军占领天河以北及三岔圩罗城间地区，掩护柳州撤退。

24日，兵团指挥所移驻迁江。

25日，柳州失陷，第十四军的六十二师未及退出，全部损

失。

南犯的共军，其势甚锐，不在迁江北岸阻止其猛烈的攻势，则战局前途真不能乐观。我奉到的命令，便是在迁江南岸，占领阵地，阻止共军南进，掩护物资渡河与南宁的撤退。

迁江俗名江河，河幅不过150公尺左右，惟水深流速，有险可凭。我一面下令调整部队的作战任务，一面下令架设浮桥。

我的命令是第七十军在石龙直来宾西约10华里鸡龙山沿红河南岸，占领要点，筑工守备，主力保持于来宾附近。交通警察司令（湘桂黔铁路护路司令）莫德容所部，东自鸡龙山西至横山沿红河南岸，占领要点，筑工守备。第九十七军于横山，迁江城，亘渡江沿红河占领要点，筑工守备。第十四军，先在迁江红河北岸地区，逐次阻共南犯，持久掩护我南岸部队及车辆物资渡河。

11月30日，我亲自到迁江北岸，视察第十四军防地。这时麇集在迁江北岸的汽车，一字长蛇阵摆列着，蜿蜒约20华里，等待分批渡河南驶。我指示方副军长，机械器材药品，优先渡河，不能渡过河来的车辆，候令一律焚烧。

12月1日，南犯的共军，向我第十师与湘西纵队阵地猛扑，左翼那棠圩、渡口，第九十七军阵地，也同时遭受攻击。10时左右，我赶到红河北岸，亲自督战，共军不断增援，波浪式冲锋，厮杀至为激烈。终因敌众我寡悬殊，第十师与湘西纵队阵地，被共军突破。我下达命令，焚毁北岸汽车，部队转移阵地。第十四军成军长在紧急中渡河，险遭没顶。12时在车站附近指示第九十七军七十二师的解团长阻击渡口，共军迫炮弹恰在我的身边着落，幸未爆炸。下午1时半率指挥所人员，向宾阳转移。到达宾阳后，接第九十七军参谋处长徐建斌电话，报告上林被共军两个师攻陷，33师葛师长下落不明。

11月2日，兵团指挥所转移八塘，下令第十四军守备昆仑关及思陇墟地区，阻敌南犯。第九十七军守备潭蓬屯以北及巷贤圩附近要点。

同日，接到第一〇〇军军长杜鼎电报：“已与第十七兵团失却联络，奉白长官令第十七兵团归黄司令节制，本军位置于周旋屯、拉号屯大瑞运间地区。据报成俭共军卅八军一部，已陷东兰，一部向凤山主力向万岗前进。请示部队行动。”

接到了这通电报之后，当即与成军长、何参谋长研判，共军第三十八军既于11月28日陷东兰与凤岗，计算时间与空间，将先我占领百色，为争取时间，当即电覆杜军长：

“本兵团现在八塘，尔后担任邕江以东守备。贵军即向百色以东地区行动，渡过邕江，向南宁以南集结。”

12月3日上午8时，命令第九十七军占领昆仑关要点，掩护兵团转进。第十四军在四塘五塘之间，掩护第九十七军转进。兵团指挥所即移二塘。8时40分，与白长官接通电话，报告本部即向南宁移动，10时白长官专机飞海南岛，12时我也到达南宁。命令第六十三师的一八九团晚即渡河，在亭子圩以南四合圩以北宿营。第十四军于明（四）日渡河完毕，第十师在邕江南北岸，占领要点，掩护渡河。第九十七军指派掩护部队，破坏邕贵公路的桥梁及通信设备。下午9时，分别电告熊杜两军长。

“熊军长，贵县昆仑关恐已陷共，应迅速渡过邕江，向龙州前进。”

“杜军长，南宁危急，本部奉命渡邕江，向龙州前进。贵军能钻隙至龙州至佳，否则绕道入滇或湘桂敌后游击亦可，希依情况自行决策。”

12月4日早晨7时，我到码头去视察甫告完工的邕江浮桥。这座浮桥，仅可供北岸的部队通过。堆积如山的物资，依

次排列的千余辆汽车，因载重关系，却无法利用浮桥，向南疏运，又因毗连南宁市区，也不能付之一炬，坐视这些物资与车辆在短期内即将落入共军之手，而无法作彻底破坏，使人遗憾！

下午1时，我的指挥所转移到吴村圩，南宁于是日晚间沦陷。

吴村圩是邕钦与邕镇公路的交叉点，北通南宁，南至钦州，西至镇南关。部队到达这里以后，可以说是到达了一个成败存亡的紧急关头。遵照华中长官公署的命令南下钦州呢？还是另辟途径孤军西上呢？我的脑子一直被这两个问题所困扰。

根据当时的敌情，东兰、万岗已于11月28日陷共，西进入滇的孔道——百色，共军已先我占领。而此时通过吴村圩的第十兵团和第十一兵团，以及随军撤退的大批难民，如蜂屯蚁沸一般朝南下钦州的公路上挤去，大家的心里，都存着乘搓过海的希望。但我仔细考量：由广东西进的共军，可能已先我占领石康、合浦（廉江），如果挥军南下，中途势必遭受共军的侧击。如果单独西进，似乎又违背了华中长官公署作战的计划。权衡其轻重利害，不管怎样，本兵团的行动方向，必须迅速在此可南可西的交叉点作最后的决定。

于是，召集了王天鸣、成刚、蒋伏生、何竹本、范湖等高级将领，审慎地作一番研究。对战争所特别要求的时空，我们精密的予以计算，认为西进尚有五天时间，可以集结整理，到万不得已时，可转入桂越边境，行动上不受约束，南下则至多只有三天的时间，大军与难民，集中钦州湾一隅之地，即使有足够的船只担任转运，时间上也恐怕来不及，想像中部队与物资之杂与多，一旦共军突袭，战则系统紊乱，退则背临大海，必将陷入绝境，束手待俘。

基于上述的判断，我决心西进，经绥绿、思乐向明江转

移。我必须在此表示我的心意，这一决定，完全是出于当时危急中的权宜之计。两害取其轻，无论如何，我是愿意替国家保存一点反共的实力，自然也得承当起擅作决定的责任。不过，我想我的决定，是可以向我的长官和我的部下交代得过的。

行动的方向决定了，我下令第七十一军熊军长，须于两日以内通过邕钦公路，向绥绿前进。下令第九十七军蒋军长，竭力拒止共军于邕江北岸，须待第七十一军通过邕钦公路后，依状况脱离敌人，但命令中规定，12月6日14时，须保有吴村圩以北地区，尔后再向绥绿以西转移。下令第十四军成军长于5日早晨出发，第十师于中午出发，向中和乡附近前进，并对苏彝乡方面严密戒备，直接掩护兵团主力的安全。

12月5日，兵团指挥所转移至绥绿。在行经吴村圩公路侧后面时，当面指示蒋军长、秦师长，要蒋军长的部队至吴村圩以北地区竭力支持，掩护熊军长的部队通过邕钦公路，再向绥绿逐次撤退。要秦师长的部队在狮子口以北地区竭力支持，掩护蒋军长占领阵地后，再循邕钦公路向钦州归建。10时指示第十四军成军长在三圩宿营，向东戒备。下午2时接熊军长无线电话，报告：

“第七十一军现在那路，今晚可抵新圩。沿途遭遇士兵，行动常受牵制。明日尚不能通过邕钦公路，请路北的部队，竭力掩护。”

我回答他：

“公路以北的部队，已下令竭力支持，但恐共军压力太大，行动必须迅速，不得已时，可向南绕道，望小心谨慎。”

随即，再把第七十一军的情形告诉蒋军长，指示他掩护第七十一军过邕钦公路后，与其并肩西进。

第七十一军自11月23日在桂林撤退，通过永福南进，因行动迟延了一日，未能跟上兵团，以后便是侧敌行进，处处要遭

受危害与拘束。4日于永淳渡过琶江，到达新圩，5日即与指挥所失去联络，我坐在电台工作室，通宵未眠，在等待该军的消息，心情更是焦虑万分。这支部队在目前算是本兵团的主力，且有悠久的作战历史，历年以来，参加各次战役，都能保持荣誉观念，战绩辉煌。军长熊新民少将，是一位富有胆识的卓越指挥官。我对这支部队不但爱护深厚，在此艰险的战局中，尤寄与扫荡开拓的厚望。就状况判断：该军既于5日晚间失去联络，很可能在新圩以西、吴村圩以东地区被围。我曾经下令蒋军在吴村圩以北支持到12月7日拂晓，掩护熊军通过公路。可是蒋军在6日早晨即已撤至绥绿，态势转变，原有的部署，也因之动摇，熊军即能幸免包围，也会由于连日不断的奔驰，行动上将感到极端的困难。战机的得失，常决定在最后五分钟，其真正的考验，也正在这种紧迫的关头。6日，第七十一军卒于上思以东地区，被共军截击，全部牺牲，军长熊新民被俘。这一事实所给予我的教训，是捕捉了机会，必须好好地运用，好好地掌握，稍一放纵，便又失之。同时，重视命令，协调合作，也是危难中最要紧的条件。

12月6日，下令第十四军在绥绿以北地区，占领要点，阻共南犯，竭力支持到8日拂晓，再逐次向思乐转进。下午4时，兵团指挥所转移到思乐。

12月7日，下令第十四军占领思乐东北地区要点，阻共西犯，竭力支持到10日拂晓。下令第九十七军向龙州以东地区集结。下午4时以无线电与白长官通话，请派飞机至新圩以西吴村圩以东侦察第七十一军行动。

12月8日，兵团指挥所转移到明江。接到白长官电报，指示两点：

一、进犯之敌，先头已到达钦州、大洞圩、吴村圩，现正西犯，企图于十万大山南北地区，包围我军，强迫决战。为保

有反攻大陆基地，暂避决战，各部立即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待机反攻。我已通过邕钦公路之部队第一兵团立即转入左江以北及右江地区，第十兵团立即转入十万大山南北地区，敌后游击。

二、为适应当前情况，各部队应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轻装分散，机动出击，化整为零，各自选择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

奉到上项电示后，我即刻往访广西全边对汛督办兼龙靖清剿指挥官姚槐中将，得悉明江以北雷平、养利、镇结、向都、天保、靖西、镇边各县，都是石山区，山区内的粮食丰富，对东北守备容易，本兵团似可向该地区集结。可是这一方案，又因时间过于匆迫，不能采行。

吴村圩那个交叉路口的决定，算是渡过了一个摆在前面的暗礁。此刻，形势上又遭逢到险恶的障碍，如何去克服这障碍，又是考验我的时候了。

在明江，我把全般状况作一研判：华中战区的第十兵团、第十一兵团、第三兵团，在南下钦州的途中，已被共军截击，全部覆没。第十七兵团仅剩下一百军于12月1日进抵桂北甲旋屯、拉号屯向南行动，始终未能靠近本兵团，其后向南转进，经八果旧州，到达越桂边境的平孟隘水口关，最后在乎而关被共军与越共南北夹击，全部牺牲，第十七兵团司令官刘嘉树中将被俘。本兵团第七十一军也在最后被共军击溃，第十四军与第九十一军，自衡邵转移到现在，喘息未停，能作战的员兵，仅有五个团。此时，共军东自绥绿，北自雷平，西自宁明，分三路组成快速纵队向本兵团进逼，以情形而论，可说是时紧势危，这是我们生死存亡的最后关键，为生存？为死亡？也必须在这最后关键作最后的决定。

12月9日，得到昆明卢汉投共的报道，入滇之道已绝。同时，接到东南军政长官陈诚上将电报：

“贵部行动目标，未知白长官有无计划与指示？弟以贵部如出北海防城，照目前敌情，恐于事实上难以达到，不如并力西进，重行入安南，保有根据地，然后相继行事，留越转台，皆可自卫，未知兄意如何？”

局势愈紧急，时间也愈匆促，我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对部队的行动方向下最大的决定。经召集王天鸣、蒋伏生、成刚、蒋当翊、何竹本、郭文灿、范湖、江望山等高级指挥官与高级幕僚举行会议，就陈长官适才所来的电示与白长官“力求避战，保存实力”的意旨，针对当面敌情，审慎研究。

会议中，一致认为：昆明政变，西进之路已断。转入左右江地区，从事敌后游击，地形上虽占便宜，但部队连续转战，未经整补，同时，在化整为零，集零为整的游击战术原则之下，以边区民众的生活情形特殊，不易得到支持和掩护；而粮弹一项，尤为重要困难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保存华中区这一部仅存的实力，一致主张“假道入越，转运回台”。

最后，我裁定了“假道入越，转运台湾”这一方案。行动的方案决定了，马上发出了两通电报和一封致法国驻越高级专员的函件。

致陈长官：

“本部各军，经历次战斗，伤亡惨重，现奉命转进至思乐明江间地区，奉白长官指示力求避战，保存实力，自选适当地区，以安全为第一。惟以官兵多系客籍，言语隔阂，地形生疏，且桂境遍地皆匪，民众多已趋附，再以地属边陲，土瘠民贫，不但行动艰难，补给亦难于供应，除将上情呈报外，拟遵钧座指示，拼力西进，但事关外交，恳请钧座先通知法越政府，俾便尔后行动。”

致白长官：

“共军主力西犯，另一股向雷平急进，本部遵令转入左江

北岸游击，依目前情况，恐不可能，应如何行动？乞示。”

致法驻越专员函：

“本兵团为维护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与世界人类之和平自由，与中共军战争经年，惟因一时失利，现已集结于中越边境。为尊重贵国主权，恪守国际公法，已训令主体部属，不得任意越境，但为保存现在之实力，配合将来反攻，拟即假道贵国海防，转运台湾，因时机迫切，除呈报敝国政府向贵国政府正式交涉外，特先派外事处长毛起鵬前来，承洽假道手续，敬祈秉中法亲善友谊及共同反共立场，惠允所请。”

同时，下令第十四军向长宁村峙浪街集结，第九十七军向下石圩以南上石圩以东地区集结。

9日上午8时，派毛起鵬处长携带致法驻越专员的函件随蒋伏生中将先行向爱店出发，和法方洽商假道事宜。晚11时，接成军长电话报告：“西窜共军，向明江进犯。”我下令兵团指挥所人员与部队，即时以木舟轮流渡过明江河，16时抵洞夏宿营，责令第十四军守备长桥以南要点，对思乐方面严密警戒。

12月11日下午2时，兵团指挥所转移到爱店，接成军长电报：

“明江南窜之敌于真日午与姚槐部在长桥附近接战，请电飭姚部在长桥附近逐次抵抗共军。为策兵团安全，已派六十三师进驻吞岩、板圩、那蓬地带，占领阵地，对思乐方面警戒。第十师南撤长桥乡至洞浪村以北之地区，阻敌南犯。”

我预计只要在两天之内，假道事宜能获得协定，保存这部实力，似乎没有多大困难。

12月12日上午8时，毛处长起鵬前来报告有关假道事宜，和法方获得的初步协议。其协议的内容是：

一、同意派参谋长何竹本、外事处长毛起鵬赴谅山、河内或

西贡，专送文书与接谈。

二、联合消灭胡志明的问题，现尚无权决定，因胡志明在保大视之，仅系叛逆，而目前所需商谈者，为地方性问题。

三、假道海防至台湾问题，同意分为500人一组，在预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由我政府交涉发还。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四、食粮补给问题由法方供应至离埠时为止。

五、银洋问题，到河内商谈合理解决的办法。

六、凡国民党军队及省防军，均由黄司令官负责调遣假道。

七、准备先行开放谅山，让眷属500人进入，由法方负责给养。

上述各项，平允合理，各高级将领都认为可行，经我同意之后，于下午3时派参谋长何竹本、外事处长毛起鹄再度赴峙马屯与法驻谅山边防军司令康士登上校就上项协议签字，成为有效的公文书。何竹本等并即赴谅山转河内，继商假道中各项技术问题。

入越假道，既已获得了协议。我对部队的调遣是第十四军由洞浪街，第九十七军由下石圩，逐次掩护，向爱店集结，并明令规定各部队遣送人员编组名册，及各种械弹器材统计表，准备在最短时间内开始行动。接着，我亲自草拟电文分呈总裁及东南行政长官陈上将，报告假道回台的交涉经过，请求派船接运。

入越假道，虽已获得了初步协议，但是关于人员的编组，武器的交付，行军路线，宿营地区，补给卫生，纠察警戒，码头设施及乘船区分等，均属相当繁杂的工作，事先必须有详细计划和充分准备。

原来，我预定各部队集结在爱店附近，等待何参谋长到河内与法方继续洽商，得到具体办法后再开始行动。不料，由明江宁明方面进犯的共军，攻势至为猛烈。12日晚至13日清晨，第十四军的六十三师在吞岩、板芋一带与敌激战，势难久支，第十师在洞浪街以北，第九十七军的三十三师及二四六团在爱店以北，都与共军发生接触。九十七军的副军长郭文灿及参谋长伍国光不幸被俘，情况紧急，以致准备工作，无法及时完成，不得已于12月13日上午8时，即开始入越行动。

爱店与峙马屯，为桂越边境南北对峙的两个高地，相距约五百公尺。爱店位于我桂南边境，有商店数十家，龙州督办公署，设置在此。峙马屯位于越北边境，有碉堡数座，法军设有成防所。两点之间，有隘谷一条，这就是中越的国境线。

我于12月13日上午9时，率指挥所第三组官兵，步下爱店市街，峙马屯堡垒上迎风飘扬的三色法国国旗，映入我的眼帘，只要再走五分钟，便离开了大陆最后一寸土，我对爱店的一草一木，都有无限依恋。再回首，遥望远远的丛林与隐隐的青山，丛林与青山之间传出来的枪声与烟火，震撼了我的内心，也勾出了我的热泪。经验告诉我：离乡别井是件最痛苦的事。何况这次别离是我们把守的国土被共党们所掠夺，逼迫我们走向异国的土地，我不能否认我没有责任。因此，我的心中，不单是充满着去国怀乡的凄苦情绪，同时也泛起了忧讥忧谗的惭愧感觉。我带着痛苦与依恋，揩拭着滴下来的眼泪，一步步向峙马屯的关卡走去，在迷惘与空虚中，离开了可爱的祖国。

书生投笔，空无所补

从黄旭初、李品仙、徐启明、黄杰四位重要负责人的叙述里，已可充分看出军事方面，在短短四个月中，由衡阳到钦

州，下泻数千里，以至一败涂地的惨况。最后，让我把亲身经历的见闻和感想，一并纪述于后，藉供研究战史者参考，并留作个人阅历中的一页。

笔者本属文职人员，由汝城县长调省后，旋任湘省府秘书。

1949年7月下旬省府西迁邵阳，我由长沙经衡山家乡赴衡阳。本拟由衡转邵，但在衡阳逗留数天中，适遇一友人，他在华中长官公署党政部门任处长，邀我担任该处秘书，于是中止赴邵，转往桂林。当时湖南省党政方面的人员如李支、李少陵、刘修如、蒋丙英等，均在此一新成立的机构内，权作安栖之所。在桂林暂住约两月，除饱览雄甲天下的山光水色而外，实际上并未办理任何工作。大家都抱着观望和避难的心理，希望西南大局能予扭转，我们才有所献力。并非我们有事不办，而是机关部队在迁徙游动中，上面举棋不定，根本没有任务交下来，好像我们是跟着长官公署专来“逃难”的一群。不只是外来的单位人员如此，连原有的省、县地方机关，亦莫不相类。这种败乱情势，恍如大厦将倾，人心惶恐，大家随波逐流，走一步算一步，如何谈得上反攻和收复？

自长沙“局部和平”、衡阳弃守后，不久贵阳也告陷落（11月15日），共军紧逼桂境。我们以为退到了白长官的广西老家，已无后撤之处，此时此地如再不奋起“小诸葛”的威望，放手一搏，更有何待？可是上面的决定，竟是暂奔南宁，再出海南岛；长官公署所有眷属循水路坐船先行（内人亦其中之一），官员则延后十天乘火车续发。从桂林到柳州本来朝发夕至，可是我们在超载的列车上，人上堆人，达六层之多（车厢内重叠四层，车厢顶上两层），简直插足无地。而且列车忽行忽止，整整走了七天，总算幸而抵柳。为什么竟有如此的军事行动？原因是政府发来的银元券贬值，几成废纸，铁路局领了

这些废纸，买不到所需燃料，车头不能升火发动，“有气无力”，寸步难移。只好就地取“柴”，代替燃煤，勉强开动后，缓缓爬行数十里，又复停下，照样上山砍树燃烧，如是者十余次，才算达成这一路段的“大撤退”。

我们到了柳州，市面倒是不错，以为在此应可好好安息一下，但是仅宿一宵，闻桂林已经放弃（11月22日），共军数路紧追不舍，军情急切，我等于仓皇中步过浮桥，在南岸人群混杂中赶上卡车，直奔迁江。迁江河面不宽，但水深流急，因无桥梁，须由轮船装载汽车而渡，每次约需十余分钟以上才可载运两三部车子过去。因此，北岸的车辆排列等渡，蜿蜒数十里，南岸候车的人堆，或坐或卧，风餐露宿，如是者三数天，能等到本单位车辆过河的就是幸福，长扬先去，尚未等到的惟有苦挨苦撑。最后掩护撤退的第一兵团，抵挡不住共军进逼的压力，乃下令焚车，损失千多辆运输工具。无车人员以后惟有徒步前进，或脱队自便，听天由命。笔者幸而等到了原车，直开宾阳，路经昆仑关，在古战场上凭吊一番，故垒残阳，凄然感喟。

记得11月底我等终于抵达南宁，找到本单位落脚之处，与内人会合，在败退中得免分散，自是欢天喜地。喘息不到三天，奉命循邕钦公路撤往广东钦州（中国大陆最南边的重要海港），再船运海口。我们连同家眷，于12月3日早渡过邕江浮桥，在亭子圩候车，其时军民蜂涌，均在等车辆过来，延至傍晚始登车南行。夜半过吴村，此处有两条大道，西通越南边境龙州、黄杰兵团就是由此路前往，长官公署和第十兵团，则由左路南下钦县。翌日抵塘报墟（粤桂边境十万大山中之小集）又遇小溪横阻，仍无桥梁须用轮渡载车，与迁江过河情况如出一辙，人难过去，车子尚在依次排队，两岸人车相望，苦候一天一夜而车仍未过渡。大家夜缩溪边草地，饥寒交煎，时闻枪。

声，大有草木皆兵之状。5日凌晨，我们决定结伴步行，相约在前途市镇候集人车。经整天跋涉，横过十万大山，傍晚抵小董，此处为钦州北方要镇，人烟稠密，街道井然，四周田园村庄，星罗棋布，截然是承平时期的福地。连日辛劳，得此小憩，正隐以为喜。

詎料睡至半夜，枪声四起，共军突然淹至、黑夜风凄，仓遽间不知所措。警卫部队四散登山，边打边逃，无心恋战，非武装人员又携家带眷，更难对抗，大都束手就擒，或乘隙而逸。解放军先头部队，只顾轻装追击，以解除国军武装为目的，对徒手人员无暇兼及，管制较为宽松。经随便清查后，凡属校级以上者，集体北解，尉级以下官佐和士兵，则发给放行“路条”，任令自行回乡，将来再由本地清算。笔者夫妇当晚闻警，匿于附近某村后菜园中，随获农家掩护，越数日该地情势稍安，乃化装商贩，仍向钦县潜行，由龙门港雇舟偷渡出海，暂脱困境。

其时，桂南、粤南全境尽失，华中主力张淦第三兵团，于12月3日在博白闻未经战阵，一夕猝然被俘；鲁道源之十一兵团，更在早一、二天被击垮，不知下落；徐启明之第十兵团，于12月5日后在十万大山中溃不成军，游移潜匿，仅余黄杰第一兵团残部，于12月13日差幸遁往越南；白长官30万大军已是风流云散，其本人和少数随行参副人员，先飞海口，得以身免，桂系数十年苦心经营之老本钱，至此全部丢光（重庆于11月30日失守，南宁于12月4日夜失守，云南卢汉、四川邓锡候、西康刘文辉等于12月9日通电起义）。

以上数段所叙，虽属个人经历细节，但由此窥见当时人心士气及社会、经济、交通种种实情，其影响于战局的胜败，大有关系，散不憚琐屑，以供参研之资。

兴亡成败，尽付东风

华中部队之全军覆没，我很少看到有深切检讨的文字，笔者不敏，愿以极为客观的看法，提出下列意见，虽已与事无补，亦足以警后之来者。

第一、论白崇禧先生资望的崇高，统驭的能力，用兵的胆识，指挥的机智，以及朝野各方仰赖的殷切，在当时国内各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连共军上下，初期亦心存惮畏，不敢轻视（桂林弃守后对方渐无顾虑）。以这种优势条件，本应有所作为，何至未经决战而一败涂地，笔者体察其中最大原因，应是外务太繁，压力太大，顾虑太多。在军情紧急中，他时而广州重庆，时而南宁海口，东奔西驰，协调政争，以致心烦意乱，未能专注于战场指挥，不但影响斗志和决策，并且失误了若干战阵中的主动。历史上在逆势中而能扭转或稳定战局的名将，应是在一个英明领导者下，心无旁骛，专搞本行本职，才能驰骋疆场，决胜千里。惜白氏未能注重及此，纵令当时处境有不能置身事外之苦，却又不能壮士断腕，毅然排除，良深浩叹！

第二、白氏用兵，素来长于攻击，常用两翼深入，迂迴包抄战略。如北伐之战任东路前敌指挥，由江西下浙江，定上海，所向披靡，继而西征武汉，北捣幽燕，攻无不克，赢得“小诸葛”的美称。其时而对之敌，如吴（佩孚）、如孙（传芳）、如唐（生智）、如张（作霖），并非弱者，且人枪倍之，革命军竟何以战无不胜？此无它，贵在有主动的攻击精神。可是到了1949年4月共军未渡江前，尚拥有半个中国土地，渡江之后，白氏以武汉突出，第一步撤到长沙，不久再度退到衡阳，三度退至桂林，四度退至南宁，最后犹作撤退海南岛的决定。在那七、八个月中，从武汉以迄钦州，难道无一可

战之地？无一可战之机？我看基本上还是决心问题。为了保持最后一点本钱，以免一次冒险输光，惟有再四后撤，以待机势好转。因此在衡阳、桂林、南宁诸次军事会议中，均是研商如何撤退之计，并未着重攻取破敌之策。最高指挥官既存如此心态，无形中影响全军上下，士无斗志，一遇风吹草动，便即闻警而溃（其它各战区均是如此情况）。

第三、大局大势的好坏？当然影响战事的胜负，故历来成大功立大业者必须运用“时”、“势”。但时机与情势，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不能坐待而致，须凭创造得来。所谓“创机造势”，“要拼才会赢”，如不采取主动，不拼不打，怎会有奇迹出现？当时白先生系各方重寄，假定能在衡阳桂林间，严密部署，决心一战，凭他的谋略和作战经验，机动运用，未尝不可重挫敌锋，挺住湘桂一线，稳定西南局面。由此士气一振，各方奋起，大局当可随之改观。至少西南大后方，投机者不敢纷起易帜，崩溃不至如此之速。论白氏气质和生平功业，堪称民国中英雄人物，不过只可称为时势孕育下的英雄，尚非创造时势之英雄。而且，“自古英雄出少年”，“自昔英雄悲老去”，一个人的机缘运会，不可能全胜到底，如拿破仑固一世之雄，犹不免滑铁卢之惨，足见盛衰消长，似亦有数？居高位负重责者，不可不有警于此。

往事还如一梦中

——宁乡云山纪访

周 闾 芝

重阳后一日，送别了年迈体弱的同学，我偕仰天、仲邦驱车拜访了一别近半个世纪的母校——宁乡师范故址云山。下车后，抄横市老街旧道且行且语。不久，当年宁师八班同学毕业离校、在泅水之滨、男女同学痛哭惜别的步云桥跃现眼前，真有“灞桥今日别离难”之慨，抚今追昔，不胜感慨系之。“步云桥”早在20年前被特大山洪冲毁，现仅存当地采砂队架起的几段便桥，我们过此到达彼岸，一眼望到了那已有130高龄的云山书院，依然无恙的座落在嶙峋突兀的螺头山麓，久别重逢，令人心神向往。

进入书院正门，迎面看到的依然是金灿灿的“名山讲席”四字大匾，拟如明镜高悬，光彩夺目。那里原是两杠三间，近400个平方米的大礼堂。当年，我们在那里举行过多少次怀念国父——孙总理的纪念周，聆听过多少次有名的学术报告。如果集会时间较长，同学们有些困惑之际，一位身材短小，学识渊博的廖萼泉先生不慌不忙地走上讲台，拖拢一把小凳，顺势一跃上去，这时，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他老人家慢条斯理地学用师公、道人、书生和花脸四种不同腔调高声唱诵：“渭城朝雨挹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师生们听了无不捧腹大笑。在以后的某些集会里，如果

●周闾芝，湖南宁乡人，曾毕业于云山宁乡师范。

时间长了一些，大家会异口同声地欢迎廖先生来一段“余兴”表演，就像吃过油腻腻的丰盛酒席之后，急需来一二碟可口的时蔬一样，那怕时间很短，也会心满意足。回思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今天置身礼堂的我们，宛如又看到了萼泉先生在一阵暴风雨般掌声后，徐行慢步地走上讲台，有力地分开两腿，左右平举两手，引人入胜地讲起他自编的“大、中、行”哲学来了，笑声绕屋梁，花月正春风，此景此情，永难磨灭。

礼堂后两侧有两间小住房，分别是李海清庶务和级任秦静根先生的住处。我们首先进入四公房内，虽没住人，但简单的家具陈列，几乎未改，可物是人非了。他老瘦削的脸庞，花白的头发，衬映着两个高高的颧骨，严峻的面容，也偶有笑容，可能是年龄关系，不大爱修边幅，讲课到兴奋时，用衣袖擦黑板的情况，并不罕见。他老有些重听，但目力甚好，可明察秋毫。他范读课文感情充沛，气势磅礴，抑扬顿挫，恰到好处。曾记得在讲完“王纶上疏清除秦桧”一文后，激昂、恳切地读道“……夫三尺童子指犬豕而使之拜则怫然怒，今堂堂大国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时，他颈根上青筋鼓胀，豆大的汗珠从额角上滚下来，使同学们深恶痛疾和发人深省的情绪交织在一起，心潮达到了顶峰。他老晚年刻苦练习国画，岁寒三友是成功之作。他那铁画银钩的书法，脍炙人口的诗词，一一展现在我们的心灵深处。他那善于启发的“自学辅导”，给了我们最好的示范，在以后长时间的教学中，我们也实践了这样的方法，无不收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出了四公房，转入东头一个场所，那是原来的男女食堂。现在已合而为一了，还向两边扩大了一些既可作礼堂，又是理想的雨操场。它的两侧是石印堂、调养室、缝纫室、理发室……都不难找到，只是空旷旷的。一提到理发室，就很自然地

引出了一段笑料。那时，学生全部住校。男生不准留长发，“西式头”是绝对禁止的，为此，教务处颁布了一条禁令，文曰：

学生一律剪剃光头
不准留蓄其他式样

由于没有加上标点（那时本不作行标点符号）贴在理发室门上后，给调皮学生以可乘之机。一天，好些人在等候理发，我们班的张宗灏是其中一个。他凝视着“禁令”好一会，便拿出钢笔添上了几个标点，便成了：

“学生一律剪，剃光头不准，留蓄其他式样！”从此，理发室热闹异常了，没有哪个瞥见不发笑的。不久，秦先生到理发室检查禁令情况，那几个标点一下映入了他的眼帘，标点越看越大了，秦先生成了哭笑不得的“八大山人”哩。晚自习前，紧急集合钟声响了，没等同学们整好队，秦先生早就站在校门前一如既往的位置；首先是大声斥责谁在“禁令”上添油加醋？这突如其来的晴空霹雳对于绝大部份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来说有如一丈二尺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有个初生牛犊者竟举手请求释疑，陷入窘境的秦先生迫不得已把添加标点改变“禁令”原意的事实一讲，不仅引得同学们大笑，就连他老人家也都欲笑还颦了。我刚把这故事一提出，仰天、仲邦不约而同地边笑边念：“学生一律剪，剃光头不准……”说也奇怪，快半个世纪了，似乎理发室那张门片上还留下了一个贴的印痕。后来，我们在语法教学中，差不多没一次不运用这个典故，去告诫学生在写作中千万不可忽视标点的作用。

我们离开食堂，沿礼堂后长廊继续前进，原来的“简师班”和办公室隔廊相望。当年我八班万锡良因侮辱教师，要受开除处分，首先由班长选派代表去办公室向校长求情给予从轻处罚未获批准，接着全班同学再去求情，就是在这里“大闹天

宫”的。锡良最终被撵出了校门，学潮暂告平息，后来在“泱泱校刊”上出现了一则影射谜语：秦穆公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殉葬，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谜底：万惜良。刊上未披露）。由此足见班上同学对锡良之不幸，无不寄予同情惜别之情。离办公室不远就是“藏书楼”了。我不会健忘，民国30年湘北吃紧敌机犯宁，狂轰滥炸，学校西边，“宁乡图书馆”的“四库全书”、“万有文库”、“资治通鉴”、“少年百科全书”、整套唐宋元明清史以及所有图书，用浏阳鞭炮桶分别装好，一箱一箱地叠满了整个“藏书楼”，真是汗牛充栋。1944年，日寇陷宁，据说绝大部分图书散失，或毁于兵变，或失窃于个人，所剩无几，人去楼空，可悲可叹！加上十年浩劫，不仅散失图书，连“那块金光耀眼”的“藏书楼”牌匾也葬身于“破旧立新”了。如今楼房屋梁全部蛀虫，加上未及时维修，只剩下四角高空的露天“楼”了，但它东西两头四间宽敞明亮的教室依然存在，不过墙上标有“特级危房”四字。我们那管这些，仍然冒险进去了。首先踏入八班教室，仲邦说：“我当年坐在这里。”仰天抱枪指手划脚说：“我……我我是坐在那里。”我也清楚地记得毕业那期我坐在正中，杨纪彝在我前面，晏妙安靠墙角坐着，他个子高大，都叫他“妙高峰”，女同学则安排在靠近教室的两排课桌。看看，比划着，议论着，似乎号音哒哒，书声琅琅的蓬勃气氛仍如昨日。从八班教室出来对中四、中五、师九班教室作了一番巡礼，可惜它们都已病入膏肓，非大动手术实难奏效。穿过教室沿外廊缓缓移动，院内几棵大樟依然浮青滴翠，在微风下频频摆动，似乎在热情欢迎久别的亲人。由外廊右转，到了那一眼望不到头的自习室。一间自修室在当时安置12人，6人一组在两盏植物油灯下复习功课，求索新知。“学海扬帆常废寝，书山斩棘每忘餐。”我们在那里送走了多少不眠之夜，度过了

无数霜雪之晨。睹物生情，勾画出千丝万缕的遐想，“残山梦最真，旧境丢难掉”，不是仲邦促归，我已留连忘返。

由自修室长廊往右拐，当年的艺术室即在眼前，它是我当时学习修理风琴的“车间”。我也会和伙伴们在那里开展课余活动：学拨墨、画鱼虾，什么画树从枝起，翎毛先画嘴的绘画法规也掌握得不少；我也曾和朋友们在那里拉胡琴，唱数板，什么长板坡前一声吼，吓断了桥梁水倒流；什么浣纱女子好行善，为我投江实可怜……那时每天课余，艺术室就热闹起来了。它的对面是图画教师宋子翼先生的住房，一提起这位画师，谁都赞不绝口。他中等身材，光秃发亮的前额，上唇留着一束短而齐的胡须，笑容满面，平易近人。那时的美术课每周两节连上，周末过后，我们很早就盼望这两堂课的到来。上美术课了，上课钟声刚停，他早进了教室。首先把燃着的一根一米来长的年香，挂在黑板框的小钉上，再将一盆50支装的香烟伴着半盒粉笔放在讲台上，然后打开了“话匣子”。在理论讲述中插入了一些动人情节，全班同学自然是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讲述着某美专招生，题目是“深山藏古寺”。考生们有的画着一片苍松翠柏，古木参天，在秃枝上挂上一座钟；有的画着同样的背景，在树林稀疏处露出庵堂的一角；有的画着一个村媪牵着个小孩，提着香烛篮向一片葱葱郁郁的古松柏林中走去，这些都不是全优作品。只有一个18岁的考生把握了试题中心，他与众不同的是古木参天的松柏林中有一条修长的道路，一口水塘就在道旁，一个和尚挑着一担水往回走。评卷者一致认为只有这幅画真正地突出了“藏”字，评为“状元作品”……宋先生讲得有声有色，大有“天花乱坠”之势。同学们听得目瞪口呆，啧啧赞赏声不绝于耳。他也曾讲过一位万贯家财的员外延请一位画家为他作一幅大“中堂”。画家吩咐家人备足半澡盆（杀猪用的）墨汁，一担清水，把好几张四尺宣拼将

起来，摊在堂屋地上，一切就绪了，画家宣布把前后门紧闭，屋里大小人等均须回避。各人遵命，自不待言，只有员外偷偷地想从门缝里得到些什么。绘画开始了，奇迹出现了！画家脱光衣服往澡盆一翻滚，爬出来往纸上一个侧卧，两手左右几摊，然后弓着身子连坐几下，再向前一俯卧，偌大一幅“中堂”作好了。他用清水洗净一身，穿好衣服，解除了“戒严令”。大家一跃而上，争饱眼福，原来是一幅《蝴蝶戏金瓜》的大作，不仅蝴蝶活灵活现，瓜瓣清晰可数，而且瓜蒂也搭配得很自然云云。此时，男同学哄堂大笑，女同学则窃窃私语，似笑非笑，大约是在议论着宋先生午睡醒来酒未醒吧。

宋老教画，善于启发，如何蘸墨运笔，怎样浸润着色，个别辅导殷勤鼓舞，定期出刊，既有出墙红杏，又有满园桃李，婷婷袅袅，飘舞于春风化雨之中，争妍斗媚，竞相开放。我们记忆犹新，1943年上期毕业前夕，要求宋先生在黑板上画“百雀图”作留念，他老慨然应允，把一百只麻雀姿态各异地布满了两黑板，可惜仅昙花一现，但百雀争鸣永远铭心刻骨。

宋先生隔壁住着数学教师王本荣先生，他老和颜悦色，从不流露出一丝半毫忧郁之色，颇有学者风度，他是教师中唯一穿西装的人。他教我们的数学，方式多，讲得透，深入浅出，重点明显。“杨氏代数学”习题多，差不多堂堂课有练习，王先生总是诲人不倦，学生也能学而不厌。学完代数后，举行了一次大会考，试场设在“藏书楼”下的长廊。监考教师有四个，师八、中三男女同学110多人交错编成梅花座，别说舞弊，连想也不敢想，那次“关”人人都过得好。离校后，我多年从事中小学教育，一贯是教文、史、自然，偶尔教过化学，可在十年浩劫中，“造反派”硬要我教初中代数，一言堂，无价可还，只好边复习，边教学，学生反应良好。陈剑渔先生教我们的历史与应用文，史实精通，诗词歌赋，等因奉此，讲述滔

滔不绝，而且出口成章，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我们沿艺术室通道前进左拐，过了礼堂，出了校门，到了“希贤祠”，那是当年的女同学宿舍。迎面看到的除当时秦妈占用的卧室和正面一间听堂外，其它荡然无存。由于那时受封建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的束缚，我们极少跨进那张门，但经常见到一位身材窈窕的女训育员杨文彤先生和气而又严峻地在门口踱来踱去，有时又牵着她那唯一可爱的小天使——胡天廷到操场上蹦蹦跳跳。别看那孩子不满5岁，却能站在台上有条不紊，绘声绘色地讲述出晚清时期“中法战争”的故事，腐败的清政府以不败而败、法寇以不胜而胜的可悲局面告终，闻之令人发指。

从希贤祠左侧出角楼门通往“永云寺”，门楼上留下了仅存的“云山书院”四字。仲邦如获至宝地大声招呼我帮仰山连定位置，猎取了那个珍贵镜头。

午时过中牛，我们沿操场外围墙下的便道走去，再一次瞻仰了云山的端庄容颜，才恋恋不舍地迈向横市大桥走去。

别了，云山，亲爱的云山！云彩多情，孕育了无数先觉，山川无恙，启迪了多少后昆。在您温暖的怀抱中，度过金色年华的兄弟姐妹们，谁不觉得幸运馨香，谁不感到自豪骄傲！

再见吧，云山！

先父杨东莼事略

杨慎之*

先父杨东莼公（1900.3.8—1979.9.25.）名岂能，又号人杞，在白区地下工作时曾用罗东莼等化名。父母早丧，幼时与胞弟杨人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已故）依干妈童氏生活。1914年毕业于醴陵朱子祠小学，1918年在长沙长郡中学毕业。1919年入北京大学文预科一年级读书，参加了当年爆发的伟大的“五·四”运动，开始接触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积极追求革命真理。1920年与邓中夏、罗章龙等组织“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其后，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具体领导下，随邓中夏、罗章龙、吴汝明等深入长辛店铁路工人群众，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广交工人朋友，宣传革命道理；又与邓中夏、罗章龙等参加了由李大钊同志直接领导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该会19个发起人之一。1922年南归故里结婚，任醴陵西山县立渌江中学校长。李大钊曾经写信给他，称“奴隶未灭，何以为家”，促其继续参加革命。1923年7月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何叔衡等经常联系，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和社会活动家之一。在长沙期间，他先后执教于长郡中学和协均中学，并领导协均中学文史科的全面教务。1925年春，湖南省总工会成立，应郭亮之邀，他担任湖南省总工会宣传部部长，并兼《长沙工人日报》社长。通过郭亮的介绍，他被恢

* 杨慎之，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复了一度中断的党的组织关系。1927年夏初，许克祥反革命屠杀的端倪已见，杨东莼也大体获得了险恶的讯息，但他仍然镇定地编发最后一期报纸，随后乘间潜赴汉口，出席第四次全国劳动代表大会，任宣传处主任。后被派往15军任政治部秘书，因被告密，离开部队，又一次失掉组织关系。1927年12月，他东渡日本，开始了长期的著述、翻译、编辑生涯。

—

抵日后，杨东莼即潜心钻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阅读外文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并从事翻译工作。他的外语基础并不很好，在长郡中学（旧制长郡中学四年毕业，一个年级分三班，两班习英语，一班习德语）四年和北京大学两年，学的都是德文，至于英文，只在小学读了三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编给印度人学的《正则英文》课本，而在中学和大学则是把它当做第二外语来学的。他凭借着这样积累起来的，根底并不深厚的德语、英语和在日本刚刚学到的日语知识，就大胆尝试着翻译工作。首先翻译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 1804—1872）论》，这部著作明确宣布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哲学上的两大基本派别，此书译本一出，立刻在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的中国学术文化界获得广泛好评。

（德）约·狄慈根（Joseph Dietzgen 1828—1888）是一个制革工人，是一位自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867年开始同马克思、恩格斯通讯，通过自学和研究，独立地得出了同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极其相似的结论，马克思称他为“我们的哲学家”。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曾再三引证过约·狄慈根的话来痛斥经验批判主义。列宁既对他有高度的评价，也指出了他的缺点，说“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

的特殊哲学”，他的主要缺点是“表述的不正确”。列宁在《纪念约瑟夫·狄慈根逝世二十五周年》一文中进一步指出：“狄慈根的作用在于：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狄慈根并不认为自己是某一学派的创始人，这一点对于评价工人出身的狄慈根是非常重要的。……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人，应该读一读狄慈根的著作，但任何时候也不要忘记他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阐释并不总是正确的，只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才能学到哲学。”上述引文表明：列宁正确地评价了作为工人出身的哲学家狄慈根，同时也郑重指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的党派性和科学性的高度统一。1927年冬，杨东莼在东京买到了一部欧根·狄慈根（Eugen Dietzgen 1862—1930）1911年出版他父亲的《狄慈根全集》，他以三个月的时间通读了一遍。他想，国内白色恐怖严重，马、恩、列的译著不可能出版，就翻译了狄慈根的四篇重要哲学著作。即：《人脑活动的本质》（又名《辩证法的唯物观》）、《论逻辑书简》、《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和《哲学的成果》。这些译文的半数，建国前都曾公开出版。建国以后，杨东莼深深感到，为了战斗，工人阶级正在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且已经形成一支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而约·狄慈根正是一位值得学习的榜样。他又意识到，原来的译文过于粗糙，于是根据1961年由柏林出版的约·狄慈根三本著作的新版本全面重译，定名为《狄慈根哲学选集》，共20余万字，交由三联书店出版。他十分尊重狄慈根，对其著作深感兴趣，晚年还在孜孜不倦地翻译狄慈根的《对话录》，可惜疾病过早地夺去了他的生命，这个愿望终于未能实现。

十九世纪美国民族学、考古学家路易斯·亨利·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 1818—1881）的《古代社会》

(“Ancient Society”),是一部影响极大的巨著,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重视和高度评价这部杰出的著作。1927年冬杨东莼到东京以后,找到了美国芝加哥柯尔公司出版的通行本,通读一遍,就被这部著作深深吸引住了。他认为,《古代社会》对于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书,对于原始社会的研究,更是一部重要的著作,在当时出版界面临着严密文网的情况下,以世界名著的面貌把这部书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读者,既是一条较易通过的“捷径”,又是一项最为扎实的理论奠基工程。但是,他发现《古代社会》包括的内容很丰富,涉及面很广,摩尔根的文笔十分艰涩,许多句子的确切含义不易掌握,而且也很冗长。因此,要仔细地读懂这部书,并将它译成流畅易懂的中文,实在是一件艰巨的工作。以杨东莼当时所具备的外语水平和业务知识水平来衡量,要独立把这部书全译出来是相当困难的。他依靠字典一段一段地直译,译完一章,对照原文仔细阅读两遍,咀嚼每章、每段和每句话的内容,将译文反复进行修改和润色,使其易于为读者所理解和接受。这部书在三十年代由李达任总编辑的昆仑书店初版;经过半年多修改之后,在1935年12月经周予同推荐,由何炳松负责,纳入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出版;1950年4月,又原封未动地由商务印书馆再版;1957年9月,经过民族学家冯汉骥教授修改校订,并写出长篇《校后记》,由三联书店第四次出版;1972年,商务印书馆将上述版本重印发行。1971年,杨东莼读到美国哈佛大学出版部于1964年出版的、由摩尔根著作研究专家怀特(Leslie White)编校的《古代社会》。这个版本有下面几个优点:第一、怀特对全书文字作了详细的校订,在校订过程中,他还参考了罗彻斯特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摩氏原著手稿,手稿上有摩氏最后的修改;第二、怀特对注释中所引用的各种著作进行了核对,其中有许多章节页次号码错误之外

(或由于摩氏笔误,或由于排印误植),都尽可能予以更正;第三,注释中有一些引用书目是简称,往往过于简略,以致一般读者不知原来的书名,无从查阅,怀特补出了大多数原书名,便利读者;第四,注释引用古典著作中的希腊、拉丁原文,怀特都改用了最新的英译本;第五,怀特在摩氏原著之外,增添了一些注释,有助于了解摩尔根的研究活动、材料来源以及他所引用的作者。于是,杨东莼采取了“老中青”三结合的办法,与马雍、马巨兄弟合作(马氏兄弟为马宗霍教授哲嗣,重译此书时,杨东莼72岁,马雍40多岁,马巨才28岁),穷数年之功,终于在1976年初将《古代社会》全部重译,完成了近50万字的译文任务。后来,杨东莼谈起这次合作时说:“从我个人而言,感受实深,因为我对此书反反复复,前后一起搞过四次,都是关着门干的,其结果,很不容易发现自己的错误,而用‘三结合’的方法来做,其结果就两样了,不仅易于发现错误,而且能及时改正错误。班班辈出,后来居上,这正表现祖国一番新气象,可喜之至。”很可惜,杨东莼不及见到新译本面世(新译本是1987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就溘然长逝了。

从1923年翻译(德)海涅(Heinrich Heine 1797—1856)的诗歌开始,到1979年临终前仍在伏案试译《对话录》为止,前后凡56年,杨东莼都在断断续续地从事翻译工作。其间,除了译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以外,还译过(苏)德波林(1881—1963)的《斯宾诺莎与辩证唯物主义》(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又和宁敦伍根据德国人赫尔曼·康克尔于1927年所编的马克思主义文库第三篇,译出了《机械论的唯物论批评》(上海昆仑书店出版)。他译的书不多,但影响很大。他是以一种“盗火者”的献身精神来进行翻译的,他是在克服许多困难(包括自身的弱点)的情况下来进行翻译的,他是抱着对原著者和读

者极端负责，对译文磨砺不辍、刻意求工的严肃态度进行翻译的。

杨东莼的著述主要是三本书：《本国文化史大纲》、《中国学术史讲话》和《高中本国史》。

《本国文化史大纲》成书于日本，1931年8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作者谦称为“编”，实际上是一部独立经营的专史著作。这部文化专史肯定一个前提：“文化就是生活，文化史乃是叙述人类生活各方面的纪录。”从这个前提出发，作者比较早地体现了“古为今用”的治史原则，指出编写本国文化史首先应该注意之点（或称“取材标准”）是，集中力量记述与我们有关的、影响及于现代生活的“我们祖先的那些活动”，

“不拘是那一章，不拘是那一节，我们都要追究到这两个问题上去”。在编著方法上，作者摆脱了前人已经道破的弊病（郑樵就讲过：“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抛弃了“朝代观念”，不采“流水帐簿”和“总簿”的形式。正如作者所说，

“我们（以）一个一个的事实做单元去写本书的时候，我就只将各时代之和我们有关而又影响于现代生活的重要事实加以叙述，并且，力求阐明这些事实前后相因的关键”。在叙述方法上，我们既反对那种“史料之来源不真确”的“秉笔直书”，又反对“出自主观的立场和先入为主的见解”的“夹叙夹议”，而是“尽力地固守着客观的立场，用经济的解释，以阐明一事实之前因后果和利病得失，以及诸事实间之前后相因的关键”。按照上述取材标准、编著方法和叙述方法，作者将全书内容分成三大部分：一、经济生活之部；二、社会、政治生活之部；三、智慧生活之部。这种划分，大体上已经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不同范畴的活动区别清楚了。但是，作者意识到，这种划分方法并不见得尽善尽美，因为人们的某一项历史活动，“其间自无明确而不可逾越的界限”。例如教育，把它

“归之于智慧生活之部，亦无不可”，但它“带着很浓厚的社会生活的性质，因此，就把它归到社会、政治生活之部去了”。这里透露了一个消息：作者是把教育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来进行思考的，这和后来他成为一个忠诚的教育工作者有着极其深刻的、内在的思想联系。

《中国学术史讲话》几乎和《本国文化史大纲》同时成书，上海北新书局初版发行标明的时间为1932年11月。1986年7月，湖南岳麓书社作为《凤凰丛书》之一重印发行。这本书只有22万字，以“讲话”的体裁分为：学术思想的萌芽、学术思想的解放与分野、学术思想的混合与儒家的独尊、道教的兴起及其变革、自然主义的特盛、佛教的输入及其在中国的发展与影响、理学未兴前学术思想的倾向儒学的大转变——理学、西学东渐、朴学、今文学与维新运动、新文化运动等共计12讲，下置94个小题。分别对中国学术史上的每一重大时期、重要思潮、重要学派、重要人物、重要著作以及它们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进行了简洁晓畅的叙述和切中肯綮的论衡。这本书有两个显著特色：一是作者对头绪纷繁、浩瀚若海的中国学术史料，进行了爬梳整理，做到了详略恰当，巨细不捐；这种博以返约、厚积薄发的严谨学风，反映了作者学养的深邃和驾驭史料的功力；二是作者在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以后，对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思想资料进行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实事求是的分析评价。原《大公报》名记者徐盈说：“杨东老的传记，可以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来写，也可以作为一个杰出的教育家来写，还可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来写，就看你取的是什么角度，强调的是哪个侧面。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在各类活动中，特别是在学术活动中，都能大胆地（即使不够成熟）力图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评价是公允至当的，确非溢美之辞。

《高中本国史》是杨东莼在三十年代中期编著的一部篇幅很大、内容比较系统翔实的教科书。这部书曾经几次修改，由北新书局多次印刷发行。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许多高中历史教员，多采此书作为基本教材，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誉和欢迎。但是，这部三厚册的书存在着一些明显的缺点和错误。例如，它讲到现代、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时，只简述和肯定了严复、梁启超和胡适三个人的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劳绩，认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权初步、孙文学说、实业计划“最为博大精深”，“国人至是在思想上才获得正确的指导”。但对其他在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学、历史学等方面卓有建树并有系统主张者，从无一言及之。此外，对于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也作了不恰当的评价。所有这些，全国解放前夕就有学者著文提出过批评。

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杨东莼以大部分精力献身人民教育事业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除前述修订旧译外，实际上并没有专事著译。在此值得提到的是，他在全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负责主编的8集近300万字的《辛亥革命回忆录》，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亲历、亲见、亲闻的宝贵史料；他为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调查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并亲自制定了庞大的调查规划草案；他对通行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译本，提出了大量改讹匡误的意见；在主持广西大学、华中师范学院校务期间，他作了大量的论述人民教育工作的报告。此外，这一时期他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许多文章，其中固不乏令人心折的佳制，但绝大多数都留下“左”的印记。其中最突出的是1957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何物自由主义》一书，收集了《知识分子在斗争风暴中何去何从？》、《何物自由主义？》（按《何物自由主义》一文，最早发表于《大公报》，随后《人民日报》转载，以后又由一万余字扩充

为五万余字，交由中国青年出版社收入丛书出版。这篇文章的基本思路符合马克思主义，影响较大），《坐什么渡船？》，《人民的新闻事业不容许右派分子插手》，《关于“叛逆性格”》共5篇文章，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纪录。虽然作者在反右派斗争以后就敏锐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自己的工作范围以内，信任和使用了一批在1957年横遭贬谪而又确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并且以推诚相见和平等待人的态度温暖了这些同志的心；虽然作者在十年动乱期间痛定思痛，进一步认识到了“左”的危害，经常和亲密友朋表示自己的歉疚之情。但是，历史毕竟是历史，它是不能够用彩色斑斓的画笔随意涂抹装饰的。为尊者、亲者、贤者、智者讳，无此必要，最必要的事情是刻骨铭心地吸取教训：一个善良正直的老知识分子的心，是怎样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被扭曲了的？

二

杨东莼是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他一生中，大约有25年的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在国民党统治地区，他巧妙地利用地方势力和中央集权势力之间的矛盾，努力发展进步教育事业。全国解放以后，他为人民教育事业呕心沥血，是一位从来不知疲倦为何物的辛勤园丁。他晚年所从事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工作，就是以团结广大教育战线的同志（特别是中学教员），提高他们的教学和科研活动的积极性，作为主要任务的。

1930年12月，杨东莼由日本归国。此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在蒋桂战争失败后退守广西，与蒋介石中央政权继续对立抗衡。他们装模作样，以“建设广西、复兴中国”为号召，提出“三自三寓”政策，训练人材，推行所谓“新政”。广西师范专科学校的创办，正是桂系培养新政人材的一项重要

措施。1932年夏天，广西教育厅厅长、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推荐在广州中山大学才执教半年的杨东莼担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杨东莼接任以后，表面上适应桂系提出的口号，实际上则把师专办成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和培养广西革命青年的摇篮。在办学思想方面，他明确地提出了两条方针，就是学习上提倡自由研究的学风，生活上主张养成集体主义的作风。他聘请了许多思想进步、学有专长的学者到校任教，如经济学家薛暮桥、语文学家陈望道、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以及左翼作家夏征农、沈起予、杨潮等，都在广西师专教过书。广西师专的第一、二届办得虎虎有生气，培养了广西革命运动一批忠勇战士和广西中等教育的一批骨干力量。他们中很多人后来成为共产党员，有几个优秀的学生如麦世德、刘敬安等在抗日战争中为党担负重要工作，在桂系军阀的屠刀下英勇牺牲了。1934年5月，由于杨东莼的办学思想和桂系的意图相左，加之他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第三军的党代表、著名共产党员朱克靖（化名朱笃一）为师专教务长，被白崇禧发现，终于为桂系所不容，被迫辞去广西师专校长职务。

杨东莼离桂至上海，“一二·九”运动后，参加了沈钧儒、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从事爱国民主运动。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南京当局先用分化手段解决了广东问题，把广西孤立起来。但李宗仁、白崇禧顽抗固拒，为了增加政治资本，以联合各党派团结抗日为号召，一面争取李济深、蔡廷锴合作，一面电邀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赴桂共商国是。沈老派杨东莼到广西走一趟，杨在南宁向李宗仁等介绍了全国抗日救亡的形势，传达了救国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反对在“南宁开府”的过激作法，要桂系促蒋共同抗日，这对以后桂系调遣军队去前线作战，无疑起了一定作用。1937年抗战全面展开，国、共两党在抗日旗帜下实现了第二次合

作。杨东莼过去和张治中相识，他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充任了以张治中为主席的湖南省政府的高级参议。他在长沙主持当地救国会的工作，经常和犁头街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主任徐特立联系，推进湖南抗敌后援会的抗日宣传活动，对《观察日报》的编辑出版进行帮助。1938年冬，蒋介石决定设置桂林行营，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兼任主任。行营成立之前，刘斐曾向白崇禧建议，以杨东莼和李任仁分别担任桂林行营秘书长和政治部主任之职。白崇禧以此事请示蒋介石，蒋只同意任李任仁为政治部主任，而不同意东杨莼为秘书长，因蒋认为杨东莼是“反党”（反国民党）、“反中央”（反国民党政府）的。李任仁见杨东莼被否决，自己独掌难鸣，对政治部主任一职，最后也就婉言谢绝了。

1938年11月12日，出现了震惊中外的长沙“文夕大火”。这年冬天，杨东莼由长沙转桂林，经当时广西省参议会议长李任仁推荐，广西当局邀请他在桂林筹建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这是杨东莼第三次入桂，和第一次入桂担任师专校长、第二次入桂领导“六·一运动”一样，都受到了李任仁的有力推荐，而和桂系关系特深的高级幕宾、杨东莼儿时的同学和朋友刘斐，则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的。关于杨东莼和刘斐的关系，程思远有一段精采的话：“东莼先生与为章（刘斐字）先生幼同里，长同校。东莼在三十年代先后入桂，任广西师专校长和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皆为章先生一手推荐之功。而在1946年国共战争爆发后，为章先生以参谋次长参加‘官邸作战会报’（不是汇报），他在‘对日作战是内行，对内作战是外行’的遁辞下，存心作了许多错误的部署和献议，使国民党军受到非常不利的后果。所以有此，也都是东莼先生穿针引线所起的作用。在事业中这样紧密配合，相得益彰，历史上实不多见。”刘斐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思维敏捷，雄辩滔滔，负才自恃，临事一经决断，就很少或很难采纳别

人的意见。但他对杨东莼则虚心求教，即使是与己见相违的主张也能虚衷接纳。杨东莼通过自己的挚友，把党的统一战线的无远弗届的威力，施展到国民党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心脏部位去了。

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校长由当时的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兼任，杨东莼任教育长，实际校务是由教育长全权负责的。杨当时是共产党员，他的工作直接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领导（有时通过周钢鸣联系）。所以，干校的教育训练工作，实际上是党在领导的。干校筹备工作开始时，恰好徐特立老人因公途经桂林，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和生活教育社召集留桂会员，假杨东莼寓处请徐老作了报告。徐老谈了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抗日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区的各种教育活动。杨东莼向徐老请教有关举办短期干部训练班的种种问题，这对于校的筹备工作是一次切实的指导。杨东莼参照解放区干部教育的经验，从办校方针、教学内容、实习活动、读书方法、生活管理、军事训练等方面进行全面革新，把干校办成一个广西抗日民主运动的阵地，等于是在国统区办了一个延安式的“抗大”。当时，全国各地流亡到桂林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有不少人在干校担任教务领导、辅导员或指导员，如秦柳方、刘季平、张海鳌、潘逸耕、姜君辰、周钢鸣、司马文森、汤有雁、宋之光、张健甫、潘超、路伟良、欧希哲、屠天侠、肖敏頔等。另外，胡愈之、夏衍、张志让、张铁生、千家驹、万仲文等，都先后被邀请到干校作专题报告。1939年5月，叶剑英在湖南衡山南岳游击训练班讲课完毕后路过桂林，也应杨东莼的邀请，到干校作了题为《积小胜为大胜》的重要报告。他深刻分析了抗战形势，介绍了各解放区军民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绩，并针对当时的“速胜论”和“悲观论”，生动地讲述了解放区抗日斗争的实际事例，雄辩地阐述了党的抗日持久战的方针、政策。干校自1939年2月开办，到1940年年底结束，为期两年，总共

举办训练班4期，结业学生1402人，还开办了特别训练班。从干校毕业出来的学生，后来有大批人成为共产党员，有的人在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有的人在各条革命战线上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全国解放后担任领导工作，有的人成了国内享有盛名的专家学者。

1940年6月间，国内政治形势开始逆转，已处于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的前夕。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因为政治倾向太明显，受到各方注意，杨东莼被迫向广西当局辞职，广西当局改任他为省政府参议。他花了几个月时间，视察了几个县的县政，回桂林处理好了干校结束和《救亡日报》终刊等事宜。1941年年初“皖南事变”之后，他离开了广西，转赴香港。在香港，他与邹韬奋、范长江、金仲华等组织了全国救国会海外工作委员会，并与邹韬奋一起全力承担会务。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美国在太平洋的海军基地珍珠港，杨东莼和许多著名文化人士一道，在党的保护下，于1942年辗转入川，先后在内迁乐山和成都的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华西大学、鸣圣学院担任教授，1948年8月又转任厦门大学教授。

杨东莼在四川各大学执教7年，正是抗日战争接近胜利的艰苦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转入大反攻，国民党加紧镇压民主运动的时期。他利用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课程的机会，鼓舞学生坚持抗战、迎接胜利的热情，支持进步师生追求民主、反对内战的群众运动，系统地向学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他自始至终全力支持学生的革命活动，在武汉大学时，他为学生的正义斗争提出了许多充满辩证法精神的意见。第一、进步同学生活在学生之中，要广交朋友，不要局限在进步社团的小圈子里面。这样既可以避免过多的突出，受到敌人的注意，也可以影响更多的人，还可以了解各种人物对待各种事件的反响，了解群众的思想情况，在认识形势、分析问题

时，不致于狭隘和片面；第二、进步社团不一定要清一色，可以由左、中和落后的学生组成，但要防止特务分子打进来。这样做，既可争取中间分子，也可以影响落后分子，既避免进步社团过于红，又便于接近群众；第三、进步学生开展革命工作，要尽量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利用同乡、同学，甚至过去的中学同学关系，广泛了解敌情；第四，要注意调查研究；第五，要用学术研究的方式来掩护政治活动；第六、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要适可而止，不要走得太前，只能走到大多数群众能接受的地步，不能脱离群众。总之，“主张不怕硬，方法不怕软，心脏不怕热，头脑不怕冷”。杨东莼的这些意见，对武汉大学学生开展“反内战，争民主”等革命活动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在武汉大学师生“五·四”运动座谈会上，杨东莼在发言中公开主张要继续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两面旗帜，发扬她的光荣传统。杨东莼授课时寓庄于谐，旁征博引，援古例今，议论精当，鞭辟入里，有强烈的鼓动性和极大的说服力，因而室为之塞。他的家里几乎每夜坐满了武大师生，或请益学术，或纵论形势，或商量工作，或研讨斗争。这些活动终不免引起了敌人的警觉，国民党政府重庆行辕派了两个联络参谋，会同乐山的军统特务雷大钧，居然打算搜查杨东莼的住宅。1944年12月22日，蒋介石给国民党中央政府教育部的电令中声称：“据（报）武汉大学法学院政治思想史教授杨东莼，平日言论反动，诋毁本党及政府，并对学生时加煽动。……希注意整顿为要。”此后，杨东莼的教学和社会活动都受到特务们的严密监视。

1948年冬，杨东莼离开厦门大学秘密出走香港。其时，在党领导下的达德学院院长陈其璦北上东北解放区参与筹备全国政协，香港的党组织和各民主党派协商，一致认为，由达德学校校友会聘请杨东莼代理院长最为适宜。他以“明知山有虎，

偏向虎山行”的革命精神，积极负责地办好这所新型的革命大学。香港弹丸之地，政治形势十分险恶复杂，他镇定自若，排除干扰，坚持正常教学秩序，亲自讲授历史课，并作政治形势报告，号召师生做好精神准备，为迎接全国解放，建设新中国而努力。1949年2月23日，港英政府无理下令撤销达德学院注册，强迫停办。在党的领导下，他审慎周详，安置了全院师生，处理了一切善后事宜，转入香港《大公报》任顾问。

1949年10月，第一届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之后，杨东莼被任命为广西大学校长。从1950年初到1953年底，他在广西大学先后进行了解放接管、恢复教学、调整院系、纳入正轨等十分繁重的工作。1954年春，又奉调任华中师范学院第一任院长。他到任后第一次讲话的题旨就是：建设社会主义要靠真才实学。这个原则鞭策着华中师范学院师生，孜孜不倦地为建设社会主义而掌握真正的知识和本领。在华中师范学院，根据分工，杨东莼负责指导历史系的工作。在很短时间内，他就和系内的教师进行了个别谈话，而且谈话前都作过认真准备，对教师的家庭、学历、经历、专长、特点、身体健康状况和眼下遇到的困难，都做到了心中有数。这样的谈话使人感到亲切，没有拘束，而他也就通过这个途径掌握了系内大量的情况。他亲自为学生作治学方法和政治形势报告，使学生们举一反三，大开眼界。校内教授作科学研究报告时，只要得到讯息，他一定赶来参加，认真倾听。难怪以后这所学校的老教师们都有着美好的回忆。杨东莼任职三年多，即1954至1957年，特别是1956年，是华中师范学院形势最好的年代。

杨东莼当过中学教员，也当过大学教授。他办过正规中学、大学、师范专科学校，也主持过短期干部训练学校，他的教育工作经验是很丰富的。大体说来有三：第一，既然说科学和技术是（或者“可以转化为”）第一生产力，而科学技术之

所以能够转化为生产力，科学技术本身之所以能够发展和突破，从根本上说来，除了政治条件和体制规格之外，还必须通过教育这个必由的手段。因此，把眼光放得远大一些，把教育工作摆在重要的战略位置上优先考虑，在全民族中造成一种浓厚的热爱和重视教育的气氛，应是当务之急，不得须臾缓；第二、不管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教育都必须为革命斗争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其最终目的则是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第三、育人必先人育，“国以人兴，功无幸成”，要把教育搞上去，关键在于爱护、培养和不断地发展壮大一支过得硬的师资队伍。

三

杨东莼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杨东莼有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由于特殊国情的决定，在旧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除极少数人依附于反动派以外，绝大多数都处于被压迫的地位，所以他们是爱国的，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前途并为之献智出力的；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群体，更应该是热爱党、热爱国家、热爱社会主义的。至于知识分子世界观的改造，则是一件艰巨的、和风细雨的工作，需要一个长期的历练过程。在这里，一切对知识分子的无端贬抑、侮辱甚至摧残，都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莫大损害。虽然他在《何物自由主义》这本小书和《打渔杀家新解》、《从剪辫子想到的——看老舍〈茶馆〉有感》（载1957年秋《人民日报》第6版）这些杂文中，流露出了一些“左”的情绪，但是，从总体来看，他在行动中确实认真贯彻了自己的基本观点。他拥护毛泽东同志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所规定的方针，认为这是一个必须长期执行的方针，他赞成周总

理1956年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赞成陈毅同志1962年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却不愿苟同那种轻视和伤害知识分子的“左腔左调”和粗暴做法。

对于学有专精、业有专长，但又存在某些缺点的知识分子，杨东莼总是尽力之所能，去做一些据他说是近于“保护”的工作。在政治运动波涛汹涌接踵而至的那段历史时期，他的方法之一就是在运动之前以老朋友的身份去和知识分子谈心吹风，让他们在思想上有所准备，不至于在急风暴雨的批判前惶惑不知所措。对于个别体弱多病的知识分子，杨东莼还用尽心思让他们取得适当机会回避一下。石声汉教授是庚款留英的第一届高材生，专攻生物，为人诚实不欺，敏悟非凡，有学贯中西之誉。可是他不修边幅，懒于世故应酬，耿介直爽几乎到了落落寡合的地步。为了使他在运动中不受伤害，杨东莼千方百计下功夫“保护”他，使他后来在整理我国农学古籍，包括《齐民要术》等名著，做出了特别可贵的贡献。1963年以后开展的某些所谓“学术讨论”，实际上是不讲道理的围攻批判，对此，杨东莼十分反感。报刊上点名批判周谷城、夏衍、孙冶方，他偏偏要在各种场合大谈自己和这些同志过去的共事、交往和评价，隐约地流露出由衷的惋惜与同情，这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十分巧妙的抗议形式。二十年代长沙中学著名英语教员杨笔钧，桃李满天下，政治清白，为人正直，有口皆碑。“马日事变”后曾帮助杨脱险离湘，并曾掩护柳直荀在长沙进行革命活动。杨笔钧81岁时孤身一人在长沙生活，十分困难，杨东莼多方写信陈情，将杨笔钧在湘潭工作的女儿调来长沙伴养老父。程潜的二公子程元曾为此事出了大力，杨在感谢信中提到顾念旧情问题时说：“足下言念旧为不可思议。不思不议，当然不可思议；多思多议，便可思议矣。《老子》想已读过，重读更有好处。”他还经常说：“不念旧恶，在必要的条件下应该如

此做；不念旧情，那就会变成独夫和天下绝物。”向达教授是国内有名的中西交通史专家，1957年反右派斗争时受到了严重冲击，为了“保护”向达，他向有关方面反复介绍向达的专业成就和他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鲜明的政治倾向。原《大公报》负责人王芸生，是杨东莼受命与其联系的对象，他对王芸生关怀备至，也做了许多“保护”工作。经学家马宗霍，从湖南带着可以理解的十分不满的情绪，调至北京中央文史馆当馆员，月支100元，待遇骤降，生活困难。杨东莼设法把他调到中华书局做编辑工作，使他生活安定，发挥了晚年的光和热。语言文字学家黎锦熙居室逼狭，藏书乱积，无法开展研究，杨东莼四出奔走，替他解决了住房问题。哲学家金岳霖重病时得不到应有的照顾，雇板车送医院求治，杨东莼为此大声疾呼。知名爱国人士章士钊，90高龄仍在为《柳文旨要》艰难笔耕，杨东莼尽管不同意《柳文旨要》的基本观点和一些牵强附会的古今类比，但是他认为，这么大年纪了，仍在孜孜孜孜为学术事业献身，难能可贵。因此，他为此书的付梓四处联系，使作者在辞别这个世界之前，终于见到了《柳文旨要》的精致的大字体印刷版本，安慰了老人一颗赤子之心！杨东莼担任中央文史馆秘书长的时候，曾专程从北京到广州看望商衍鎤和陈寅恪两位副馆长。不管是对商老还是对陈老，他都缓慢有力地说：“您老人家好！我是代表章士钊馆长来看望您的。”他和商老谈词林掌故，和陈老谈隋唐历史，滔滔不绝，应付自如，气氛极为融洽。陈寅恪教授抗战中在成都执教时就目疾严重，终至失明，建国后某年在浴室不慎，又跌断髌骨。他在杨东莼坐定后就发牢骚：“我过去左丘失明，现在孙子膑足。”杨东莼立刻飞驰他的词锋作了答复：“膑足是‘莫须有’吧，谁敢对您加以膑足之刑？如果真有这样的人，那他就太胆大妄为了，中央一定会追究的。我觉得您著述中有的考证确是明察秋

毫，并且，您足不出户，知道许多中外大事，您比不少健康的人更健康，这太值得恭喜，值得学习啦！”躺在床上的陈老听后，不禁笑出声来，回敬了一句：“杨先生，我早就耳闻你的辩才，真是名不虚传。”事后，杨东莼语人：“拜访成功，两位老人都很高兴，高兴可以长寿。这样的老人，爱国、正派、有学问，是人瑞兼是国宝，全国已经为数不多啦！”

杨东莼反对欺老凌幼，力主扶老携幼，他对青年知识分子更是热情奖掖扶持，言传身教，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成熟和成长。张劲夫在《怀念孙冶方同志》一文中说：“记得在有一次的约会上（作者按，这里指的是抗战前夕），某一刊物主编人提到要请冶方就某一专题撰稿，杨东莼当即对冶方发表了评价，说冶方治学严谨，不轻易为文，他答应要写的文章，必定认真负责写好，只是时间不能急，因为冶方不仅在构思上要费脑筋，而且在行文上对每一字句都要推敲的。写文章虽慢，但写出的东西，很有份量。我当时年轻学浅，听了这样的评价，留给我的印象和受到的教育都很深，……对当时象我这样的青年来说，帮助是很大的。（杨东莼）帮我们做了许多当时难以做到的事。”1940年6月底，内迁桂林的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强迫近10名进步学生转学，杨东莼设法给这批青年以帮助，亲自写信给当时在粤北的广东省立文理学院院长林砺儒，林将这批学生全部接收了。对于年轻学者来信请益的书稿，他总是认真阅读，密点细圈，丹黄殆遍，以商量的态度，提出中肯的意见。对于年轻人提出来的困难，只要他能办得到的，他都尽力帮助解决。他个人生活清苦，但慷慨解囊，资助进步青年。所以有许多人说：“杨东莼老真是慈航普渡的活菩萨，有求必应。”对于他认为禀赋独厚、勤奋可嘉的青年知识分子，他总是倾注更多的心血浇灌，使之茁壮成长。胡仲达、李佩、章开沅、陈庆华、张高峰、曾敏之、马雍这些同志后来的成就，都有着一份杨

东莼的劳绩。在使天地为之倾斜的特级风暴中，杨东莼自己遭受着严重的迫害。与此同时，许多善良的知识分子遭受摧残，青年知识分子彷徨失措，教育战线呈现一片荒凉破败景象。他忧心忡忡，约同胡愈之和周世钊上书毛主席要求见面。毛主席派人接见了三位同志（作者按，据杨东莼、周世钊告我，接见人为华国锋和吴德^①）。整整两个半天，他们都很诚挚地、也是很沉痛地，对当时全国带有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作了痛切的晋言。胡愈之说的是发挥民主，广开言路；杨东莼说的是青年问题；周世钊说的是教育问题。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1979年“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召开纪念座谈会，此时，这位60年前“五·四”时代的老战士病得很重，距离生命之旅的终点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但他仍然扶病与会，赋诗明志，对青年一代殷殷寄予厚望。由此可见，杨东莼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关注是一贯的，即使身处逆境，也要挺身而出，冒险犯难，为青年一代仗义执言。

杨东莼是一位模范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活动家。他经常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彻底解放自己。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就是在这个理论基石上产生出来的。其目的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最顽固、最反动的一小撮敌人驱赶到最狭窄的地带里去，充分孤立他们，以取得和扩大斗争的胜利。他在这个领域中的劳绩并不是在理论上有什么独创，而是在实践中颇具特色，约而言之，可以归纳为下述四条：

第一条，他提倡广交朋友，这本来是做统一战线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他能凭借历史所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结纳友朋，并且把这个朋友圈子不断扩大。这样，他在各条战线中（包括学术文化界、政界、军界），在各个不同时期中，利用

这些老朋友关系，顺利地工作进行工作，做了很多一般人难于做到的事。

第二条，他总是谦谦焉焉，有仁者风，以平等待人的原则对待统战对象。他最反对某些人那种居高临下，以改造者、教育者自居的奇怪现象。在和党外朋友谈话的时候，他总是聚精会神，回答问题也经过缜密思考。他经常教育做统战工作的年轻干部：“和年纪大的党外朋友谈话，要认真听，不要走神，不要打断人家的思路，随便插话，不要未经同意就掏出笔记本做记录，不是确实憋不住时不要离座解手。这是必要的礼貌。你要人家尊重你，首先你就得尊重人家。”章士钊的骨灰盒从香港运回北京，在机场迎接时，有一位并不很年轻、地位也不算低的干部面露极不严肃之情，杨东莼后来批评这位干部说：“并不要求你啼啼哭哭，但也不能嘻嘻哈哈，这叫做失态，党外朋友看了会产生反感和恶感，甚至会感到寒心的。”

第三条，待人以诚。他总是说，人之相知，贵相交心，你要人家掏出心窝里的话来，你就得讲心里话，不然感情就不可能交流。党外朋友有所请求，铁定有把握的事他就慨然应承，无把握或不应办的事就委婉说明原因，从不轻诺寡信。1947年蒋军攻下延安时，杨东莼向蒋氏阵营中某些人物策反，得到的反应比较冷淡，但他不把门关死，以克制和等待来显示诚意。他对几十个对象发出了空白信，信封上写明自己的通讯处，信封内不着一字，意思是想过来了，以后仍可保持联系。到淮海大战结束，不到10天，他就收到了许多封态度截然转变的回信。针对某些朋友还心存幻想，他就用毛笔写上一句话：“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他用这样的诚恳态度敦促这些朋友弃暗投明，脱离反动阵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第四条，十分强调统战工作人员的学养和素质。他主张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干部，不仅要懂得业务、政策，而且要争取多

懂得一些各类专门知识，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和社会生活知识。在这一方面，他本人确实是符合这个要求的。

四

由于客观原因和个人性格，在56年的漫长时期中，他同党的关系时断时续，但即使在脱离党组织的时候，他的心总是向着党的，而且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49年10月，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单独接见了杨东莼。周总理对他作了八个字的评价：“见多识广，胆小如鼠。”并且说：“现在你应该把红旗插起来啦！从来只有个人找党，没有组织来找个人。”杨东莼受了十分深刻的教育，不无内疚地归告亲友：“周总理说的‘见多识广’，对我是一种鞭策，‘胆小如鼠’则是痛下针砭，是忠言良药。我是一个孤儿出身，我再不能失去政治上的母亲，一定要认真总结教训，积极争取插上红旗。”后来的历史表明，在共和国建立之后的30年中，无论在广西大学、中南师范学院、在国务院副秘书长任内、在中央文史馆、在中国民主促进会和全国政协分管的工作中，他都高举红旗、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而他自己也终于在1961年9月由中共中央统战部焦琦、肖贤法同志介绍，重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在“四人帮”施展淫威的那些邪恶的日子里，杨东莼受到了无情迫害，但这并没有动摇他对党的忠诚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

1966年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全国串连妨碍生产”的正确说法。在这前后，中央文革小组批判了所谓“以生产压革命”。随后，康生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批判了“生产力论”，全国则刮起了批判“唯生产力论”的龙卷风，

一条“只要什么，不要什么”的赤裸裸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甚嚣尘上。杨东莼对此极为反感。他说：“有些人自封‘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左’派，但他们忘记了人要吃饭、生产要发展的起码常识。有人自封为‘金棒子’，我看是一根捣屎棍。”他日以继夜，重新温读了马、恩、列和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气贯长虹的理论魄力，冒着巨大风险，在全国政协的联组学习会上作了一次专题发言。他指出：“所谓‘唯生产力论’，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所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任何依据。经典著作中只是肯定，革命可以在资本——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首先爆发，从来没有批判什么‘唯生产力论’。列宁只讲，政治教育的成果，只有用经济状况的改善来衡量。毛泽东同志说得更明确：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无端批判一个捏造的‘唯生产力论’，可能在一时打倒‘政治上的敌人’，但永远不能打倒‘敌人的政治’。”这些话说得多么深刻，多么策略！在七十年代中国政治舞台上正义、邪恶两派力量尖锐交锋之际，发出这种破石惊天之论，又需要多么大的革命勇气，多么大的逻辑力量！但是有的人竟把他的论点当作错误来批判，把是非完全弄颠倒了。

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在选举的头一天晚上，主席团成员得到了候选人名单，王芸生发现周恩来依然继任总理，激动得无法入睡。深夜，他跑到杨东莼屋里，两人抱头痛哭。以后他二人的心相通了，经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后来得知毛主席严厉批评了江青，他们知道国家得救了，兴奋得手舞足蹈起来。

1975年暮冬至1976年岁首，在“四人帮”行将覆灭前夕，这伙政治野心家假借和歪曲毛泽东的意向，掀起了一股拔地而

起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的领导交代，要身为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的杨东莼在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发言。杨写了发言稿去找薛暮桥商量。薛说：“你最好不发言，要发言就应付几句算了，何必写这样长的稿子？”杨说：“不行，领导上一定要我表态，不得不说几句违心之言。”薛看到杨东莼的发言稿字斟句酌，也就表示同意。不料因此引起一场风波，在他发言后受到一批“风派”人物的围攻，说他“假批判，真包庇”。杨东莼被攻击得精神有些失常了。大约就在这个期间，他写了许多诗，在那些诗中，有一首引《贤文》“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为序，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早知不合人间味，多买胭脂画牡丹。”他把诗寄给张毕来先生，张先生写了两首答诗，这就引起了杨东莼一首很妙的诗：“我本人间一蠢才，多口多舌为何来？只因敢说又敢想，管它祸灾不祸灾。”

大约在1975年的国庆前夕，杨东莼给张毕来写了一封信，信中步张诗原韵，和了一首：“人之所贵在自知，奈何出口不入时！甘作绿叶一小片，牡丹尽管涂胭脂。人老难抛赤子心，要凭辩证理纠纷，相争每到不下处，总有贤明解知音。”兴之所至，难以停笔，又口占绝句二首：“自愧平生一无长，书在手边辄浅尝；香花毒草各有趣，悟到真谛喜欲狂。五十年来走四方，处处为人打杂忙，甘草一味价贱贱，汤头歌诀不能忘。”

十年动乱期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知识分子最感痛苦的是精神折磨，欲不言而又言，欲言而又不言，杨东莼只是千万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而已！

1976年，周恩来同志逝世，杨东莼在写给程元的信中说：“周总理逝世，举国悲恸，史无前例，弟等叨在属下，心情实在难安。”这封信表达了他对周恩来同志的深刻沉挚的爱。就在同年的六、七月间，杨东莼和笔者在北京中央文史馆简陋的办公室里进行过三次谈话。这时，他的神智比较清醒，但“四·五

风暴”刚刚过去，很明显，他的压抑悲愤情绪是很浓烈的。每次长谈，他都长哭，额头、双颊布满了冰刀霜剑的皱纹和岁月年轮的疤痕，略显呆滞的眼角噙着晶晶闪光的泪珠。他说了如下一些论点：

——“形势令人揪心，我追随革命50多年，从来没有看见过现在这样的局面，我无法自处！偌大一个北京，我的朋友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够倾吐心曲的，仅得王芸生一人。其余的朋友不是不可信赖，但大家都有点互相戒备。《罗织经》念到这个程度，真是旷古奇闻。”

——“总理一柱擎天，力撑危局，功在万世。他不是病死的，他是累死的，他是气死的，他是受迫害致死的。他的逝世，使我进一步领会了‘虽万人莫赎’这句古语的悲哀的内涵。”

——“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这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一伙政治骗子窃踞高位，利用歪曲杜撰历史的卑鄙手法，来打击坚持革命原则的同志，这是给我们伟大的民族抹黑。”

——“‘四·五风暴’这桩公案要靠党和人民来做结论。”

——“一个比你年轻的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人，居然成了毛泽东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群小包围，整个格局都打乱了！前路茫茫，十分凶险。但事物总有一个极限，过了极限，事物就会走向反面，而且时间是会极快的。”

——“批邓反右，我被迫作了一次违心的表态发言，影响极坏。我一辈子在政治上有弱点，在浪尖风口，我胆小畏缩，出现三次脱党现象。三十年代‘七君子’被释放后，邹韬奋责备过我，开国后周总理批评过我，我心悦诚服，我力争在实践中克服自己的弱点。但是，在我行将就木之前，居然在政治上如此‘失言’，这是我永远不能宽恕自己的。李维汉同志说我是一个老革命，又是一个新党员，他的话不幸言中了，我怎么向周

总理，向老朋友、老同志交代呢？”（他在三次讲话中都复述了这段话的内容，足见他思想斗争激烈的程度，痛苦的深度。他一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老泪潸潸，不能自己。其实，这只是他自我解剖精神的可贵表现，他的违心的表态发言，是早已得到党和人们谅解的。）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杨东莼欢欣鼓舞，他看到了党的希望，人民的希望。很不幸，厌疾（肾脏综合症）苦苦纠缠着他，剧烈的思想斗争折磨着他，他全身浮肿，易于激动，被迫长期住院。从“四人帮”倒台到杨东莼辞世，整整三年，他一直住在医院里接受治疗，但仍然振作精神，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在他预感到即离开尘世的时刻，他写下了遗嘱：我死之后，一、不要搞遗体告别；二、不要开追悼会；三、不要留骨灰。杨东莼是开国以后提出“三不要”的第一人。这“三不要”的遗嘱，体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信仰，反映了一个战士的真知灼见和优美情操。

1979年9月25日，在北京，杨东莼的生命河床干涸，他在生命的终点写上了一个句号。

肖敏颂与湖南民盟

李 莹*

肖敏颂是湖南民盟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从1949年1月湖南民盟组织成立，到1957年4月7日病逝，一直担任民盟省级组织的主任委员。他以其优良的品格、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在盟员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许多老盟员至今仍在深深地怀念他。我与敏颂是老同事，战友情深，殁其早逝，爰草此文，以为纪念。

敏颂和夫人曹国智在青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两人都是“一二·九”学生救亡运动的领导骨干。敏颂曾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部组织部长、北平学生联合会执行委员和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宣传部部长。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由北京大学毕业回到长沙，在地下党省委领导下从事抗日宣传工作，创办并主编《前进》半月刊，编辑《中苏》半月刊，并为《新湖南》、《观察日报》等报刊撰稿，同时参加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活动，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的工作。当时我也在湖南做党的秘密工作，与敏颂没有见过面，但读过他的文章，对他的才华甚为敬佩。1939年敏颂应杨东莼之邀，到桂林广西地

*李莹，湖南民盟创始人之一。原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文史委副主任，现已离休。

方建设干部学校任教。这所学校是广西地方当局为培养基层干部而设立的，杨东莼任教育长，教员多为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如叶剑英、胡愈之、夏衍、张铁生、千家驹等，都先后被邀请到该校作过专题报告。敏颂担任《抗战形势讲话》，宣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分析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阐明抗战必胜的道理，对学生影响较大。在桂林，敏颂还和杨东莼、陈此生（在广西颇有声望的一位民主人士）等一道参加救国会的活动。1941年，敏颂到香港，继续参加救国会的活动，结识了更多的文化界进步人士。1942年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敏颂经东江游击区回到湖南，旋即应陈此生之邀去桂林女中任教务主任。1943年，日寇南进。翌年长沙失守，桂林动摇，敏颂应杨江（即路伟良，时任贺县中学校长）之邀，到贺县中学任教。与贺县邻近的八步（现为贺县县治）为平乐专区所在地，是桂东的政治文化中心，当时成为进步文化界人士活动的一个基地。何香凝、李济琰、陈绍先、梁漱溟、陈此生、张铁生、千家驹、欧阳予倩等先后来到这里。1944年，狄超白由重庆来，带来周恩来的指示和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负责人给李济琰、梁漱溟的信，委托他们筹建民盟东南总支部。梁漱溟、陈此生旋即来到贺县邀敏颂参加民盟，敏颂就成为民盟的一员，并被推为民盟广西支部的执行委员。不久民盟东南总支部成立，梁漱溟负总责，陈此生、徐寅初负责组织工作，张铁生、千家驹、莫乃群、欧阳予倩和敏颂负责宣传工作，活动范围包括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湖北、云南、贵州等省和东南亚等地。民盟活动总的原则是“工作公开，组织秘密”，全国解放前一直如此。民盟东南总支部成立后，在八步临江中学举办了“民主讲座”，宣讲抗战和民主，敏颂是主讲人之一。他还负责编辑《民宪》月刊，通过民盟组织发行，在知识界颇有影响。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民盟东南总支部迁往香港，改称南方总支部。敏颂也在这年年底到了香港，继续从事盟务活动和文化工作。他在香港期间，针对国民党当局制造的要中共先交出军队才允许它合法存在的反动舆论，写了一篇题为《论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长篇政论，加以驳斥，文章在几个报刊上发表，后来还出了单行本，在当时社会上有较大的影响。我在内地读了这篇文章，深佩其立论精辟，有说服力。

1946年春，敏颂由香港回到湖南，与傅白芦等同志创办《人民世纪》周刊，揭露美蒋勾结挑起内战的阴谋，抨击国民党政权的暴政和腐败，报道、支持各地群众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不久又应《新潮日报》社长黄定戎之邀，兼任该报主笔，每周写社论两篇，宣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1949年夏，黄定戎、张梓敬、余志宏、刘禄铨等创办《新时代》周刊，宣传革命形势和进步思想，敏颂经常为之写稿。该刊虽只出了23期即被迫停刊，但吸引了一大批进步知识分子，为后来民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这期间，敏颂还应明德中学老师鄧干于之聘，出任行素中学教务主任，随后又任湖南大学副教授，讲授《政治学》和《比较宪法》。

在1946年春敏颂离港回湘时，民盟南方总支部就委托他考察湖南情势，相机发展民盟组织，因时机不成熟，未能开展活动。此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形势越来越严峻。民盟总部两次迁移，由重庆而南京而香港，并于1948年初在香港召开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与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随后又明确提出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的新的政治路线。在这期间，总部曾先后委派几位早期入盟的同志回湘筹建民盟组织，都没有成功。1948年敏颂与

中共地下党南方局长沙特别支部取得联系，在特支领导下，以文化教育界为重点，开展民主进步运动。12月，敏颂邀集余志宏、刘禄铨（二人都是中共党员）、张梓敬在他家叙谈，大家分析形势，认为建立民盟组织、配合地下党开展工作的条件已经成熟，当即由敏颂致函民盟总部，推刘禄铨前往香港联系。刘到香港会见了民盟总部负责人周新民、李相符，带回了总部的回信，委托敏颂负责在湖南建立民盟组织。1949年1月成立民盟湖南省支部筹委会，敏颂任主任委员，刘禄铨负责秘书工作，张梓敬负责组织工作，余志宏负责宣传工作。不久，由广州回来的杨伯峻（交叉党员），由贵阳回来的李鳌，也由民盟总部介绍与湖南组织取得了联系，并应邀参加了筹委会。旋因余志宏、刘禄铨党内另有任务，筹委会改由张梓敬负责秘书工作，李鳌负责组织工作，杨伯峻负责宣传工作。同年2月奉总部指示，筹委会改称执行委员会，并先后吸收杜迈之、杨荣国、谭丕模三位参加。到1950年2月，执行委员会又奉令改称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也有增加，王学膺、王西彦、陶重周、康德、蓝肇祺、董每戡、戴德嵩都被吸收进来。

湖南民盟组织是在盟的一届三中全会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建立起来的，领导成员中有交叉的共产党员，有与党有长期的历史渊源、一直跟党走同志，其余的也都是进步分子，这就保证了盟组织能较好地接受党的领导，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以后经过多次改选换届，都能保持这个优良传统。

三

湖南建盟之际，主要任务是发展盟员，建立组织，为开展活动打下组织基础。当时发展组织工作是遵照民盟总部1949年2月《对当前发展组织的决议》进行的。该《决议》规定发展对象，“主要应向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学生、教师、自

由职业者、中小公务员，放手吸收他们中的进步分子到组织里来，以扩大本盟的组织基础。”；“特别应积极争取进步的坚决的革命知识分子为本盟的骨干”。另有一个提法，就是“以中下层为主”，初无地域的限制。据这个精神，适应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要求，湖南民盟在半年多的时间内，发展盟员达500余人，在十几个市县建立了组织。湖南和平解放后，根据盟总部和中共湖南省委统战部的指示，盟省执委会对全省盟组织进行了一次整顿，撤销了一批小县的组织。到五十年代，盟中央确定以“大中城市为主、中上层为主、文教界为主（高教为重点）”新的组织路线。据此，湖南盟组织在1953年至1957年这段时间内有了新的发展，大批高级知识分子被吸收入盟，使民盟的作用得以更好地发挥。

民盟组织建立之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性胜利的前夕。在这个形势下，盟组织的中心任务，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按照党的战略部署，发动盟员和所联系的群众，打击、孤立敌人，壮大革命力量，迎接湖南解放。

在这期间，盟省支部执委会在中共省工委领导下，动员各级盟的组织 and 广大盟员，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一、宣传、组织群众。主要是翻印传播毛主席著作，如《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运用座谈会、读书会、民众夜校及歌咏队等形式对群众进行革命的启蒙教育；组织各种“协会”、“学会”开展活动，以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组织性；支持与民盟有密切关系的《晚晚报》，开展合法的舆论宣传。二、开展学生运动。以设在宁乡乡村的民国大学搞得最为轰轰烈烈。该校没有地下党的组织，学运主要是由盟组织领导的，从“倒鲁”（校长鲁荡平，是国民党CC分子）运动发展到护校保产运动，使该校财产得以全部保存下来，解放后移交湖南大学。湘潭简易师范的

学生运动也搞得有声有色。三、进行统战策反工作，支援地方武装。民盟曾通过盟员的关系，配合地下党对国民党军政人员如第一兵团副参谋长陈庚、全省保安副司令王劲修、衡阳警备司令欧冠等进行了工作，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当得知驻在安化的国民党军某补充团李致中等准备起义而找不到党的领导时，民盟曾受地下党的委托派盟员前往协助。对姜亚勋领导的湘中游击队，民盟也在物资方面给予了支援。四、开展护厂、护产、反破坏、反迁移的斗争。在临近解放时，遵照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盟组织把这项工作作为主要任务。在省公路局、第一监狱、衡阳电讯局和电厂等单位，都做出了值得称道的成绩。五、广泛调查、收集国民党党政军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情况资料，以备接管。收集的资料很多，其中不少资料对接管工作的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六、筹办《民主报》。该报于长沙解放的当天——1949年8月5日出刊，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稳定工商界，团结知识分子，支援前线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先天不足，资金缺乏，出版不到一年，就自动停刊了。湖南民盟组织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做了上述一些工作，对湖南和平解放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当时全体盟员都以高昂的政治热情和忘我的革命精神，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而投入火热的斗争，此情此景，许多同志至今仍记忆犹新。

解放初期，民盟省委部已由地下活动转为公开活动，但是没有房屋，没有经费。当时百废待兴，工作繁忙，中共省委也无暇顾及帮助我们解决问题。我们是通过盟员陶重周、叶克强的关系，先后在民主西街惜阴书舍和湘春街安庄借用了几间房子，调了一两个干部，雇一个工人，在那里开始办公。民主报社每月给我们拨几担米，供几个脱产的同志开餐之用（民主报社的资金主要是蓝肇祺捐助和募捐来的，工作人员也只有饭吃）。敏頌、梓敬和我每天都在这里工作，一同过了几个月相

当艰苦的生活，但是大家都不以为苦。

四

敏颂作为湖南民盟的主要负责人和文化教育界的代表人物，除了主持盟务以外，还以较多的精力进行社会活动和上层工作。他参加了1948年11月19日桃子湖方叔章家（方是程潜的老朋友，与地下党有联系）的座谈宴会。那是地下党省工委授意方老安排的一次政治性聚会，目的是利用座谈时事，启发程潜的几个亲信幕僚——主要是肖作霖、邓介松两人，通过他们对程施加影响，促其起义。应邀参加的有湖大教授李达、伍麓农、肖敏颂，程潜方面的肖作霖、邓介松、程星龄，地下党的余志宏等人。按照事先的安排，李达在座谈会上作了主要发言，中心意思是：人民革命战争即将取得完全胜利，国民党政权很快就要垮台，在这个形势下，湖南怎么办？程颂公应该替湖南人民想一想，也要替自己想一想。暗示只有靠拢共产党，投向人民，才是唯一明智的选择。其他的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肖作霖、邓介松认同了大家的意见，回去向程潜作了汇报，并进行了劝说。这次活动对于推动程潜起义起了重要的作用。敏颂还经常同政界、文化教育界的一些上层人士保持接触，对他们进行工作，将他们的动态和意见及时向党反映，并给我们透露一些有关时局的重要消息。长沙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省、市工委领导下，成立了长沙市各界迎接解放联合会（简称“迎解联”），由刘嘏波、曹国枢负责，为保护人民财产，维持社会秩序，协助接管，支援前线，做了大量的工作。敏颂代表民盟参加了“迎解联”的工作。8月5日傍晚人民解放军138师进入长沙，6日晚上中共代表团入城，敏颂和“迎解联”主席团的同志都曾到东屯渡迎接。

敏颂主持湖南盟务期间，不只是主持盟的会议发表一些重

要的意见，对日常工作进行指导，还和我们一道做些具体工作。如1955年盟省委召开的高教座谈会上的报告，主要部分就是他亲自起草的。他思想敏锐，分析能力和记忆力都很强，善于吸收不同的意见。每次开会，他总是半垂着头，默默地倾听着别人的发言，不作笔记，而能在最后作总结时把大家的意见很好地归纳起来，然后说出自己的意见，为大家所接受。这点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即使是反对过他的人，也能加以团结。在他任主委期间，湖南民盟是团结得比较好的。这个好的传统，在他以后的几届省委会内，得以继续保持和发扬。

人民政权建立以后，参政议政成了敏颂政治活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他先后被选为第一、二届全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和协商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省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他在各种会议上，都以认真负责的态度，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他还担任过长沙市文教局局长和省教育厅副厅长、厅长，为湖南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

敏颂多次参加了民盟中央的会议。1949年11月中旬，民盟总部临时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一届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实际是一次全国代表会议，通知湖南去3个代表。省支部决定由敏颂、杜迈之和我3人出席。我们先到武汉，和武汉市支部的两位同志会合。因京广路尚未修复通车，我们乘长江轮到南京，改乘津浦路经天津转往北京。当时北京还没有多的宾馆，也由于经费的限制，外地代表都被安排住在东四魏家胡同北京市支部院内。这次会议是建国后民盟举行的第一次全国性会议。当时盟内思想颇不一致，部分同志对1947年11月宣布民盟

总部解散（尽管是被迫的）一事有意见，要追究责任，盟内团结一时成了问题。为此，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全体代表时讲了《古城会》的故事，说关羽在曹营呆了一段时间，张飞要考验考验他是可以理解的，但兄弟之间终究是要团结的；勉励大家运用“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增强团结。周总理在中央统战部举行的招待会上作了长达3个小时的讲话，从民盟的历史讲到当前的任务和团结的必要，语重心长，感人肺腑。听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讲话，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全盟——首先是盟中央终于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了。这次会议有一个重要议程，就是修改盟章。敏颂和我被指定参加盟章修改小组，并受托执笔起草。我们参照党章搞了一个初稿，除了总纲和一些组织名称以外，几乎和党章没有两样。盟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和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同志看了，都说这样不行，民盟组织应该有自己的特点，应该更宽松一些。于是又推倒重搞，几易其稿，最后得以通过。这件事反映了我们政治上的不成熟和对民盟的性质、任务缺乏真正的了解。会议最后一个议程是增选中央委员。主席团最初分配湖南两个名额，我们一致提了敏颂和杨荣国；后来又给湖南增加一个名额，我们经过商量，提了杜迈之。选举结果，肖、杨当选中央委员，杜当选侯补中央委员。会议开了36天，恐怕是民盟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会议期间，适逢斯大林70寿辰，全体代表都应邀到苏联大使馆参加祝寿酒会。那天敏颂兴致特高，喝了好几杯酒，吃了不少冷菜，还笑着对我和迈之说：“今天斯大林大元帅寿诞，我们大家都要多喝几杯啊！”

敏颂当选民盟中委以后，每年都要晋京出席中央全会或中央召开的全国性会议。1957年3月27日，民盟中央召开全国工作会议，敏颂、迈之和我还有盟省委的几位同志都参加了。敏颂先期到京，列席中共中央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和全国政协

议。我们在和平宾馆住处谈了很多，谈了对毛主席在宣传工作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体会，谈了今后湖南的盟务，他的积极性很高，表示回去以后要把盟的工作搞得更好。会议尚未开完，他就发病了，患的是急性脑炎，情况甚为严重。我们几个人商量并征得他本人的同意，让他与程潜一行同车先期回长就医。4月3日，我们送他上车，不料竟成永别！他在车上病势继续加重，次日抵达长沙，一下车就直接送入医院，全力抢救无效，于7日与世长辞。长沙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葬礼，遗体安葬在岳麓山腰。出殡时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一直送到湘江轮渡码头。我和迈之继续留在北京开会，噩耗传来，悲痛至极。我们虽列名于治丧委员会，而未能参加葬礼，至今引为遗憾。

六

敏颂逝世时年仅43岁，正当大有作为之时。他的早逝，对民盟和党都是一个重大的损失。他虽然较早就失掉了党的关系，但始终追随着党，尽心竭力为党工作，在文化教育和统一战线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在他的墓碑上镌刻着中共湖南省委如下的挽词：“为了祖国的民主和自由，为了社会主义事业，你曾热情工作，有很多贡献。正当盛年有为之时，你却长逝，使我们深感沉痛的损失！”这是党对他做出的恰当的结论。在广大的社会人士心目中，他既是一个优秀的文化教育工作者，又是一位出色的政治活动家。在盟内，他是一位深受爱戴的领导者，也是党的一位诚挚的诤友。但是人们对他的误解也是有的。1956年冬至1957年春，民盟在学习、贯彻党中央有关统一战线和知识分子政策时，盟的基层组织反映了下面的许多问题，在一次盟省委的会议上，听了干

部的汇报，敏颂在总结发言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下面有些党员干部不按党的政策办事，存在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歧视民主党派和非党同志，甚至违法乱纪，打击报复，有些问题确实相当严重，遇到这种情况，我们要敢争、敢顶、敢碰。这本是从爱护党的立场出发，作为党的诤友应当采取的态度，也是“互相监督”题中应有之义。可是在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反右扩大化的形势下，竟被认为是反党的“右派”言行，并说盟内有一个“争、顶、碰右派集团”。敏颂因已去世而幸免于难，杜迈之则成了“右派大头目”。我因支持过敏颂的意见，也被认定为这个“右派集团”的重要成员，虽然没有给我戴上“右派”帽子，却也吃了一些苦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扩大化”的纠正，这个问题早已不存在了，但是非始终没有弄清楚。作为敏颂的战友和当时民盟的负责人之一，我认为仍有必要在这里说它几句，以澄清历史是非。

七

敏颂虽出身剥削阶级家庭，但从大学毕业以后，就一直自食其力。八年抗战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颠沛流离，靠着夫妻二人微薄的教书所得，养活一家数口，生活的艰困，自不待说。解放以后，虽然安定下来，但收入仍很菲薄，家庭负担又重，生活依然十分清苦，每日粗茶淡饭，桌上少有荤食。有时我们去他家商谈工作，到了吃饭的时候，不能不留我们吃饭，也只有添上一盘腌鱼或香干炒肉，就算是待客的佳肴了。他经常穿的是一套旧西服或中山服，冬天就加上一件褪了色的粗呢大衣，去北京开会也是这套服装，从未见他穿过一件新衣。他每次到民盟机关来或外出参加社会活动，照例都是步行。他真正做到安贫若素，廉洁自律。这大概也是他的书生本色吧。

他和国智以志趣相投而结合，20多年历经风雨，感情弥

笃，堪称楷模。1956年在国智41岁生日时，他赠国智七律一首，诗云：

定情往事记缠绵，弹指光阴二十年，
历劫死生同命鸟，相倚形影并头莲。
自惭荏弱书生质，多谢殷勤爱侣贤，
今日捧觞为君寿，花枝长好月长圆。

这首诗是他们两人纯真爱情的写照，由书法家周昭怡书写，至今悬挂在国智的书房里，成为永久的纪念。

他们对子女教育有方，要求甚严。子女长大成人，四人中有三个共产党员，都能继承父亲遗志，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贡献。

敏颂走过的道路，是旧中国许多革命知识分子所走的道路。他虽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但留下的精神遗产是十分丰富的，值得我们很好地继承和弘扬。

在结束这篇短文时，我也试作了一首小诗，以表达对老友的怀念之情：

风雨同舟忆昔年，主盟八载绩斐然。
文章斥敌笔如剑，杏坛育英花竞妍。
霜雪凌身气犹壮，丹心向党志弥坚。
神州今日添风采，应慰英魂在九泉。

记“南药专家”周庆年

黎树杞

1991年7月，在迷人的西双版纳，我们荣幸地见到了全国著名的“南药专家”周庆年，和他无拘无束地谈了很多往事。

周庆年系湖南望城县人，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云南分所所长、研究员。他为祖国的“南药”事业，披荆斩棘、呕心沥血，无私奉献了30多个春秋。

周庆年走过的道路既有欢乐，也有艰辛。1955年，周庆年从湖南农学院毕业后，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的前身中央卫生学系工作。血气方刚的周庆年热爱自己的专业，对发展祖国药用植物事业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几次打报告、提方案，建议在杭州建立药用植物栽培试验场，进行将南方的药用植物引种到北方，北方药用植物引种到南方的试验。周庆年的建议得到了领导的支持。1958年，上级派他到杭州龙驹坞建立药物试验场。从此，他踏上了一条荆棘丛生，但又充满希望的路。

1959年，鉴于国内每年要花好些外汇进口南药，而国内许多地方种南药又有优越的自然条件，却没有得到开发利用。于是国家决定在广东的海南和云南的西双版纳建立药用植物试验站。独具慧眼的中央卫生院沈其震先生早就看中了周庆年这位有胆有识、有志气有抱负的青年科研人员，一封电报就把他从杭州调回北京，派他到西双版纳建站。周庆年二话没说，打起背包就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艰难而又光荣的事业撞击着年轻的周庆年的心扉，他决心有所作为。

北京到西双版纳有8000里之遥，从昆明到西双版纳亦有700多公里。公路穿过横断山脉，一路峰峦叠嶂，河谷湍流纵横，公路盘旋起伏，要颠簸三天才能从昆明到达西双版纳。

西双版纳被称为祖国南疆的绿宝石，那里气候湿热，夏天酷暑，全年无冬寒，且地形复杂，形成多种小气候，适宜于种植各种各样热带、亚热带植物。初到这里，周庆年就深深地爱上了这块宝地，他暗下决心，要用毕生精力，为药用植物研究贡献力量。

当时，西双版纳的景洪还是个只有一条砾石铺成的大街。划归药用植物试验站使用的600多亩地，就在允景洪的西南头。这是一片棘竹杂木丛生的荒地。周庆年和20多名工人、科技人员就地取材，盖起几间茅房作为栖身之地，使用最原始的工具——砍刀、锄头、铁锹和一辆手推车，慢慢地把这块处女地开垦了出来，撒下了南药的种子。周庆年和大家一起挑水、施肥，侍弄初生的幼苗。

为使病菌不被野兽和牲畜践踏，他带领工人、技术员，到澜沧江上游砍竹放筏，运回大量竹子，将600亩实验地围起了栅栏。

在没有设备，没有实验室的情况下，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和云南省卫生厅合办的景洪药物试验站就这样红红火火地创建起来了。按照卫生部的计划，还准备在这个站扩大药材种植面积10000亩，建立起一个包括培育种子和加工在内的大型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美好的远景规划鼓舞着周庆年，他下定决心要用毕生精力从事这项事业。

在困难条件下，周庆年和他的亲密战友巫金华（五十年代北农大毕业生），带领大家千方百计地开展多项研究工作。自

1959年以来，该试验站先后引进了阳春砂仁、白豆蔻、儿茶、槟榔、印度马钱、檀香、益智、泰国大枫子、沉香、胖大海、乳香、清化肉桂、锡兰肉桂、广西肉桂、越南安息香、巴天戟、诃子、苏木、金鸡纳、洋苏木等几十种药用植物。推广生产的有阳春砂仁、白豆蔻、儿茶、槟榔、益智、檀香、苏木、肉桂等名贵南药，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

1983年，试验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时的卫生部长崔月牵到试验站视察，高度赞扬试验站工人、科研人员长期扎根边疆，立志为西双版纳建设和发展我国南药事业的献身精神。部、院领导决定成立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将该站改建为一个分所，全称是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资源开发研究所云南分所，请周庆年担任所长。卫生部医科院拨来专款，在研究所内修建一个栽有1300余种药用植物的标本园，还盖了八套新宿舍和一个宽敞的食堂。1986年，又拨专款新建了2000平方米的科研楼，400平方米的实验药厂和八套职工宿舍。至此，科研、生活条件得到较大的改善。现已成立了栽培研究室、药用植物资源室和药用植物化学研究室，配有相应的仪器设备。人员增到79人，其中科研人员30余人。现已形成一个学科、专业比较配套的南药研究开发基地，有利于南药资源的开发，民族医药的挖掘整理、利用。

早在1964年，周庆年就与所内科技人员到景洪县基诺族聚居的基诺山进行阳春砂仁的种植试验。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和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生产方针的影响，六十年代末基诺山的砂仁处于小面积种植阶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西双版纳州政府在调整全州生产方针的基础上，决定把基诺区列为热带山区综合开发利用试验示范区。周老亲自带领科技人员与有关单位协作，组织科技上山，扶贫致富，走科研与生产相结合的道路，在基诺山上推

广阳春砂仁并进行丰产试验。基诺山土地肥沃，雨量充沛，昆虫媒介多，是发展砂仁生产的好地方。可这里的群众一开始却对种砂仁不感兴趣，甚至有的说：“我们要吃饭需要种粮，你们种药就去吃药”。在县政府的支持和有关部门配合下，在刺桐新寨曼飘生产队、曼雅大队设点推广砂仁生产。经耐心宣传，实地参观，激发了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基诺山砂仁生产搞起来了。周庆年和科技人员经常出没在深山密林之中，顶着蚂蝗、蚊虫的叮咬，踏着泥泞的小路，勘察选择种植砂仁的宜植地，向当地农民传授种植砂仁的技术。

基诺族是一个从原始社会末期跨世纪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的少数民族，旧的一套耕作制度——刀耕火种一直没有被淘汰，致使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期的60%下降到现在的40%。加之长期以来受左的路线影响，生产发展缓慢，1973年人均收入仅95.6元。自从发展砂仁后，群众生活逐步得到改善，现在全区7个乡45个村，村村户户都种上了砂仁。到1986年，全区砂仁种植面积达9327亩，采摘面积5300亩，产量达17万斤，亩产32斤，15亩试验田平均亩产最高达104斤，超全国单产纪录。收入238万斤，人均250元。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七十年代全区农业收入的两倍多。1986年全区人均总收入达577元，人均粮食1000斤以上，实现了粮、药双丰收。

新司土乡建乡时只有几千元的家底，发展砂仁生产后，全乡经济状况有了显著变化，率先种植砂仁的新司土巴飘村，1986年全村种砂仁639亩，人均2.2亩，收入123300元，人均收入570元。全村41户，达5000元以上的有4户，有的年收入达万元以上。

发展药材生产，给基诺族人民创造了财富，带来了幸福。过去基诺族许多人穷得连食盐、火柴都买不起，而现在不仅丰衣足食，而且还有存款。基诺山面貌亦发生了巨变，全区45

个村，有35个村架设了自来水管，28个村通了电，盖新瓦房的有210家，农户普遍用上了自行车、缝纫机、收音机、收录机和手表等，电视机、洗衣机等高档商品已开始进入基诺农民的家庭。

1985至1986两年，周老领导他所在单位科技人员与有关单位协作，在中缅边境的勐腊县麻木树区坝河乡佤族聚居的偏僻山区秀花村和傣族山寨累村开辟白豆蔻商品基地。曾几次亲自实地勘察和送苗到现场作种植安排和技术指导。坝河乡土地资源丰富，气候条件适宜白豆蔻生长，是发展白豆蔻生产的好地方。但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文化落后，居住在这里的佤族人民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白豆蔻商品基地的开辟，使当地群众看到了发展白豆蔻致富的希望。

1987年3月，周老带领州政协巡回医疗队去勐海布朗山巡回医疗和资源考察，发现布朗山条件很好，可发展橡胶、茶叶、亩药、水果香料等热带、亚热带经济作物。由于过去多种经营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布朗山的群众都很穷，因此提出了开发布朗山的建议，得到州政协的同意和支持，并向州委作了汇报。州委当即决定以布朗山为继基诺山之后的第二个贫困山区进行开发。周老亲自带领药物分析的领导班子、科技人员与有关单位配合到布朗山现场考察论证，与区政府领导共同规划，以阳春砂仁为起步产业，帮助他们选择了宜植地，并为区乡干部和专业户举办了砂仁栽培培训班，亲自带领他们到基诺山参观学习，并于当年6月在布朗山种植砂仁150亩。与此同时，州委、州政府组织有关部委办局和勐海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到布朗山进行现场办公，研究布朗山的开发问题，落实了开发方案。只要州县政府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布朗山会很快富裕起来的。

为了使边疆少数民族脱贫致富，周老想方设法，多次向上级领导反映情况，争取经费。1987年落实了在景洪县勐旺区发

展砂仁2000亩的星火计划，落实了在勐腊县勐伴区等地发展白豆蔻500亩的星火计划。这些地方在三年后可收到明显的经济效益。

为了尽快解决发展白豆蔻生产种苗不足的问题，在景洪县曼听培养了岩校为白豆蔻育苗专业户，经两年的培训和现场辅导，已为发展白豆蔻种植户提供大量种苗，获两万余元的收入。

对科技上山，使山区人民脱贫致富，周老深有体会和感触。他说：“民族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发展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不断巩固新型的民族关系，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根本出路在于提高本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挥本地区的优势，耐心诚恳的传授科学技术，使少数民族尽快的富裕起来，才能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之间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的新型民族关系。”

周庆年同志在南疆边陲，33年如一日，风里来，雨里去，踏遍基诺族、布朗族和傣族地区的深山老林，攀登绝壁悬岩，跨越急流恶水，风餐露宿，与那里的兄弟民族同甘共苦，顽强拼搏，从而赢得“南药事业”的大发展，为兄弟民族脱贫致富，立下汗马功劳。

周老是州政协副主席，全国先进医卫工作者和模范。1990年冬，江泽民总书记亲切接见了。这位“南药专家”的美名誉满南疆和全国。

南京监狱见闻录

徐君虎*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1927年秋“宁汉合流”之后，我军驻在安庆，军长陈嘉祐逗留上海，外间谣言纷起，人心惶惑。我决心去上海一趟。途经南京，夜宿十三军驻京办事处。拂晓前，宪兵“惠临”，以“共党嫌疑”将我带走。听说是留俄同学康泽昨日在街上看见我，跟踪探明住址而“照顾”我的。

先押在江宁县看守所，设备简陋，夜滚稻草，吃的是红薯杂粮饭。坐卧数天后解军事委员会看守所，加上脚镣。一位先我而来的《九江日报》编辑余独醒，要我拿两块钱给他，他向看守耳语几句，那看守走进来将我脚上铁镣圈子放大了，可以取下。这是狱卒的权利，也是他生财之道。

情况严重了！转押到老虎桥模范监狱（后来陈独秀，汉奸陈公博、周佛海都在此关过），单独住一间房，真是铁窗风味。不许我通讯，不许我会见亲友，但我衣前胸挂的红边符号还未扯去。一位年轻的看守刘诚君（山东人），见我年少当上将官，深表敬爱之意，主动为我对外秘密送信，于是中央大学同乡李卓凡先生处成为我的联络站。我从他传递进来的消息中获悉，案发之日，十三军办事处周俊德主任，赶赴上海向陈嘉祐军长报告出事情形，陈立即致信行政院长谭延闿。因我是当年

*徐君虎，湖南新宁人，当年任十三军政治部少将主任，以“共党嫌疑”被捕入狱。现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广州谭办的第二军军官学校的学生，1925年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谭接信后对当局说：“如果说他是共产党或有共产主义思想，那就该想到是我们送他到共产主义俄国去的，我们要负误人子弟之责。”谭延闿这么一表态，我的杀头之罪就搁下来了。

在牢房的壁上挂了一幅工笔画的观音大士像，附有咒词：“南岳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怛姪哆唵，伽罗伐哆，伽罗伐哆，伽罗伐哆，伽罗伐哆，伽罗伐哆娑婆河。天罗神，地罗神，人离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塵。”

苦闷的囚徒，整日闲得无聊，对观音大士像念几遍咒语，也是消遣之一法。

为了防止发牢骚，每日下午要放风一次，让犯人从房间里出来散散步。放风的时候，一位脚上带镣的新朋友陈海澄同我打交道。他说他是行政院的秘书，北伐军到达江苏打土豪劣绅他是积极分子，与土豪劣绅结怨很深。“四·一二”反共清党之后，东三省在张作霖统治之下尚未易帜。对方买通卫戍司令部说在检查邮件中查出一封药水信，指为陈海澄的笔迹，于是认定陈是东北派驻南京的高级间谍，将陈逮捕下狱。陈问我能否为他送一封信出去？我答应了。他就关在我隔壁，第二天我将他的信交刘诚君带出去了。陈原来是大学校的教师，他在南京的学生很快组织一次为陈鸣冤的大游行，头脑圆滑敏感的谭延闿知道了，问秘书长吕密筹：“陈海澄的药水信笔迹我们查对没有？”“是卫戍司令部来调卷查对的。”“我们自己必须查对一下。”查对结果笔迹完全不符。陈的案情减轻了，人未马上恢复自由，脚镣脱了。他感激我的帮助，问审理我案的法官是谁？我告诉他是王龙。他不禁大喜说：“那是我的学生。”就为我写好一封信要王尽力关照。传讯我时，我当堂递上。我是

现役将级军人，必须组成军事法庭审理，王是临时法庭的主持人。审问退堂后，王派法警叫我到他的房中，明白告诉我：“检举你的都是将官，上面批的是严办，处此情势之下，我决定根据惩办反革命条件，说你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中国国民党特别党部宣传部长时，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判处有期徒刑14年，告你的人听了这个判决想能满足，而你呢，立即向苏州高等法院上诉，理由很简单，你是在苏联讲了一些共产主义的话，并非在中国。我对苏州法院的朋友也打打招呼。为了改善你的生活，马上把你移押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我救了陈海澄，陈海澄也救了我。帮助别人即是帮助自己，这是明显的例证。

我转押到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接到判决书后即向高院提出上诉。地院管理不严，大家可以走动交谈。邵阳老乡贺民范、贺绿汀、赵威……都在此。不少人担心我的生命，要多才多艺的绿汀为我画了一张像可留作纪念，民范先生题了四句话：“上马能杀贼，下马作露布，如此人才困楚囚，天下英雄同一哭。”实在愧不敢当。

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关在看守所的人，最怕是提去卫戍司令部。我有天晚上梦见提到卫戍司令部还打了屁股。早餐时同在座的正谈及此梦，忽然法警来提我，说是解送卫戍司令部。到了军事法庭，我问王龙：“为何要到卫戍司令部去？”王说：“有一个从俄国回来的人，要同你对质一下，下午即还押，你去好了。”我走进卫戍司令部禁闭室，就一眼见到王觉源同学，他从俄国回到上海即捕来南京，他以为我尚在十三军工作，提到我的名字。卫戍司令部一查，我已关押在京了，便提我去对质，我与觉源在公堂上只有相互一哭（觉源现已91岁，去年春从台湾回湘探亲，彼此老而健在，白发相逢，在楼外楼酒家点了几样菜，举杯一碰，亦乐事也）。

1929年冬，我到了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不久即提审宣判，改处有期徒刑一年零两月，按照规定未判前两天算一天，我关押的日子已够了，庭上指示可以交保，我写信给在京的同学，三天即送来保状恢复自由，奔向上海去了。

回想我的这段经历，简直可说是南京牢狱的“巡回使者”，江宁县看守所、军事委员会看守所，老虎桥模范监狱、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卫戍司令部禁闭室，我都光顾过。我在不自由的生活里，始终保持谈笑自若的精神风貌，因为我读过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我也自豪地说：“南京一屈狱，胜读十年书。”并养成我忌恶如仇的怪话。社会的沆瀣复杂，人性的虚伪阴险……种种丑恶世情，在狱中亦亲见亲闻不少，现记述一二如下：

一、要钱不择手段的顾胖子

从上海解来江宁地方法院的顾胖子，曾在广东当过陆军团长，回到上海原籍任水警中队长。他说：“水警中队捞钱的机会多，接印时贺客盈门，大小红包由百元到数百元相继进入我的口袋，这是希望我帮忙放关走私的礼物。有一天来了大批私货包括鸦片烟要过关，同时也看到报上披露在我管辖的地段发现走私案，我便集合全队官兵训话，大骂一阵他们失职。然后宣布今天本队长亲自带队出巡，或走上游，或走下游，将关敞开放私货平安过去，后来小报还吹嘘我治警有方，我乐得名利双收。”

有人密告一徐姓大商店的孩子是共产党，顾胖子将其逮捕并搜出有《中国青年》、《向导》等共产党刊物。徐家急了，一再派人来密商送顾五千元，顾还要他请街上百多家商店联名保一保状，证明这青年是循规蹈矩安份守法的人才释放。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水警大队长知道了此事，派一副官对顾说：“大队长要做寿酒，缺钱用，向你借三千元。”顾胖子

想，老子才得五千，你要三千，岂有此理。答以：“我没有钱。”大队长碰了钉子，决心整他，派员侦查此案。一天便衣探警跟踪徐家老太太过黄浦江，同坐一划子，便对老人说：“听说府上不幸，少爷遭到关押……。”“莫讲了，送了五千元给顾队长，才救出来呀。”“你可以控告。”“向哪里告呢？”

“向水警大队部告，我是水警大队的，正奉令调查，你提起控告，钱还可以退呀。”于是徐家告起来了，很快顾胖子被撤职押来江宁地方法院，以贪污渎职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为解除牢狱之灾，提起上诉，花三千元聘请上海著名的蔡大律师（似名倪培）包他宣告无罪。

庭讯之日，律师对法官说：“被告忠于党国，努力清共，逮捕原告之子，经过侦查清白，又有百多家商店联名具保，即予释放，所谓勒索五千元无凭无据。数字是巨大的，请问明原告：交的是现金还是支票？是中国银行的？还是交通银行的？是十元一张的票纸？还是五元一张的票纸？”法官马上照他的意见对原告父母及在场的兄弟分别提问，答语互相矛盾，各执一词，于是认定交款是假，受贿无据，推翻原判，宣告无罪。顾胖子为了捞钱，撤职丢官，判刑坐牢，勒索的钱进了律师的腰包，费尽心机，到头还是一场空。

二、冒充参谋长、县长的人

一位毕业黄埔军校的学生，分配在何应钦教导师当尉级参谋，到了福建，他请假回江苏原籍探亲，印起名片冒充师部参谋长。到了县里，问返乡路途是否平安？拍马屁的县长派手枪兵护送，摆出衣锦还乡的姿态。邻近有一富家闺秀，尚未许人，好事者为之作合订了婚。他想筹措资金早日完娶，扬言回前线工作，到县城将武警辞退，跑到镇江（南京定为首都，省府迁移镇江），住在旅馆自称新任某县县长，要招聘秘书长……实行卖官鬻爵的勾当。还函告家中以军队要打仗不安

全，承省府厚爱，委派我为某县县长即将赴任。信到家，他的亲友以及教过他书的老师，以为升官发财的机会到了，于是结伴前往某县等候县长驾临。晚上查客栈的政警，得知他们是新任县长的亲友，并问明新县长姓名及现住镇江的旅社，即报告现任县长。以省府换人不予通知，恐凶多吉少，只好以丁忧电省请假回乡奔丧，县长职务由主任秘书代理。为明瞭真相，派一科长晋省，在民政厅一查，绝无其事，按图索骥，假县长捕解南京。

真县长品质恶劣，贪污殃民，早已怨声载道。被撤职的风声在县城传开之后，受害人纷纷向南京监察院控告，派员调查，证据确凿，免职解京。我目睹真假两县长在江宁地方法院看守所相见，真县长以愤怒的心情，指假县长而言曰：“我与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冒充我那一县县长？”“我当时随便想到一个县告知家中，未料到今日彼此同尝铁窗风味。”骗钱结婚成一梦，丁忧避难反遭灾。此俩人后来如何判刑，我到苏州高院去了，未之闻也。

三、在牢里抽大烟、睡姨太的陆域人

在苏州高等法院看守所里，有一位特殊的上诉人陆域人，他可以在牢里抽大烟，睡姨太，终日饮酒作乐。据说他是上海的巨富，有商店数十间。他曾经当过地方团防局长，作恶多端，杀人无数，干了许多坏事，初审判了死刑。他来到高院买通看守所长，因而享受特殊照顾。可是所里关了不少政治犯，对陆优惠，对我们政治犯也就不能不宽松些。我们三五成群打牌、闹酒、唱歌……倒也潇洒快活。五月端午节，陆送了所长数千元礼，八月中秋节所长又向陆要钱，陆觉得他太贪得无厌，不理睬他，因而导致一幕狗咬狗的闹剧。

那天陆的姨太照例送鸦片烟膏来，所长立即走进接见室将纸包烟膏抓住，陆态度自若地说：“好嘛，我们俩人将它封

好，共同签字送法院好了。”陆知道此事将提起公诉，于是疏通当天守门的岗警，证明他姨太来探监时，照例进行严密检查，并对法警说：“你为了这件事如果遭到开除，到上海我的店子去，工资比这里增加一倍。”同时他又请在押的土豪劣绅证明所长卖烟。

第二天法院传讯，法官指责陆域人抽大烟罪上加罪。陆说：“法官，我本不抽烟，是所长卖烟。昨天我太太来看我，他拿了一包烟膏要我买，我不要，他反脸说是我太太送来的，我当面同他签字封存。请传讯在押的人，问所长是不是卖烟？再传讯守卫的法警，犯人家属来所送东西，经过检查没有？”传讯的结果，在押人犯证明所长卖烟，岗警都说家属探监必需经过检查，不可能携带违禁物品。

法官、所长本是沆瀣一气，案不好办，为了息事宁人掩盖下去，要所长与陆和解，撤回控告，陆又如前享受特殊优待。

陆域人因死刑而上诉，高院如何判？我先走了，但在“有钱买得生人胆”的社会里，钱可通神，我想他定能逍遥法外的。

我在将近三年的囚徒生活中，与共产党员、革命份子、恶霸贪官以及杀人越货、鼠偷狗盗之徒共处，真可谓鱼龙混杂。其间我听到许多黑暗的事，见到许多丑恶的人，惜我年已八六，六十年前往事，多已印象模糊，现凭所能忆及的记述二三，对于现在和未来的后生们，了解那个时代，或许不无帮助。

侗族的传统道德

杨昌嗣*

湖南侗族现有75万人，主要居住在通道、新晃、芷江三个侗族自治县和会同、靖州、绥宁、城步等县。省内其它的县市，也几乎都散居有侗族。建国后，侗乡曾被称之为“文明礼貌之乡”。其所以有此美誉，与该民族有其特殊的传统道德风尚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侗族的传统道德规范良莠并存，需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若能批判地继承，宏扬其优良的传统道德风尚，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是有所裨益的。为此，本文拟就侗族的传统道德作如下记述。

恋爱婚姻家庭道德

青年男女恋爱自由、婚姻自主是侗族的传统道德原则。汉文献记载：侗族“男女婚姻，或自相悦慕，或答歌意合而成”。《侗歌》亦说：“女子出嫁，结草山头相许，唱歌山中定情。”此一道德规范，在语言汉化了侗族地区，于建国前已基本消失，但在受封建婚姻影响较少的侗语区广大农村，却一直保留着。其恋爱的方式多种多样，即因居住具体区域之别而各有所异。但纵观侗族的传统择偶方式，基本上可归结为两大类型：一是“甲寨”（侗语），一是“玩山”。前者盛行于南部方言侗语区，后者盛行于北部方言侗语区。

* 杨昌嗣，侗族人，省政协常委、省民委副主任。

“甲寨”，意为“走寨”，即“夜晚走访姑娘”，也称之为去姑娘家“行歌坐夜”。其实施的形式是：三五个年纪相当的姑娘，可不受辈份的限制，聚集于一家纺纱织布，或作针线绣花。于农闲的晚上，特别是冬末春初的夜间，三五成群的青年小伙子，或徒手，或携带“格以琴”、“琵琶”，到姑娘们相聚的人家火堂边坐好，与自己所爱慕的人谈心，或以歌代言，低声吟唱，如此的谈情说爱，直至深夜以至黎明才归。来的男青年越多，这些人家越感到光彩也越被人家看得起。姑娘们相聚处的家里人，每晚早就回避，任凭青年人玩乐，认为这是祖传的行为规范，不可违背。

“玩山”，多在喜庆之日，或劳动之余，赶场路上，男女青年约定时间，各自邀约同伴，到郊外某地唱歌作乐，谈情说爱。这种相约“玩山”，也称为“寨外幽会”，一般的没有固定的时间，或白天，或晚上，由双方相约而定。但男女青年大型的集体“玩山”，则每年都有个固定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如通道县播阳一带的习俗，则以每年春季的“土之用事日”作为男女上“大雾梁”聚会的日子。届时，各村寨的未婚青年男女，身着节日盛装，前往赴会。她（他）们成群围座对唱山歌，先唱古歌、唱盘歌，接着唱情歌。因为去“大雾梁”相会的男女青年，有的是初步相会，有的则是“相见不相识”，对对方的情况不了解或不太了解。要通过双方比古歌，才知道对方是否了解侗家历史上的事，要通过唱盘歌（盘问式的唱歌，一问一答）了解对方的知识面怎样和是否聪明伶俐。在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才唱起情歌，开始谈情说爱。如果男女唱得互有情意，便互相赠送小纪念物品，相约下次相会。

当然，除上述两大类型的谈爱方式外，也有一些特别的谈爱方式。如通道县的播阳、地阳坪和团头一带，则不兴男青年“夜晚走访”。只有当外村寨的姑娘们来寨里作客夜宿本寨

时，寨里的男青年则可邀自己的同伴与她们对歌。同样，这一带的未婚女青年，亦不兴“夜晚相聚待郎”；只有外村寨的小伙子们来作客住夜时，方可邀约自己的姐妹或同伴去与他们唱歌，借机谈情说爱。又如马龙一带，虽兴“夜晚走访”，但去走访的男青年不得进入女方家中，只能站在屋外的姑娘卧室窗下，姑娘也只能坐在房内与屋外的青年交谈，或窃窃细语，或低声吟唱，互倾真心，通宵达旦。

通过上次多次的接触，双方情投意合，即可交换“信物”。通常的“信物”为：男方脱下身上的一件衣服交给女方，女方则赠以首饰或够作一身衣服用的布匹。这便是作为终身许配的唯一凭证，无须媒人牵线，也无须其他三媒六证，亦不必征得父母同意，没有别的仪式，就算订了婚。然后由双方各自告诉自己的父母。一般来说，双方父母对于子女经过自由恋爱所选择的对象，都是赞成的，社会舆论也是公认的。所以，子女订婚之后，双方父母都很高兴，并积极地为她筹备，选择适当的日子为他们完婚。

迎娶仪式，在多数侗语区，都由男方家派出数名妇女去迎亲。女方家则派出二至三名年龄相当的姑娘作为伴娘，陪同新娘出嫁。婚礼期间，不设新婚洞房，新郎新娘不同居，新娘随伴娘睡。一、二天，最多三天之后，新娘必须返回娘家居住。只有到了农忙时节或是夫家有重要事情时，男方家才可派人把新娘接回。但在男方家与夫同居数日之后，又必须返回娘家居住。这样的往返直至女方怀孕，方可常住夫家。这种称之为“不落夫家”的行为规范，被认为是道德的。在婚后的“不落夫家”期间，男女双方均与未婚时一样，保留享有“行歌坐夜”或“玩山”的权利，直至女方怀孕常住夫家，这种权利便自然终止。

侗族大都是一夫一妻的小家庭。儿子成婚后，一般都与父

母、兄弟分居。父母一般的多与小儿子同堂生活，但分家兄长仍有共同供养父母的义务。也有少数是三代或四代同堂的大家庭。这样的大家庭，父为一家之长，掌管全家的经济，但女性在家庭中仍倍受尊重。凡是婚姻自主的小家庭，夫妻双方地位平等，谁善于持家，由谁掌管家庭经济。

建国前，侗族家庭有两种财产：一是家庭公有财产，即家庭所有成员都有份的财产；二是母亲的陪嫁财产，即母亲出嫁时从娘家带来的财产。在财产的继承上，家庭公有财产，一般的由儿子继承，而陪嫁的财产由女儿继承。此外儿女还享有接收由父母兄弟为其出嫁作为嫁妆的“姑娘田”、“姑娘林”、“姑娘地”以及平日自己积蓄“私房”财产。作为女儿，平常与同伴们参加集体劳动所获的钱财，可以不归家庭，全作自己准备嫁妆之用。对于年老无子者，其产业可以招婿入赘或立嗣继承。这三种继承方法，在建国前的侗语区，被认为是道德的。它已成为一种无意识的道德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守。若不遵守，除受社会舆论的谴责外，还要受到款规款约的制裁。现在，一般的都能依新的《继承法》办事，旧的继承方法自然消失。

劳 动 职 业 道 德

侗族以诚实劳动、互助与守信用、勤奋与无私为其劳动职业道德的基本原则。这些道德原则，在侗族社会的公益劳动、集体劳动、为人排忧解难和相互帮工换工中均有充分的表现。

侗族村寨喜建鼓楼、风雨桥、凉亭，好修石板路。这些都是侗族群众自动捐工献料，集体修建的。在这类公益劳动中，家家都自觉地捐财献物，凡有劳动能力者，人人都自动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工程竣工，立碑刻字，不论献工献料多少，均碑上留名，永作纪念。不遵守这一行为规范者，自然孤立于

众，无形中受到冷落。

侗族社会的集体劳动很多，如共同耕种寨里的公田、公地、公山，集体上山打猎，下河捕鱼捞虾，或集体外出打工等等。对于这些集体劳动，参加者人人都能发奋尽力，同心协力，维护集体声誉，而不计较个人报酬的多少，服从和自觉遵守集体的分配原则（基本都是平均分配）。违者被认为不道德，除受舆论谴责外，往往被排除在该集体组织之外。

在生产上的换工互助和生活上的互相支援方面，也表现了侗族劳动职业道德上的美德。如插秧、收割、砍柴、运肥、种地、锄草等农事活动，人们多喜欢以换工的方式来共同完成生产任务。互换工者，一般的均不计较个人劳力的强弱，技术的高低，只要尽力而为，主人就满意。体力强，技术高，但在换工劳动中不尽力尽职，被认为是不守信用，不道德，受舆论谴责。对这样不诚实换工的人，日后就受村寨的人所冷落。在日常生活中，若房亲族戚、邻居外友有事，修造房屋，或婚姻嫁娶，特别是遇到天灾人祸或丧事，大家都会自动地无偿帮助。认为类似这些事，难免家家都会有。今天你帮助了他，日后他也会帮助你，所以非好好地帮忙不可。对于一些丧失劳动能力，又无依靠的老弱病残，多由家族供养，不能让其外流，或挨户乞讨。否则，认为有伤族人颜面，会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这种传统的古朴道德原则，迄今仍然保留。

随着侗族地区的改革开放和乡镇企业尤其是村办集体企业的发展，集体经济的加强和群众生活的提高，互助互济、助人为乐的道德风尚得到了更好发扬，为他人、为集体、为国家争作贡献的自觉性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社 会 公 德

侗族不成文的款规款约，要求人们必须懂得和遵守社会公

德。

侗家人把是否热情好客、礼貌待人当作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公德。

进入侗寨，不论相识与否，也不分男女老少，总是笑脸相迎，喊客进屋，给客人让坐。随即，老人递过烟袋，青年人打来洗脸水，妇女端出油茶。对于住的日子较长的客人，则寨内各家各户都要请客人去喝油茶。对于不能久住的客人，左邻右舍则提酒带菜来陪客。在酒席中，主人端起酒杯先敬客人或晚辈先敬长辈，同辈则互换过手“交杯酒”或“团结酒”。有些侗族地区，席间还由姑娘们唱酒歌，向客人敬酒或劝人喝酒。主人则频频地向客人挟菜，千方百计地使客人吃得满意，这充分显示侗族人的热情好客和文明礼貌的秉性气息。

在侗寨，人们在路上相遇，即使不相识，也要主动地向对方问好，主动让路。如对方来的人多，务必向每个人都打招呼，否则，被认为是不懂得侗家的道德行为规范，不礼貌待人。

侗家尊老爱幼。在鼓楼、凉亭、风雨桥等公共场所，年青人总是给老年人让座。老年人坐好后，年青人不得从老年人面前走过。如果非从其面前走过不可，便要事先说一声“对不起，从你老面前过啦！”才能走过去。通道一带的侗族，对于老年人或比自己年纪大的人，都以长辈或长者称呼。有些侗族村寨，对人只呼本名。不管是否亲戚，均得按照对方年龄辈份，在名前冠以亲属称谓，以示尊重。老人病重，寨里的人每晚都轮流来守候，以安慰老人早愈。侗族对小孩，则喜欢用爱称，呼之为“宝”（男孩）或“妙”（女孩）。侗寨的孩童，从呀呀学语起，就受到传统礼节的熏陶，从而为侗乡的文明礼貌道德规范的世代相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侗族特别尊重妇女，讲究男女平等。在受封建意识影响较

少的侗语区农村，各村寨都有妇女自然领袖，她们与男自然领袖享有同等的权利，亦尽同样的义务。在侗族社会，人们以尊重妇女为美德，多女无子家庭同样不受歧视。在一些村寨，多女家庭反而更受人尊重。

侗族所修建的风雨桥和凉亭，是侗族社会公德的物质表现形式。建于远离村寨溪河上的风雨桥，是专供过往行人休息和避风雨的。这种风雨桥，在桥面上修起封闭式或半封闭式的一条长廊，长廊之上加竖几座三至五层鼓楼形状的建筑。其上的各个部位，都加以雕塑或彩绘各种花纹图案。桥身全部用杉木袖穿直套，印眼相接，结构合理精密，不用铁钉或铁部件，雄伟壮观，别具一格。不仅给侗寨增添风采，也是侗寨吉祥的象征。人们在风雨桥上休息，可以说是一种享受。

侗乡的山场上或路旁的井水边，多建有木质结构或砖木结构的凉亭，这也是专供过往行人休息而修建的。亭上盖木皮或盖有青瓦，有的还壁嵌书画。山间的小路穿亭而过，亭边，古木苍翠，雅静清爽。亭内，两柱之间袖穿木枋，以代长凳。亭中，备有石凳或石墩，供人坐下歇息。有的石墩或石凳上，还刻有侗家人所喜爱的棋盘，供路人相邀一战，以去旅途疲劳。这些凉亭，实是过往行人小憩的理想地方，给人以侗乡确实是个“文明礼貌、重社会公德之乡”的深刻印象。

宗 教 道 德

侗族先民把现实生活中尊敬长辈、尊重妇女的道德原则加以祥化，形成一种敬供祖先，崇拜“萨神”（祖母神，泛指女神）的宗教伦理道德。

《侗款》中记载：“姜良制规章在前，姜妹订规约在后。父寻鸡羽插头上，母亲织布做衣裳。父垦田塘在山庭，母开秧田给后人。……”侗族传说，姜良、姜妹是人类的始祖。从那

时起，人类各代祖先都为人类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为了使后人祭祀祖神，《侗垒》亦说：“孝父母，敦人伦。睦宗族，明尊卑”、“先祖历代厚德，尔我后人沾恩”、“父慈子孝尊重，兄友弟恭和平。……此系人伦道理，族正万古标名”。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思念，侗族对刚去世的父母或祖父母，都要随餐供祭半年以上，即每餐吃饭时，先要给过逝老人盛一碗饭，连同筷子一起置于首席处，意为请“老人”先用餐。若是喝酒，也得先给“老人”斟上一杯，众人才能开始喝。一年之中，除清明上坟祭祖外，各地区或是各个不同的村寨，均各有自己祭祖的时间。在侗语区，若是哪个姓氏没有单独祭祖时间，则被认为是忘祖，是最不道德的。

侗族崇拜祖先，更崇拜“萨神”。“萨”是侗语记汉音，意为对祖母的称谓。也泛指祖母、曾祖母、太祖母、始祖母，或泛指先辈女性。有的地方亦称之为“圣婆”。在南部侗族地区，几乎村村寨寨都修建有祭祀萨神活动的场所，称之为“萨坛”或“萨堂”。一年之中，有几次纪萨活动。一般的村寨，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为祭萨日。有的地方，每隔三至五年要进行一次大型的祭萨活动。届时，有以歌颂“萨”为主要内容的歌队在唱歌，耶队在“多耶”（一种动作较简单的大型歌舞），芦笙队在吹芦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场面壮观，热闹非常。以此表示对“萨”崇拜的虔诚。

这种传统的宗教道德，今多数地区已不兴，但在个别的村寨仍盛行，只不过是去掉了一些迷信色彩而矣！

政 治 道 德

侗族素来有很强的爱国内聚力。今之侗族地区，很早以前就是祖国疆土的一部分。周以前，属于荆州南境，春秋战国时期属于楚巫黔中郡。自秦代起，中央王朝便在侗族地区建立了

郡县。至北宋，封建王朝对侗族地区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从而与汉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也日益加强。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侗族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民族团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早年就投身革命的粟裕将军，就是会同县人。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西起义，是名扬中外的常胜将军。他投身革命的事迹，对侗族地区人民的觉醒，影响很大。1926年冬，芷江县成立了第一个中共党支部。1927年春，全县各族人民在党支部的领导下，建立了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并在岩桥等14个乡建立了农会，共组织了5个赤卫队，队员达200多人。工人、学生、妇女也分别组织起来，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芷江县的革命力量也遭到了镇压。红军长征路过侗族地区时，侗族人民热情地迎红军，送红军。芷江县侗乡人民还积极支持贺龙将军在溆水组织的阻击战，或当向导或参战，有的侗族青年还加入了红军队伍。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影响下，侗乡人民投入了抗日战争的烈火之中。此期间，湖南侗乡青年壮丁达数千人，均开赴抗日前线参加抗日。在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大片国土相继沦陷的情况下，黔楚咽喉的侗乡地——芷江，便成了抗日战争时期西南大后方的前沿军事重地。为了保卫抗日的大后方，1938年，侗族地区几万民工云集芷江，建成了芷江飞机场。国民党宪兵司令部、中央政治大学、航空第九总队等大批机关、学校、工厂先后迁芷江。苏联志愿空军大队的部分轰炸机和驱逐机也进驻芷江空军基地。机场的修建，机关单位的迁至和重要军事基地的形成，日本飞机便来多次袭击。围绕机场的空战连绵不断，芷江县的城乡屡遭轰炸、扫射，不少房屋被毁，生产被破坏，人被炸死、炸伤。

该地的各族人民为抗日战争作出了牺牲。值得庆幸和骄傲的是，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受降会谈在芷江举行，史称这次会谈为“芷江受降”，侗乡的这座受降名城也就从此称誉中外。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下，侗族人民为侗族地区的解放和新中国的成立作出了贡献。建国后，在各项社会改革、抗美援朝、对越自卫反击战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侗族人民的政治道德观念又有了进一步的升华，为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加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江华瑶族婚俗

任 济 盘良国 *

居住在江华一带的瑶族人民有着自己独特的婚姻风俗，现略述如下：

一、招 郎

招郎，在瑶寨中是一种普遍的婚姻形式，即男嫁女家，亦称到女家上门。结婚时，男方可以送些礼物到女家，也可以不送，但是否举行婚宴这全由女方决定。招郎有男换女姓的招郎，有男女互换姓氏的招郎。换姓，在新郎新娘拜堂成亲时，由长者在新郎新娘互拜之时，劝告新婚夫妇和睦相依，尊老爱幼，白头到老，并宣布新郎改姓换名，或夫妻互换姓氏。改姓，名为女婿实际为儿，女婿与家中的弟兄地位平等，同样享有财产继承权和赡养父母的权利和义务。

招郎还有一种“两不避宗”，俗说“两边走”的形式。“两边走”的招郎，虽然以女家为主，但双方的父母都要赡养，两家的生产、生活都要照顾，在女家十天半月，又再回男家十天半月，一年四季按照农活依次轮流。生儿育女以后，儿女分别随父随母取姓，这种平等婚俗，不仅过去如此，今天仍然如此。

二、社 交

聚居在江华上游乡、河路乡的平地瑶(自称“峇贺尼”)，亦有着自己独特的婚俗。

*任济、盘良国，均系江华瑶族人。

平地瑶的男女青年，婚前是以歌来表示自己的爱情的。姑娘长到十五、六岁就要在冬春季节举行“开脸”仪式。请一中年妇女用棉线绞去脸上的汗毛，修整眉毛，表示已长大成人。此后，便可与男青年对歌。男孩进入十六、七岁后就系统地向村中的父老、兄长学歌。这样男女青年就进入“男女答歌”的社交活动阶段。这种唱歌恋情的社交形式有“会歌堂”和“赶歌圩”两种。

“会歌堂”又分“婚嫁歌堂”、“客来歌堂”和“路遇歌堂”三种。“婚嫁歌堂”是新娘出嫁的头天在新娘家摆的歌堂，附近村寨的男青年都来和伴陪新娘的女青年唱歌。“客来歌堂”是外村青年来村上做客，村中青年相邀与客人对歌。“路迂歌堂”是在赶集路上几个男女青年相迂相互对歌。双方用歌来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当歌唱到难舍难分、情投意合时，互换纪念品，称为信物，从此相爱。

“赶歌圩”场面更大，在节日期间，以村寨举行，主办村寨向附近村寨发出邀请，届时男女分群在村头围唱。开场，东道村青年先唱。接着摆阵，女青年站在场地中间，男青年将她们团团围住。继而开锣，男女青年开始对歌。深夜各队女青年派代表出围“侦察”，相准对手、挂号对歌，谓之解围。歌圩散后，男青年送女青年，边走边唱，情投意合时互相交换信物，的确是一路交情一路歌。歌堂和歌圩成了平地瑶男女青年寻找恋人、谈情说爱的重要社交形式。

三、求 婚

求婚有自由恋爱和包办婚姻两种。自由恋爱求婚，是在男女青年唱歌建立感情后，男方告知父母请媒人到女方求婚，双方父母都不会阻挠。包办婚姻求婚，男方父母请人到女方求婚。男女双方互不相识，但在求婚相亲时，如互相不中意，也

可终止。

求婚时，媒人拿一包竹叶包的鸡蛋到女方说亲。女方收下则表示应允，称“下缘”，媒人即把喜讯告诉男方。媒人第二次去时，带酒肉各两斤和甜食果品，和男青年一齐到女方相亲，双方愿意，求婚成功。

四、订 婚

求婚成功后，男方选“好日子”举行订婚仪式。订婚当天上午，男方请一诚实稳重的同辈人相陪，挑60斤酒，60斤猪肉到女家，女家热情接待，并把写有姑娘的出生年月日时的“龙凤帖”交给男方。下午，姑娘在几个姊妹的陪同下到男方做客，男家设宴招待。几天后，姑娘回家，男方送60个半圆形的油炸糍粑，每个重达一公斤。女方将糍粑作喜信送给亲戚，表示姑娘已经订婚了。

订婚后，男方要办“过礼茶”，备米酒80斤、猪肉60斤、衣物首饰送到女方。“过礼茶”后，男方择定结婚吉日，用红纸写成“吉日书”，再备60个糍粑，放在柜中堆成塔形，抬着送往女方，这叫“送日子”。

五、结 婚

“日子”送来了，姑娘明白，不久就要出嫁了。临近出嫁一个月，姑娘不干活，在家做针线嫁妆，称“坐离娘月”，或称“坐姑娘”。女家亲戚在此期间相继请姑娘作客惜别，俗称“吃鞋子饭”。姑娘要给亲戚送一双亲手做的布鞋，表示感谢和纪念。

姑娘在“坐离娘月”期间，男方要请女方父母、伯叔来做客，盛宴招待，称为“亲家上门”。宴席上的猪肉切得比任何宴席上的都大，每块至少二两重，这样表示联姻的真诚和敬重。

出嫁前十天，村中未婚姑娘每晚都轮流来伴陪出嫁姑娘，互叙情谊。出嫁前两天，新娘开始“哭嫁”，第一天哭家人，第二天哭邻舍。明天姑娘就出嫁了，晚上堂屋里摆上三张八仙桌，五把椅子和多条长凳，桌上摆两束彩纸作的油茶花，猪头一只，豆腐渣两碗。鸣放鞭炮，新娘入坐哭嫁。舅家、姑爷家、姐夫家的姑娘们坐两旁，村上的陪娘坐下首，背朝大门。坐定后，聚集大门外的男青年唱开喉歌、诗歌、劝歌。厅堂上的姑娘开声接唱，请厅外的男青年进厅堂坐歌堂。厅内歌声嘹亮，时起时伏，通宵达旦。天亮，坐歌堂结束，男走女送，早饭后新娘上轿出嫁。

平地瑶旧时的婚俗，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正在不断的改变。解放后，早婚现象逐渐消除，但对于唱歌恋情，自由恋爱的传统习俗，仍在继承和发展之中。

湖南人在西双版纳

肖功富●

我出生在湖南省祁东县，1960年和一批湖南人到云南西双版纳支援边疆建设。我们这批湖南人是在怎样的西双版纳艰苦创业的呢？在此，特向湖南乡亲作一简单的介绍。

驱车西去

195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指出：“从1956年起，在12年内要求全国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由1955年的1300万亩，增加到一亿亩左右。”为了实现《纲要》提出的奋斗目标，粉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建立起我国第二个橡胶基地，当时中央农垦部决定，从祖国的第一个橡胶基地——海南岛和粤西垦区抽调一批久经革命战火考验的56个军队转业干部到西双版纳景洪建立橡胶垦殖农场。接着又从云南省的墨江、景东、景谷县招来了98名工人，建立起两个生产队。全场154名工人、干部，建立起两幢茅草房，仅勉强安下身来，挥起砍刀、锄头向竹林荒山开战，当年就开垦橡胶苗圃185亩，开垦林地385亩，定植橡胶48亩，在建立国营农场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为了进一步发展橡胶事业，开发边疆，适应国营农场全面

●肖功富，湖南祁东县人，现任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政协经济、科技委员会主任。

跃进的需要，1959年底至1960年间，中央又决定从湖南农村动员一部分青壮年支援边疆国营农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9年底从湖南醴陵县动员了1660多名青壮年，1960年又从湖南省祁东县动员了1200多名青壮年到景洪农场。我就是当时祁东这批青壮年中的一员。

1960年上半年，中共祁东县委把动员青壮年支援边疆社会主义建设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云南农垦局也同时派人做宣传动员和途中接待工作。规定参加边疆建设的条件是“五不要”、“三不批”，即“家庭出身不好的不要；年老体弱的不要；有传染病的不要；半边户的不要；有经济问题的不要。”“不自愿的不批，不符合条件的不批，工作没有移交清的不批。”经过一个多月从党内到党外的宣传动员，广大干部和贫下中农青壮年纷纷响应县委的号召，踊跃报名要求加入支边的行列，有的还咬破手指，写下血书申请支边。同时县委决定抽调县委常委、县公安局局长朱忠恒同志负责全县支边带队，各公社也抽调一名负责同志带队。我的长兄肖功宇是黄土铺公社党委副书记，被决定作为该公社支边带队的干部，同时决定将我和我的胞妹肖禄云（系公社妇女干部）一同抽调支边。

我三兄妹，于1960年10月5日，即中秋节前夕（旧历八月十四日），在村院亲朋好友的热烈欢送声中，依依不舍地离开养育之地，奔赴黄土铺公社参加全公社1200多名青壮年的支边队伍，加上家属、小孩共计3000多人。15日清晨分乘卡车，在公社党政干部和居民敲锣打鼓声中，把我们送上征途，驶往当地市转乘火车，奔赴云贵高原，在火车上渡过传统的中秋之夜。整个奔驰之夜，没有月饼，只能从车箱窗口探望明月。

当时从湖南到贵阳的铁路客运火车，不知是紧张的原因，还是因为我们人多，或是赴边垦殖的战士，安排我们乘坐的是货车车箱，象解放战争中行军一样，背包当座垫，颠颠簸

簸，东歪西撞，困了就干脆打开背包铺在车箱里，男女老少挤在一个车箱里，直到贵阳市才下了火车。在贵阳休息了半天，浏览了贵阳市容。

经过云南农垦接待人员和支边带队干部半天多的筹划，安排了几十辆卡车，均带有托斗给我们乘坐和载运行李，从贵阳直达昆明。到达昆明时，受到了省农垦局及省有关领导的热情接待，并招待观看了一场滇剧。

休整一天后，接着从昆明随着大队伍出发，同样坐的是卡车，背包当座垫。当时昆明到景洪的公路，是一条楞石棱角，砂子泥土铺成的沙土公路。“天晴尘满天，下雨遍地泥。”大队伍行军，拥前等后，一车有故障，全队都要相依作伴。加之山高路陡，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山坡，探头向外望，真有点胆颤心惊。一路上风尘扑扑，一个个活象灰堆里爬出来的泥菩萨。

全程公路上，云南农垦局安排了有专设的接待所或站，备有热菜热饭供应。在一个场地，每八个人蹲成一桌，每桌还有一碟小米辣，据说主人得知湖南人爱吃辣椒专门准备的。其实我们也是第一次吃到这样辣的辣子，吃进口里，鼻水直流，征途劳累也全消失了。

经过13天的艰苦行程，于10月17日，终于到了景洪澜沧江畔。当时澜沧江还没有桥通往允景洪城，只得用小渡船分别把我们渡过江去。当天住在州招待所，州、县和农场领导来到我们住地看望，表示欢迎。当时的允景洪城砖瓦房不多，大部分还是茅草房，街道是泥沙路，市场设施简陋，场地狭窄，以路为市，脏乱拥挤。景洪县内有景洪、南联山、广龙、飞龙、大勐龙等几个国营农场。我们到后等待具体分配。第二天，领导宣布朱忠恒同志去南联山农场担任党委书记，我哥肖功宇去景洪农场担任副书记，我被分配在景洪农场第五作业区担任党总支副书记。分别用汽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

艰 苦 生 活

我和黄土铺公社的刘安根等30多位青壮年，带着家属小孩到了五作业区。仅我一个人留在作业区，其余都分配在紧靠作业区的农场第三生产队，刘安根同志担任队党支部副书记。这个作业区下属有两个生产队。三队是连作业区在内，全都是新建的茅草房。三队是在流沙河旁昆洛线的743处。我们住的是近期内用竹子和茅草盖起的五幢新草房，每幢分隔成七至十间。进去一看，抬头可见太阳，低头还见竹蓬残根，横看这间可见那间，床也是用竹子搭起来的。我们除了带有穿的盖的外，其它一无所有，老工人急忙汗流夹背地从山上砍来十几根碗口粗的竹子，锯断成碗，做成筷子、凳子（一截竹筒劈开两半便成凳子）分送给大家。多数支边同志触景生情，既以感激之情接过老工人递给的家俱，又流露出心灰意冷之意。有的说，撞着鬼，丢下老家鱼米之乡、瓦房和富有的家俱，来到这古木参天的原始森林，过着原始生活。有的家属老人还流出了眼泪，闷闷不乐。

作业区党总支部书记张志明，是从部队转业南下的老干部，见这情景，立即找我和刘安根挨家挨户做思想工作，给以安慰。并于当晚召开大会，由张志明同志讲述建场史和暂时的困难，以及今后战胜困难的措施和远景规划，我和刘安根同志也在会上讲了话，表了态，从而使大家初步有了些安慰。接着大家各自进到分配的草房里整理好床铺，家与家之间用垫单挂墙隔视。但由于刚盖好的草房，地板是松的，有的一睡下，竹子床脚往下沉，越睡越低，有的床打得不坚实便倒下去，只好穿上衣服自己动手重架，噼噼叭叭闹个通宵。我和刘安根同志都经受过党的培养教育和解放军部队的锻炼，没有准备来享什么福，更不怕什么艰苦和困难，暗下决心，一切从头开始，一切

都要艰苦奋斗！

支 前 修 路

家未安妥，又要支前修路。1960年10月18日，即到场的第二天上午，场部派人送信来给张志明同志，他看后交我看。信中说，奉上级紧急通知，各场要抽调人员立即去打洛支前修路，从你作业区两个生产队抽调支边青壮年25人，由肖功富同志带队，今日下午随农场场长王文希同志赴勐海县勐混修通打洛公路。当时的农场具有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任务。勐混离我区约有60多公里，从昆明到边疆的公路只通到勐海县的勐混乡，且是沙土公路。勐混虽驻有解放军一个团，但他们担负保卫边疆任务重，因国民党残部匪徒常在盘居骚扰，边疆人民深受其害。中緬边境我方的打洛镇离勐海还有60多公里，是原始森林中的山间小路，为了彻底消灭残匪，必须抓紧修通这条公路，只有依靠国营农场职工出力。当接到场部通知后，我们总支立即分工去两个队动员，按农场的要求把队伍组织起来，当天晚饭后，约6点左右，景洪农场王文希场长坐着马车，身挂手枪，还有部分军转干部带着武器，带着约有200多人的队伍及马车载着生产工具、干粮等来到我区。我区是农场去勐混的必经之路。我背上背包和步枪，立即带着预先准备好的队伍跟着王场长出发了。回头望着爱人和其余赴前同志的家属带着小孩，在生产队门前难过地送别我们。

经过通宵步行，于10月19日上午9时到达勐混部队营房。一到，大家都疲劳不堪地躺在军营茅房竹床上入睡了。当时，我和另外几位同志的脚板磨起血泡，腰酸背痛，睡也睡不着，只见王场长前来逐个看望，便在营房里休息了一天。

21日上午离开营房上工地，按照测量好的地段进入原始森林，分别安营扎寨，砍下竹子，搭成工棚，架好炊具，就开始

新巴劈山筑路。我们景洪农场去的职工分为三个队，约有10公里长的路段，是紧接勐混的一段。我当时被分在景洪农场修路指挥部，跟着王场长住在一起。指挥部设在半山腰，大约有7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隔成四间，即一间医务室、一间宣传室、一间总务室、一间是王场长和我的住室，另离住房二米左右的地方盖有厨房。指挥部既没有电话，更没有电灯，照的是煤油或松明。筑路的最前方有解放军防护。苦大概是因为筑路工人中大部分是新到的佤东支边工人，怕听不懂话，不便做思想工作，而叫我在指挥部跟着王场长的。我既是他的警卫员，又是翻译员，还是小报道员，他到哪个工地检查工作，我跟着到哪里，发现谁积极肯干，就写篇小稿送到宣传组。宣传组有个女同志，用广播筒到工地口头宣传，激励大家努力干。

这里的人们，也许是历史形成的习惯，几乎不喜欢种蔬菜，这样一来，我们在筑路工地的生活是艰苦的。每天每人只供应一市斤木米，但劳动强度大，根本不够吃，尤其是没什么油水，很少吃到荤菜，就连蔬菜也吃不上，常常是红锅炒“麻皮”（傣语，辣椒）。有时老工人利用休息时间上山挖山药充饥，摘革命菜（野菜名称）煮汤。除此之外，最经常的是水与盐的“玻璃汤”了。

这里山上野兽多，却不可怕，你不惹它，它不伤你，在住地只要烧堆火，它就不敢侵害你。最可怕的是山蚂蝗和蚊子，多且厉害，上山劳动，就是最热的天气，必须戴上帽子，穿上长衣长裤和鞋袜，不然，就被咬得又痛又痒。蚊子叮后还会得疟疾。山蚂蝗怕太阳，只要太阳照射着的地方，它就不会出来咬人，我们是在原始森林劈山修路，晒不着太阳。有一天晚饭后，我跟着老工人上山挖山药，要顺藤深挖几公尺才能挖着，累得汗如雨下，便脱下帽子和衣服去挖。谁知第二天起床后，我的枕头上有一大片血迹，经检查是在挖山药时山蚂蝗钻在我

的头发里咬出血的。

艰苦生活的磨炼，使大家学会了战胜困难的办法和勇气，为尽快修通这条公路（只修出三级土路面），消灭残匪，保卫边疆，你追我赶地劳动。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所分配的筑路工程，于1960年11月25日返回作业区。

艰 苦 创 业

说起我们支边工人，当地人都说，湖南人苦得！干得！但遇到一些实际问题得不到解决，也曾产生过消极情绪。我从支前回到作业区，一到家，刘安根同另几个支边共青团员来找我，这段时间大家思想彼此不安，陈某等三人已跑回湖南去了，还有些也想跑，主要是生活过不惯，劳力不分男女均是每月18元，钱多少不说，可是在这个地方有钱连一个碗也买不到，初到几天，还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大米，后来就一直是天天吃竹子碗蒸糯米饭，现糯米又没有了，拉来的全是包谷，又没有磨加工，颗粒煮吃，难以消化，屙出来仍是粒粒包谷，也没有蔬菜和油。我说，吃什么？一位同志插话说，“吃‘玻璃汤’”，又叫“九菜一汤”，就是烧一锅开水，加一把韭菜，没有油，每人一勺，有时只用盐下饭。这段时间还刮了几次暴风骤雨，房顶的草排一下被刮掉许多，雨水倾盆而下，把衣服被褥全部淋湿，蚊帐和其它一切物件统统被刮在地下，屋里积水如塘，房子嘎嘎作响，摇摇欲坠。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大家只好撑着雨伞坐在煤上，以伴天明。同时，开始组织上山斩芭。每日天还未明，队长就吹哨起床吃饭，又缺煤油，黑洞洞的起床吃饭，吃完饭，队长带领上山斩芭，中午只休息一个多钟头就又上山，下午到6点才能收工。干活在原始森林中，上有飞禽覆顶，下和虎豹作邻，稍不小心就会坠入沟壑之中，断筋折骨，还有旱蚂蝗和蚊虫叮咬，大家思想不通，出工不出

力，只砍了20多亩地。他们说的这些，我在支前修路中已亲身经受过，一点不假。我向作业区党总支建议，召开生产队干部会议，采取措施，稳定职工思想。

党总支采纳我关于关心职工生活，尽力解决实际困难，安定职工思想，艰苦创业的建议。第二天张志明同志主持召开了一天全作业区干部会议，结合当前实际，组织学习有关文件，贯彻中央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统一思想，认识全国都处在困难时期，认识祖国边疆的美好未来，树立以队为家，扎根边疆的思想。与此同时，发动职工自己动手，艰苦创业，战胜困难，争取早日建成美丽的胶园。会后各队干部回去召集职工大会传达精神，发动职工想办法，出主意，提建议，群策群力解决困难。根据群众的意见，组织职工先在流沙河旁每个队开垦20多亩菜地，派人外出买菜种种上蔬菜，支边工人中有能工巧匠，有的石工上山找石头制磨加工包谷，解放吃包谷难的问题；木工做床、桌、凳；篾工做竹器等生活用品。这里土地肥沃，资源丰富，没几个月一些基本生活用品和吃菜问题初步得到一些解决。

同年底，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外欧同志下放米景洪农场当场长。他一来，经常深入生产队，常来我队同干部职工谈心，研究工作和生产。他是湖南人，说话听得懂，对大家鼓舞很大。1961年元月，场部决定撤销作业区，干部分别加强生产队，我被任命为三队党支部书记。新年伊始，我同队干部一起带领职工投入橡胶林地基础工程的建设，这是一场恶仗。就以斩坝为例，面对密密麻麻的原始森林，特别是那盘根错节，扭抱一团刺竹林，真是狗咬刺猬——无从下口。由于当地老工人的技术指导和实际帮助，我们学会了“剃头”、“一蓬倒”、“扫外围”、“内攻坚”等斩坝技术。“在战争中学会战争”是要付出代价的。有的同志眼睛被刺伤了，有的同志身上被划

得道道血痕，有的被砍断飞起的刀片砍伤，有的被倾斜猛然倒下又弹起的竹子挑得老远，差点丢了性命，被砍倒的大树压伤者也不乏其人。当砍掉树木，太阳即炙烤着大地，热浪向我们袭来。热，是亚热带最大特点，恶劣的气候是我们的大敌。还是三、四月间，外面的温度就达摄氏38至40度。炎热、酷热、闷热，其难忍难熬之处，只有身临其境的人，才可能有所感受。我们用超过气候热、太阳热的理想热，征服了自然，顽强地工作。经过8个多月的斩坝，终于砍出了600多亩土地，清烧坝后，在6月雨季前还开挖橡胶梯地200多亩，橡胶苗圃地50亩，为种植橡胶作了前期工作。这年烧出的地全种上了旱谷和包谷，还间种了南瓜和冬瓜，获得了粮瓜大丰收，共收获稻谷1.5万多斤，包谷1万多斤，瓜菜3万多斤，填补了口粮不足，有些职工劳力强的还利用休息时间开地种了包谷、瓜菜等。职工生活逐步有了改善，进一步稳定了职工思想。1963年1月，为了加强领导，农场体制进行了调整，原景洪农场分为曼沙、曼青、曼东三个农场，原广龙农场分为光华、广龙、天河三个农场，原飞龙农场分为飞龙、曼海、曼波三个农场，原南联山农场分为南联山、江河两个农场。然后11个农场合并成立了国营景洪总场。由李子英、朱宗恒同志任正副书记，赵世贵、胡家田二同志任副场长。我哥肖功宇调任曼青农场党委书记，我任曼沙农场党委委员、党委办主任。同年3月，毛主席发出“向雷锋同志学习”的伟大号召，农场党委立即行动，向全场作了开展学习雷锋同志活动的布置，一个学习雷锋好榜样的热潮很快在全场掀起。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同志的光辉事迹大大地鼓舞了全场广大职工，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更加振奋，许多工人以雷锋同志为榜样，“见困难就上，见方便就让”，不为名，不为利，决心象雷锋一样“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这年上半年，在科技人员指导下，种植了

橡胶1200多亩，同时对往年橡胶，部分试行了大田芽接改造。全场当年定植成活率创百分之几十以上的高水平。

下半年，曼沙农场也和全国一样，普遍开展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一步提高广大职工的思想觉悟。10月，国家农垦部部长王震同志来到我场视察。当时他已年逾花甲，白发苍苍，他态度和藹，平易近人，关心群众。一到就耐心听取场党委负责人汇报情况，并深入生产队问寒问暖，对湖南支边人员说，我们都是老乡，要安心边疆，建设好边疆，为橡胶事业建功立业。临走时还同我们合影留念，并向场党委提出了不少宝贵意见。一是要做好职工的政治思想工作，使广大职工都能扎根边疆，办好农场；二是要关心职工生活，养好集体的猪，种好菜，帮助他们解决具体困难；三是种好橡胶，为国家创造财富。

1965年6月，我被调到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当时自治州党的领导属思茅地委代管，是地委的派出机构，直到1973年党的关系地州分开，成立中共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委员会。

胶 园 巨 变

31年后的今天，西双版纳的国营农场变了。目前，全州已有一所热带作物研究所，11个国营农场，拥有15万多人口，8万多职工，开垦利用土地近100万亩，其中橡胶76万多亩；机械总动力104586千瓦，各种交通运输车辆687辆；拥有全国工艺最先进的橡胶加工厂，有国外引进的先进制茶设备、木材加工设备以及先进的制糖、果品加工设备；有一支实力雄厚的科技队伍；有全国农垦系统最大的水力发电站；有年产干胶超万吨的国营景洪、东风农场；有亩产、株产居全国之首的橡胶生产及质量上乘、用途广泛的干胶系列产品、橡胶制品、乳胶制

品、橡胶木材、橡胶籽油；有饮誉中外、倍受消费者青睐的大渡岗茶；有名闻遐迩的蔗糖、热带水果及罐头、果脯。1990年产干胶5万多吨（干胶产量占全省四分之三，居全国第二，单株产量和亩产量居全国首位），白糖8000吨，茶1500吨，热带水果2500吨，工农业总产量3.6亿元，上缴税利5000万元。

在国营农场发展的同时，带动和帮助当地各族人民群众发展民营橡胶已达56万多亩。全州已成为全国第二个橡胶生产基地。

国营农场，随着生产的发展，职工生活不断得到改善，人均年收入达1000元以上，住的是砖瓦房，用的是装饰讲究的现代新家俱，办公室是矗立的高楼。

面对今天巨大的变化，使我想起当年创业者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他们与当地人民一道为发展我国的橡胶事业，矢志不渝，做出了显著成绩。当年湖南支边的青壮年，有的在披荆斩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有的受伤致残，幸存者也大多已退休，我也是风烛残年了！但愿青年们继续谱写橡胶事业的新篇章。

“世界最大标语”的诞生

易新良

1958年12月，湘乡县城郊外、涟水南滨的东台山和塔子山上出现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字样的巨幅标语，每个字的长、宽均在60米以上，每笔宽6米以上，18个大字的笔划实有面积为24000平方米。当时称之为“美丽、壮观、鼓舞人心的两条世界第一的大型标语”，是在怎样的情况下，如何制作出来的呢？现忆述如下。

1958年，在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各地各项事业都在“跃进”，“卫星”接连“上天”，“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这一震天价响的口号回荡中国大地。在“政治批判”和“革命宣传鼓动”的共同作用下，空气沸腾了！人们毫无保留地，无偿地贡献出自己的精力和体力，以“一天等于20年”的速度，“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愿望失去了理智，干劲离开了科学。“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成了鼓舞人们想象代替理论的信仰和说教。人民公社办起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胀”，共产主义的大门似乎仅有一步之遥。各地都在争先恐后地向它迈进，湘乡县自然也不例外。于是发出“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的战斗口号，把湘乡建设得更好，使人民过更幸福的生活。全县人民以实际行动实现着县委发出的这个号召。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积极地建设社会主义，往共产主义道路

迈进的时代。共产主义社会似乎已为期不远了，人们的思想意识必须更新，应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风格——“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于是，县委决定在中国“第二条垄海线”湘黔铁路的车厢视野内——巍峨塔子山和东台山上，嵌刻“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和“苦战三年，改变湘乡面貌”两条巨幅标语。

工程从10月17日开始，12月5日结束，历时48天。具体步骤是：

1. 测量。组织专门测量人员，翻越高山，选择位置，并从几十里外，眺望观看确定地方，根据字的大小进行测量，将一个一个的字和仿宋体笔划以及间架距离等确定下来。

2. 修路、架厕所，“安营扎寨”。

3. 水土保持。挖人字大水沟，取横沟、挖边缘、排石沟及排水沟，使泥水不流到笔划上去。

4. 把表层松土及草茺、树茺挖去，草茺一般挖5寸深左右。

5. 打锤眼。在每一笔划上打梅花眼，一方面把土锤紧，一方面阻住黄泥往下滑。

6. 用扫把将虚土扫干净。

7. 挖横的排石沟，将卵石排放稳妥，高出土面1至1.5寸。

8. 在扫光的土上浇水，使土层透湿。

9. 粉泥。用黄土渗些稻草，加水作熟后涂1至1.5寸厚，并做到涂泥均匀。

10. 用1比2的砂子和石灰加水拌匀，涂在黄泥上面，然后嵌上镀银玻璃（每平方米1块）。最后验收。

在具体修造过程中，

1. 开始时成立指挥部，下分股室。后来调集2500多名师生时，成立战斗团，团部下设政治部、工程指挥部、后勤部；团下分两个营，营下有连、排、班。

2.为提前完成任务，身穿稻草蓑衣，风雨天里坚持战斗。运输路上，大“字”旁搭茅草棚，雨下大了，就进棚休息，雨稍停又继续干。夜里施工有困难，汽灯、油灯又不多，于是利用半夜的月光，提出“早睡觉、早起床、二点以后好时光，天上自备‘水银灯’，漫山遍野都光明”。每当月亮出来，即进行劳动。

3.在工地上建广播站，“大宣传、抓竞赛、夺红旗”，及时将“先进事迹、成功经验、竞赛的胜利”予以报道。于是，各个连开展竞赛，争相插红旗。

4.工程所需石灰全部从40里外的酒铺运来。一天，当山上的工程进展较快，石灰运不及时，就搞“夜战”，于当夜组织一个1000人以上的大兵团，有工具的全部出动，一夜就运回石灰12800斤，解决了第二天工程的需要。

5.参加修建工程的都是中、小学生及教师。在工余休息时，学习文件，开展鸣放，顺便将某些“白专”老师指斥一顿。

6.开展“试验田”，召开现场会。先在塔子山上的“三”字上做了“试验田”，成功后，召开现场会，推广经验。一营“变”字第一个完成，召开现场会；二营“三”、“面”字完成后，又召开现场会。一系列的现场会，加速了工程的进展。

7.克服天气冷，任务艰巨的困难，人人干劲冲天，出现许多模范事迹，团部先后组织两次评比先进活动。共评出“先进集体”5个，“特等劳模”11个，“甲等劳模”46个，“乙等劳模”141个。

这样，经过小学及一、二、三、四中学2500多名师生的艰辛劳动，挖草皮、排石头、涂黄泥及灰浆、嵌玻璃等一系列工序，终于“写”出了这两条巨幅标语。

这两条标语共用砂360万斤、石头480万斤、石灰35万斤、稻草7.2万斤，开道路3400米，各种防水沟在10000米以上，开土

方16800立方米，共耗工近10万个。两条“世界第一”的大型标语始于1958年12月5日起，嵌刻在塔子山和东台山上。

世事沧桑，34年后的今天，人们除了能在两座山上找到一点玻璃碎片外，无复标语痕迹，留下的只有深思。

“文革”浩劫中的南岳文物

旷 光 辉

南岳衡山，我国五岳名山之一，道教的洞天福地，佛教为五叶流芳之地。唐宋以来，学士鸿儒，来这里著书立说，讲学论道，不计其数。胡安国、胡宏在这里开创湖湘学派，一直成为中华理学的摇篮。王船山隐居续庵，立说数十万言。因此，南岳又称为中华文明奥区。

这里的道观、佛寺、书院、历朝祭祀的庙宇等，共计古建筑100余处，其中有省级重点文物8处，县区级文物24处。但在文化大革命浩劫中，有的文物全毁，有的严重损坏，有的面貌全非，为了记取这沉痛的教训，写下如下回忆，以为借鉴。

1966年8月25日，衡山的文化革命进入深入批判阶段，全县的教育系统批判大会在衡山一中（现在的岳云中学）举行，全县主管教育的领导和校长在一中礼堂接受批斗，并要各校校长到南岳街上鸣锣检讨，承认自己执行了反动路线。8月27日中午，批、斗会刚刚结束，一中的政治老师胡某带着一伙人在校门口，拦住衡山县委主管文教的书记蒋杰，气势汹汹地问：“你们犯了罪，知道不知道！”突如其来的提问，蒋书记一下子摸不到边，只回答：“不知道。”胡某说：“我晓得你们不知道，你们保护了大量的封建迷信，大量的封、资、修，你们对人民是犯罪，你们县委是罪魁祸首。”蒋连连点头，“是犯罪！是犯罪！”胡某更起高腔：“是犯罪，可不可以打！”蒋说：“这

• 旷光辉，南岳文物管理所馆员。

些是省级重点文物，要打，要请示省里。”胡说：“那好，你们先请示，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打祝圣寺。”放走蒋杰，胡某纠合一些无知的学生，磨拳擦掌，卷袖拍胸，准备打祝圣寺。

8月27日中午，学校刚吃完中饭，胡某在操场，拉开嗓门高喊：“破四旧去！打菩萨去！”他本人手中拿着一根锄头柄，陆续来了些无知之徒，纠合了约100人左右，开始向南岳街上冲去。沿途，胡某散布他如何质问蒋杰，准备明天打南岳大庙的妄言。正巧，我站在大庙门口，因为我是管文物的工作人员，出于工作本能，非去看不可。这时，市社教工作队队长欧阳明同志看见我也跟上了，他赶忙向我说：“你不要去！到时不分有红皂白，你也挨了。”我说：“我去看看，不要紧。”欧阳明队长说：“你不要去，最好回避一下。”

这伙人冲到祝圣寺，先将文物标志牌打烂，有位和尚将南岳佛教协会的牌子取下来砸成两段。他们又冲到天王殿，用锄头把神龕的玻璃砸得粉碎，捣美公、周仓、关公、四大天王等菩萨也砸得粉碎。又一窝蜂冲进大法王刹（即大雄宝殿），神龕上的三尊大佛，用锤子砸不烂，因为是樟木雕的，他们就推倒下地。有人说，这种樟木送农械厂做木模是最好的原料，于是办事组安排板车将木菩萨拖到农械厂去了。接着，一伙人冲上藏经楼，将楼门锁撬开，又把藏经的柜子一个一个打开，将一卷卷布壳包装的经书一束束从窗口、门口丢出来，有的将布壳解开，把经书拆烂，放在藏经楼的泰边天井，点起火，顿时烟火冲天。经书不断地往下丢，火势越烧越旺，可惜清高宗乾隆颁发的颁伽藏经和明板藏经被烧毁，原放在楼门口的一套梨木雕刻的李元度光绪十二年《南岳志》印板，足有三千块，全部化为乌有。又有一伙人将千僧锅砸烂，又有一伙人冲到罗汉堂，先把中间的弥勒像砸烂，然后用铁锤，把五百罗汉石雕像一个一个砸烂，有的甚至将青石板用锄头挖下来，用锤

子锤烂。五百罗汉像原是玻璃嵌装的，他们用锄头一阵乱砸。石头、玻璃，如同雨下。整整一个下午，抵祝圣寺有“四旧”的地方，全部砸烂，一洗而空。

县委副书记蒋杰通知我：“红卫兵要打南岳庙，这是省级重点文物，要向省文化局报告，怎么办？”于是挂长途电话到省文化局，文化局转省文革办，文革办孙渊同志要我找北京中央文革办，这电话等到8月28日凌晨4点挂通。中央首长和蒋杰直接通了电话，大意是：“群众要打南岳庙，听群众的，不要阻拦。”

8月28日上午8时，一中学生在胡基等人的煽动下，像潮水一样，涌向南岳庙，冲向南岳庙正殿南岳圣帝神龛前。事先蒋杰接到电话后，告诉南岳管理局局长邵星才，并在管理局举行简单会议，要求先将神龛前的玻璃卸下。邵星才先到南岳建筑公司，要建筑公司书记赵辉煌带一部分工人到正殿卸玻璃。正在卸玻璃之时，一中的一些师生冲进来了。他们拿着棍棒，横冲直闯。他们冲进大殿，抬头看，菩萨有丈多高，怎么打得下来？有一个教师又赶忙返回学校，去背拔河绳。拔河绳拿来后，有个人接着就爬到金将军菩萨的肩部，用绳套在菩萨的颈脖上，然后用力一拉，轰隆一声，象打了一个重磅炸弹，灰尘随着气浪冲到各个角落。接着又拉吴将军，又是一声巨响，烟尘飞舞，凡是殿里人，都盖上一层灰，个个像丑八怪，只看见眼睛转。正神龛上的玻璃快卸完了，他们又把绳子套到圣帝的脖子上，百多人像拔河一样，宣传部干事姜某喊口令：“一、二，加油！”可是拔不倒。拔河绳拉断好几回，人倒了好几次，有的扭伤了腿，有的擦破了皮，姜某也被忽然从神龛上掉下来的玻璃打中了头部，破了一点皮，流着血，赶忙请人包扎。这时，为了记录这一事件，我用120相机拍了几个镜头。菩萨打不下，建筑公司一位工人拿来一个八磅重的铁锤，将圣帝

菩萨的膝下打开，原来里面是两根杉树支参的，怎么拉也拉不倒。这位工人又回到建筑公司拿来一条大龙锯，使劲将两根巨木锯断，然后一拉，菩萨才倒下来。菩萨体内装有10多担老茶叶，附近老百姓，将这些茶叶包去，说是治胃痛的好药。接着，又打六部尚书、寝宫、精神殿、注生殿。各处的神像、神龛、雕花板、大殿前石柱侧的替雀、正门上的18学士、24孝图，都是赵某组织建筑工人毁坏的。

第二天(8月29日)，组织三路人马上山，机关干部全部参加。南岳管理局副书记带人从西线登山，经黄庭观、南台寺、福严寺、藏经殿，到龙池。赵某带领建筑工人从忠烈祠、半山亭、紫竹林、邨侯书院、铁佛寺、五岳殿、湘南寺、南天门，上祝融峰。还有部分人，从常在庵、般若寺、观河林、到广济寺，再从广济寺下后山到半山亭、五岳殿、土地祠、报信岭。各路人马，见菩萨就打，见雕刻就毁。

8月29日，南岳庙被砸的消息传到南台寺(当时南台寺使用单位为南岳林场)，林场的一些群众再也呆不住了，要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先冲进大佛殿，将三尊大佛打倒，然后把其它小菩萨一一打烂；再冲上藏经楼，将石碑砸碎，再将经柜打烂，将经书从窗口丢出来，并点火焚烧。经书数量多，火势大，竟一连烧了三天三夜。南台寺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重建，日本高僧六休梅晓上人于这年来寺，许寺建成后送藏经来。光绪乙未(1907)年，南台寺建成，日本六休和大坂一些知名人士遂送来藏经六藏，计5700卷，其中尤以铁眼板本最为珍贵，可惜均毁于一旦。

8月29日晚，磨镜台招待所的职工也采取“革命行动”。他们冲到福严寺；用绳子捆在佛像颈部；用力一拉，万斤铜佛就倒下来，倒在地上并没有打烂；只是面部打凹一点。他们用重磅铁锤打，还是打不烂，就打电话要生产指挥部派板车，一

个一个的拉下山去，放到财政局集中。福严寺四尊万斤铜佛，都是北宋祥符年间铸造的，均被毁坏。此外，还有祝圣寺毗卢殿的庐那舍佛、千手铜佛都是明万历年间铸的，也同时被毁。

9月1日，衡山县（在南岳）举行破“四旧”大游行，部分县委成员也参加了。队伍后面用板车拉着圣帝菩萨，南岳五街都游到了，以庆祝破“四旧”的“胜利”。游行后，南岳管理局内成立建设人民公园办公室。赵某带一部分建筑工人，大破大庙内的御匾和一般的木匾。所有的石碑全部推倒，将棂星门上的三字，全部凿去，刻上“人民公园”四字。御碑亭中康熙的亲笔碑文全部刮去，写上了毛主席语录。

9月3日，南岳街上已经平静。中午，突然传来消息，衡山二中一些师生打忠烈祠，挖军官坟。我一到四牌楼，见到衡山二中师生写的大字报：“把反动军官罗启疆的坟墓挖掉，抛尸露体，大快人心……”我一见心中颤惊不已。南岳管理局马上开会，要我和杨明三科长上山，跟随衡山二中师生，去收拾文物。这些无知的学生，在生物老师旷某的率领下，爬上忠烈祠各个山头，用钢钎铁锤，一块一块地将石板撬开，把尸体一个一个拖出来，使其尸陈骨露。

南岳忠烈祠原是由青水秀的地方，顿时变成臭气冲天、阴风凄凄、无法通行的地步。他们无知地将“七·七”纪念塔的“七·七”二字打碎，将这些为民族存亡英勇献身的将士，亦陈尸抛骨。

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3日，仅短短几天时间，竟毁坏佛像326尊、万斤铜佛7尊、万斤铁佛7尊、小菩萨不计其数；毁坏碑刻（宋、元、明、清历代御祭碑文）64块、匾300块、巨磬26个（小磬不计其数）、古瓷器35件、古陶器30件；焚烧藏经8藏、古字画220幅、其它古书籍1万余册；拆毁庙宇5处；挖掘墓葬70座。这真是一场空前的浩劫！

张家界开放前后

陈自胜*

被誉为天下奇山的张家界，是我国第一座国家森林公园。目前正以其独特的地貌、神奇的风光、茂密的森林和浓郁的风土人情，吸引着愈来愈多的中外游人，成为当今旅游的热点。张家界的前身是国营张家界林场，始建于1958年。从建场至今，经历了三个时期：1958年至1971年为造林期；1972年至1978年为育林期；1979年开始筹建森林公园，逐步开展森林旅游，接待国内外游客。

深谙佳丽——张家界的历史风貌

昔日，张家界是一块“野兽漫山游、土匪立寨楼、芭茅茆里尸、有天无日头”的神奇土地。黄狮寨、腰子寨、扁担寨、羊寨等，就是土匪占山为王的据点。有一族谱曾这样描写过这里的情况：“……人烟稀散，草木畅茂，道路俱系羊肠小径，崎岖多险，兽蹄鸟迹，交错于道，飞禽走兽，成群作队，诸溪之鱼，举网即得，民风淳朴，常时以采蕨挖葛为餐，饲蜂为业。生其时，居其地，迥然别有天地，仿佛义皇时景象……”。

解放后，经过土地改革，这片土地仍为张、胡、李氏的“清明会”、“庙会”所有，无人具体管理经营。数十里内，荒无人烟，只有王淑忠、李尚卿几个外地人住在这里种苞谷。讲到这个地方，人们无不谈虎色变。

* 陈自胜，原张家界车队队长。

随着时代的变迁，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终于改变了对张家界的看法。这里一柱柱拔地而起的峰林陡峭嵯峨，峰峰相傍，层层相迭，气势如龙腾虎跃，波涌云流。组成这砂岩峰林的石峰，千奇百怪，类型繁多。南天一柱、定海神针等，顶宽麓窄，孤峙无倚，看去有亭亭玉立之感；飞云洞、望郎峰等，石上有眼，四面玲珑，清而得体，天成奇趣；朝天观、袁家界一带，众山争异，群峦竞秀，横看成岭，侧视成峰；夫妻岩、金鞭岩等，色泽苍老，朴实古拙，若痴若愚，丑而不陋，给人以美的享受。张家界不仅以岩峰见奇，而且还以清水显幽，“久旱不断流，久雨水碧绿”。这里一瀑二湖三潭四泉五溪的景色最为出奇。尤其是金鞭溪，蜿蜒曲折，顺流而下，沿岸削壁万仞，峰峦千迭，红岩绿树与清溪碧洞相映，构成一幅幅天然的山水丹青，把张家界装点得无比绚丽多姿。同时，这里有成片的原始次森林，保存着不少古老稀有的珍贵树种、花草、中草药资源。仅木本植物就有93科、517种，其中乔木达191种。动物种类也较多，鸟类有六目、13科、41种。兽类有27种。漫游张家界，林中有鸟竞鸣，山上群兽嬉戏，使人顿觉置身于富有诗意、充满生机的美妙神奇境域之中。

在历史上，虽有对张家界山水赞美的记载，但因生活所迫，人们无法抒发什么山水情怀，无暇欣赏这里的奇花异草，对这里奇异的景物根本没有引起关注。谁多一山，谁少一水，也并不计较。张家界美丽的自然风光始终不为外人所知，一直是颗失落的明珠，锁在深闺的佳丽。至1958年，在这里创办了国营林场，张家界才始有生气。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张家界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白手起家——张家界国营林场的建立和发展

在毛主席“绿化祖国”指示的指引下，1957年下半年，大

庸县林业部门开始筹建国营张家界林场。

张家界地处慈利、大庸、桑植三县交界处，东北与慈利县索溪峪毗连，北邻桑植天子山，距大庸城32公里，原属大庸县管辖。经实地考察、林业部门分别与沙堤乡张家界、中湖乡袁家界、中湖、禹溪乡十八山、协合乡龙尾巴等农业社的负责同志协商，采用折价收买，接受赠送等办法，用65000元将这片土地收归国有，并在1958年至1960年三年内由国家偿还。于是张家界国营林场的范围便很快确定了。它东起麻田垭、西至化阳坡、南到锣鼓塔、北至黄花溪，东南较宽，西北稍窄，成一楔形，共计57112亩，其中有林地6211亩，林木蓄积量4万M³，宜林荒山35451亩，农用地465亩，非林地和岩山14985亩。

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林木生长，年平均气温12—15℃，最冷月（二月）的月平均温度1.6度，最热月（七月）的月平均气温29.7度，无霜期240—303天，年降雨量1200—1600毫米，年降雨日138—180天，年蒸发量1230毫米，有效日照时数1300—1600小时。其地质属火成岩，以红色砂岩为主，土壤属轻砂质，中厚层黄壤。三亿年前，这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后经燕山运动，多次地壳运动后发生折皱、破裂以及雨、雪冲刷，剥蚀而形成砂岩、峰林、峡谷地貌。

为此，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委员会于1958年4月12日电示批复，准予建立国营林场，为股级单位。1959年下放火箭公社管理，1961年收回州办，变大庸县管理。尔后，体制一直未变。

第一届场长陈伯祥，时间不长。第二届场长刘开林，从1959年8月至1980年，历时21年，后改任支部书记。第三届场长覃国经，从1980年至1983年12月，计4年时间。建场时的人员，主要是“右派”和下放干部，共80多人。他们来到这里，一无所有，开始租用张家界高级社锣鼓塔生产队民房两间暂

住，后在老木湾修建木架茅屋三间，并在溪边用石头堆砌厨房一小间。为了改变生活条件，陈伯祥组织大家将黄狮寨顶上庙宇的砖挑下来，每人每天挑五次，一次24块，重百多斤。遂建起了上下八间和一个会议室的两层楼房。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兴起，1958年10月，初建了张家界林业中学，校长陈伯祥，教师胡维礼，有学生46人。由于形势的变化，林业中学于1959年冬撤销。

建场不久，全县掀起了大跃进运动高潮。1958年秋，张家界所在的火箭公社和邻近群力公社集中了几千劳力，在水绕四门砍柴烧炭，大炼钢铁，致使一个刚刚兴办起来的林场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当时方圆数十里红旗招展，人流如潮，砍柴烧炭，浓烟冲天。人们头脑膨胀，大搞虚报浮夸之风，达到登峰造极之地步。现在公园入门收票处有口池塘，名叫“卫星塘”，这名字就是从那时沿用下来的。原来此处是丘四分面积的稻田，为创高产，放卫星，集中一个连的民工，在这里挖窑，声称烧炭100万斤。他们将两傍山上的树木全部伐倒，集中在这个窑里燃烧。结果，树木砍光了，钢没有炼出来，反而火吹大播，向上级报喜，声称“放了卫星”。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除那些难以攀登的山顶上的森林以外，其它地方的树木几乎所剩无几，损失十分严重，张家界林场进入了困难时期。

据记载，1958年国家给林场投资为41514元，而1961年只投10600元，减少四分之三。那时全场65人，包括工资、营林费等，每人平均只163元。在此困难情况下，为坚守这块阵地，场长刘开林带领36名工人，站在毛主席像前庄严宣誓，决心头发自在张家界，不绿化荒山不下山。他们利用林场有利条件，合理安排劳力，广泛开展林付业生产。在搭起的临时工棚四周，喂养牲猪和鸡鸭，在栽了树苗的坡地上，间种包谷、杂豆，在遍野山花丛中，放养蜜蜂……全凭着勤劳的双手，战胜

了困难。1960年全场职工的粮食实现了自给，第二年便有了盈余。当职工家属生了小孩，场内还能供应15斤猪肉、两只鸡、100个蛋和自制的高粱杆糖两斤或蜂蜜一斤。

三年困难时期大家的生活都十分艰苦，只因大家团结一致，坚持为社会主义造林不动摇，全场除两人经不起考验跑回家以外，余者都坚持下来了。自1958年至1961年，共造林3942亩，成为湘西自治州的先进单位，为林场发展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1962至1967年间，是林场林业生产发展最快时期，被称为“黄金时代”。此时，林场从实际出发，充分利用社会劳力，大打植树造林的人民战争。从1961年下半年起，林场通过场社挂钩，使附近社队大量劳力纷纷涌进林场，支援林业生产。他们安营扎寨，开荒种粮，实行粮林间作，把植树造林运动推向高潮。据记载，1962年远征在场种粮的有108个包谷棚，遍及4个区、11个公社、41个大队。常年在场种粮造林劳力达500多人，最多达1800多人，粮林间作面积4500多亩，占造林总面积的90%，收粮食百多万斤。

林场让这批劳力开荒种粮，进行造林抚育，并互相签订了包开荒、包造林、包成活、包抚育、包成林的“五包合同”，既减少了国家投资，又达到加速绿化荒山的目的。

光阴流逝，冬去春来，许多村民的青春就这样默默无闻地度在山中度过。他们人走了，虽然后辈不知他们是什么模样，也不知道他们的艰辛，然而历史是公正的，留给后人所知的是金玉卿屋场、罗兴吾屋场等地名，这就是对他们的永久纪念。在这几年间，全场共造林9123.8亩，基本上完成了绿化全场的任务。

“文革”时期的三年中，场长刘开林带领职工登上了千多米高的朝天观，使这里的三千多亩荒山披上了绿装。

1971年，张家界林场基本完成了造林任务，遂进入搞科

研，抓抚育，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的阶段。为美化张家界，1973年林场决定创办花溪峪种子园。技术员江勤诺主动挑起了种子园的重担。他无论是烈日炎炎的盛夏，冰雪封山的严冬，都在坚持森林资源的调查，采集珍贵树种，一年四季沉浸在林木深处。八年来，他根据树木分类，识别了200多个主要树种，摸索了50多个乡土树种的花果期，掌握了20多种珍贵树的育苗和嫁接技术，选出优质树80多株，配齐定型了4个树种……为发展林业科研事业作出了可贵的贡献。正当党和人民期待他为四化建设效力时，不幸于1979年深秋为采摘珍贵树种不慎掉下悬崖，42岁的江勤诺即长眠于张家界深山峻岭中。

如今，无论是珍奇的观赏树种银杏、珙桐和黄心夜合，或是珍贵的家具用材树种兰果、榿果、毛红椿，食用油料树种香榧和巴山榧，都长得枝繁叶茂，吐绿叠翠，把张家界打扮得姘妮多姿。江勤诺亦成为千百万游客所崇敬的光辉形象。

慧眼识珠——张家界的价值被重新认识

张家界的价值充分被人认识，亦经过了一个复杂的过程。从七十年代起，附近社队学习张家界植树造林的经验，先后办起了梓木树岗、张家界、朝阳、板坪、野鸡锦、广溪峪、甘溪峪、陈木岗、十八山、袁家界等社队林场，大场带小场，连片造大林，为绿化祖国闯出了新路，遂引起了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1974年7月，全省在这里召开了70多人的各专区林业局办公室主任会议。同年9月，省里又在此召开了70多人参加的各专区林业局长会议。1975年9月，州委召开全州县委书记、县长会议，由州委主要负责人宁生、吴运昌、向和友等带队，参观张家界，推广他们的经验。1979年8月，全省召开各专区书记和重点县委书记会议，参观张家界，更得到了各级高度重视。通过参观，大家深深感到张家界不但林业生产好，而

奇妙的山水更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记者、画家、作家、诗人、摄影师、科学工作者，纷纷慕名而至。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著名画家吴冠中老先生和香港著名的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等。

1979年11月，吴冠中来张家界惊叹道：“这里的秀色不让桂林，且峰峦比桂林更神奇、更集中、更挺拔、更野！……”尔后，多次撰文为之宣扬。1981年4月18至13日，香港著名摄影家陈复礼、简庆福等10多人，来到张家界摄制风景片一万多帧，选一百多帧在香港展览，引起“人声鼎沸”，“万头攒动”，扩大了张家界的影响。

为发展旅游事业，省人民政府委托省城乡环境保护厅、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文学月报》编辑部于1984年7月7日至26日在张家界联合举办了武陵笔会。应邀参加的有雷加、碧野、峻青、郭风、堪容、苏晨、丁芒、李学熬、俞子奇、含笑等20多位国内著名作家、诗人和画家。随后，他们在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有力地宣传了张家界。

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香港、澳门、菲律宾等地各大报刊以及国内50多家报刊、电台报导张家界的文章、照片达6000多篇（幅），国内摄制影视片11部，其中较为出名的有《奇山揽胜》、《砂岩峰林》、《绿海奇峰》、《情满青山》等。在港澳、日本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有60多万人次参观了张家界风光图片展。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知名人士为张家界题词、作画、撰文500多篇（幅）。出版书籍、画册有《张家界》、《风景明珠张家界》、《张家界传说》、《张家界探奇》、《天下第一奇山张家界》、《张家界画册》等各种版本，为公园的建立和提高张家界的知名度发挥了巨大作用。

张家界能否开展旅游，关键在于它的资源价值。为了查清

其资源价值，1979年至1984年期间，先后进行了四次重大的考察活动：一次是1979年8月，有林业厅和省农学会组织了中南林学院、湖南林校、部分地（州）、县林业局、林科所、林场的专家、技术人员35人，对张家界森林植被、鸟兽资源进行了综合考察，并写出了《张家界林场森林资源考察报告》，对其资源作了高度评价；二次是1979年至1981年间，大庸县委常委抽调一批干部对张家界风景资源开展了普查和景点的命名工作，基本上弄清了这里的风景资源；三次是1982年8月，林业部组织北京、上海、杭州、桂林、西安等地15位园林专家、教授考察张家界，一致认为此处风景独特，是世界第一流的自然风景区；四次是1984年4月，由湖南省建筑研究设计院、湖南省林业考察设计研究院、中南林学院园林教研室组成的风景名胜评价团，对张家界作了风景资源的调查，并作出很高的评价。

通过以上多次考察，该处的自然风景资源被基本弄清。著名植物学家吴征镒考述：“张家界保留了长江流域古生代植物群落的原始风貌。”地质学家陈国达评价：“张家界这种奇特的地形、地貌，不仅国内少有，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清华大学朱畅忠教授说：“就山而言，张家界可说是天下第一奇山。”日本一美术界人士参观张家界后说：“过去我认为中国画是虚构的，现在才知道，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还有自然生成的中国画奇观，张家界就是一幅巨大的中国山水画。”

张家界无以伦比的自然风景资源，为旅游观光、野营体育、避暑休养及资源研究等开拓了广阔的前景。凡到过该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一致指出，张家界发展旅游业具有巨大潜力，一定要把这颗国宝保护好、建设好、管理好。

历史性转折——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建立

从1978年起，张家界林场为了促进从单一的林业经济向综

合的森林旅游经济转化，开展了森林旅游事业。据1979年至1981年三年统计，共接待了27个省、市及港澳同胞和外国朋友8.8万人次。实践证明，开展森林旅游的价值，远远超过林业生产价值。把张家界林场建成国家森林公园，既是人们的迫切愿望，又能发挥森林综合效益，增加林场收入，搞活经济，丰富人们的文化生活。

基于上述认识，1979年春，大庸县委便决定由县委副书记、县人大主任胡太钧同志负责领导张家界的工作，并从县内抽调部分领导干部充实张家界林场的领导班子。1982年7月6日，湘西自治州人民政府又以州政发（1982）47号文件，决定成立张家界森林旅游筹建领导小组，由李沁（兼）任组长，龚继祖（兼）、刘开林、张远喜任副组长，张富高（兼）、王丰年（兼）、刘德贞、李佩等为成员，负责开展森林旅游的各项筹建工作。

他们进省城，赴北京，历尽艰辛，请示汇报，终于得到认可。1982年9月25日，国务院计委以813号函批准张家界林场为国家森林公园，由林业部和湖南省政府联合投资兴建。1983年5月9日，湖南省委办公厅31号函同意设立张家界公园管理处，确定其为县团级单位，党务、政务和干部管理委托大庸县领导，业务归口省林业厅，公园为事业单位，实行企业管理。省林业厅负责公园的建设规划及规模、经营管理方针和建设期间国家投资建设项目的审批。根据上级文件精神，1983年12月27日，大庸县委下发了（83）075号文件，转发州委《关于批复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处等机构设置的通知》，决定公园管理处下设生产科、基建科、旅游接待科、计财科、党委办等科室。1984年元月15日，州委决定设立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临时党委，胡太钧同志兼任党委书记，伍伯勋、卢光浩、刘开林为成员，并召开全公园职工大会，宣布公园管理处正式成立。

为了把我国第一座国家森林公园建设成美丽的乐园，公园管理处建立后就委托湖南省建筑设计研究院对公园进行规划设计。1984年初，该院工程设计人员在总工程师郭民镛、总设计负责人李基权带领下，来到张家界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考察、研究和设计，编制出《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体规划》，报上级主管部门认可。1986年间，同济大学、湖南省建委在省建筑设计院的《总体规划》基础上，深入勘察，进一步补充、完善和提高，使总体规划更符合实际。《总体规划》根据其自然特点，以保护自然风景、研究自然资源为主要任务，可供多功能旅游的国家风景名胜区，正确处理保护自然风景和开发旅游的关系。经过三、四十年努力，把张家界建成真正具有高质量、高水平的环境，适应高层次的旅游，达到高水平的利用、高标准管理的世界第一流的风景区。

规划分近期、中期、远期。在近期内，开发项目主要是修改和改建有关公路，尽快建成大庸机场及相应的联系道路，搞好若干景点和休息点的设施，进行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准备工作，处理好生活污水，实现以电代煤、代柴的目标等。

面貌巨变——开发建设取得巨大成绩

按照《总体规划》，近几年来，张家界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如今是新房林立，游人如织，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开展基本建设上，根据林业部（计）（1983）640号文件精神，上级投资996万元（其中林业部400万元，湖南省政府596万元）。在用好上级投资的基础上，还广开财路，自筹资金，进行建设。两项投资已达2221.46万元，其中1600万元已形成固定资产，现已完成的项目：

一、基础设施。1983年，此处不通电、不通邮，入园公路尚在改建中。1984年元月，管理处建立后，一面利用投资，

面自筹资金，耗资120万元于1984年3月实现通邮；当月入园公路竣工，耗资达300万元；同年6月以150万元投资实现通电；又安装了引水主管3500米，计44万元；扩建游道45000米，计10万元；架设风景点保护栏杆1500米、修筑景区内公路26.7公里、水库三座、小型水力发电站两座；新建管理处办公楼1470M²、职工宿舍6102M²；购置了客运汽车18辆及其它机械100马力；修建了500多平方米的电影院、建立了两座广播电视差转台、彩扩中心、子弟学校、卫生院等。

二、参观景点：公园现已开发出五条游览线，即黄狮寨、金鞭溪、腰子寨、袁家界、朝天观等，共200多个风景点。对原有的自然景观作了整治，修建休息接待站三处、观景亭两座、水坝三座，对动、植物景观进行了保护、培育、悬殖，使其得到丰富和发展。

三、服务设施：为解决游客吃、住、行、购问题，管理处搞了一系列的服务设施。先后修建了金鞭岩饭店、张家界宾馆、青岩山宾馆、幽篁山庄、青年山庄、林场招待所等。并引进外资，修建琵琶溪旅馆、铁路、税务、粮食、邮电、湘电、有色、煤炭、荆门等休养所，共建服务设施30多家，4000多个床位，有15个商业门市部出售旅游商品、纪念品和糖果、烟酒、百货及土特产。另有经工商行政部门登记的个体户80多家，经营熟食、照相、付食和杂货等。还设置了客运公司、旅行社、邮电局、营业所、工商银行办事处、工商所、税务所、粮站、湘运张家界车站等。

四、后勤设施：公园开辟了张家界、袁家界两个蔬菜基地，种植面积110多亩，养猪专业户200多户，每年提供牲猪近千头；一个茶厂，种茶面积500多亩，每年产茶500多担；旅游工艺美术厂、饮料厂、水果仓库等；生产和供应旅游纪念品、各种酒类、饮料与水果，为游客服务。

为了更有效地保护公园的资源和环境，在1984年至1987年间，公园自筹资金，先后征收了马公亭坡段和袁家界林场、茶场等地11390亩，进行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根据林业部设计院调查队调查，1983年全公园木材蓄积量为22万多M³，旅游更促进了林业的发展。如今，公园有了年60万人旅游的接待能力，为进一步发展旅游业奠定了基础。

为提高服务质量、采取派出去学习参观、送大专院校深造、就业培训和请名师进山传艺等方式，培养了大批旅游管理、导游、烹饪、接待、培育园林花卉的专业人才。送入大中专学习的就有30多人，这些人回公园后，运用所学的知识，精心经营管理，极力改进服务态度，不断提高服务质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抓好内部管理的同时，公园负责人喻光浩、杨开业、王建文、满国良等同志，先后往香港推销旅游产品，与香港现代、环球、荣泰、第一旅行社等直接开展了组接团业务。如香港第一旅行社仅1988年2月到7月，直接组团来公园观光的就有15个团队，公园直接收取港币20多万元。公园十分重视与国内各旅游部门搞好交流，与省中旅、省青旅、广州、桂林、郴州、上海、武汉、洛阳、岳阳、重庆等国内旅游部门都建立了业务关系，并和台湾紫云旅行社签有旅游业务合同。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为借鉴美国国家公园经验，交流两国公园情况，应美国缅因大学邀请，经林业部批准，由湖南省林业厅组团，张家界公园党委书记胡太灼、处长喻光浩，参加了考察。他们于1989年3月31日至4月14日对美国缅因州、华盛顿国家公园、森林公园作了考察。考察期间，拜访了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并了解其全国国家公园情况，考察了缅因州境内的内政部国家公园管理局系统的阿克的亚国家公园，开普顿、伯克斯特、塞伯格州立公园，纽约市炮台公园和农业部林务局系统的自由林务局、白山森林公园。缅因大学热情接待了他们，几位

教授介绍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美国公园情况，讲授了公园建设规划设计、林道设置、导游业务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知识，为扩大张家界的知名度作出了一定贡献。

从1979年至1988年，公园共接待了230多万人次的国内外游客。张家界公园的开发，使旅游经济成为主要经济支柱，其收入占整个收入的90%，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都得到实惠。

一、公园经济收入逐年增长，利税增多，对国家贡献愈来愈大。以1983年建立管理处前与1988年相比，总收入由62.3万多元增加到1000多万元，增长了16.6倍；税金由4.45万元增到121万元，增长了27倍；利润由1.2万元，增加到120万元，增长的比例就更大了。

二、扩大了劳动就业，带动了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建管理处时，原林场只有干部职工110人，随着旅游事业的发展，到1988年，全公园的干部职工（包括临时工）已有996人。不仅如此，还带动了周围乡村经济的发展。以公园代管的袁家界、张家界两个村为例，从1949年到1983年的30多年里，袁家界只有5个年头没有吃救济粮。1983年人均收入122.6元，1988年人均收入增加到550元；张家界1983年人均收入300元，1988年达到650元，全村275户，大多数购置了电视机和高档商品，还存了款。

三、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干部职工的生活显著提高。1983年建园前，人均住房面积是7.17平方，每户只29.4平方，1987年人均达到23.34平方、每户95.06平方。1983年人均工资每月59元，1987年上升到107元。

闻名世界的张家界，必将吸引更多的游人，亦必将给大庸市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